

染

2013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	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	特约编审：	主编：	副总编：	总编：	
	杨 赟	李 业 潘庆磊 吉 强	魏 方	陈 思 魏 方	贾梦玮	彭 慧	唐旭明 魏晓蕾 彭 慧	周和平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增刊

主管主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中华文化学院

编辑出版：《雅集》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编：210007

网址：<http://www.jssy.org.cn>

电子邮箱：yajijis@163.com

电话：025-84287248

传真：025-84287242

封面题字：徐邦达

装帧设计：朱赢椿

杨杰芳

印刷：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刊号：ISSN 1672-3163
CN 32-1559/C

出版日期：2013 年 11 月

定价：18.00 元

C O N T E N T S

本刊特稿

《选》《龙》二学 百年沉浮——从教学工作之一角看世运变迁 / 周勋初 / 001
国学研究，要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周勋初教授访谈录 / 徐雁平 / 008

名人档案

关于傅抱石早年经历的若干细节 / 万新华 / 016

艺术人生

漫说范扬 / 沙 洲 / 023
情真意长——读刘灿铭书法的点滴感受 / 张瑞田 / 032

人物春秋

民国出版二杰 / 叶兆言 / 037
庆有学说播宇内 笙无一管为身谋
——记我国农业微生物学奠基人樊庆笙先生 / 方 式 / 041

文苑纪事

跋涉“儒林”四十载 / 陈美林 / 049
陈小滢和她的纪念册 / 张昌华 / 059

佳作同赏

翠岭晨岚图（国画） / 宋玉麟 / 064
太行铁壁图（国画） / 薛 亮 / 066

历史遗韵

故纸的温暖 / 薛 冰 / 068

1865：战争与救赎 / 贾梦玮 / 074

光影记忆 / 吉 强 魏 方 / 080

城市文脉

秦淮书肆 / 丁 帆 / 083

名士有部落 风雅世其家——记常州钱谢两家六代诗书画传家 / 马建强 / 085

乡村记忆

回望西溪 / 戎东贵 / 092

小时候的池塘 / 张尔客 / 095

河阳山歌：农耕社会的主题咏唱（外一篇） / 曹乾石 顾丽红 / 098

读书岁月

知觉就好——任彦申政论散文三部曲读后感 / 丁 捷 / 102

鲁迅集外文四种 / 顾 农 / 105

文化论坛

古画临摹仿拟摭谈 / 朱寿桐 / 109

俗与雅 / 周延年 / 113

海外传真

从书信中感知诗人纪弦 / 吴心海 /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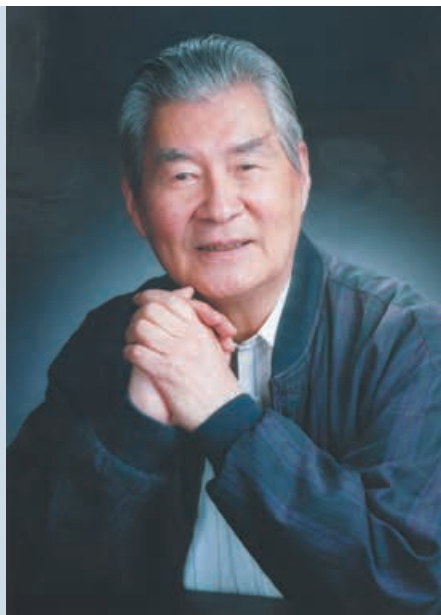
谒唐招提寺 / 杨 贇 / 123

文化的传承——关于《雅集》之七 / 周和平 / 126

《选》《龙》二学 百年沉浮

——从教学工作之一角看世运变迁

III 周勋初



周勋初先生

2011年8月，南京大学文学院与古典文献研究所承办“《文选》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老教师，理应对与会者表示欢迎，还应对古代文学中的这一重要典籍在我校的讲授情况作些介绍。

我在准备过程中，发现《文选》一书很有代表意义，可以说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起起落落，而且与我这样一名承担这一方面课程的教师也息息相关。我就想到，可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由此可窥南京大学的兴衰荣辱，还可透视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微妙变化。

我国古代典籍中，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这一文学总集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古代典籍保存不易，前时精粹的作品很多收录在内，学习古典文学，绕不开这一部大书，历代文士成长中都有一段学习《文选》的经历。自唐代起，就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一些大儒，如曹宪、李善等人，均以精治《文选》而为后代所推崇。

民国时期，先后有两位《选》学大师在此讲学。东南大学时期，扬州李详（审言）负天下重望，通儒沈子培称其精于《选》学；中央大学时期，蕲春黄侃（季刚）享有大名，章太炎许为“知《选》学者”。照理说，李、黄二人应该为南京大学增添光彩，实则不然。因为其时中国历史正经历着千年巨变，时移势转，《选》学已经由盛转衰，步入逆境。因此，李、黄二人所开创的学统，反而给东南学术带来种种磨难。

民国初期，北方兴起了一阵震古烁今的新文学运动。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要求用白话代替文言。主古文的桐城派，主骈文的《文选》派，都遭到了讨伐。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先后撰文，赐予恶名，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东南大学早期，桐城派的巨子姚永朴已来此任教，于是“谬种”、“妖孽”都在南京集中，形成了与北方遥遥相对的一种奇异景象。

不过黄季刚此时仍意气豪迈，没有感到什

么压力。由于学问好，仍有一大批崇拜他的学生围在身边。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讲课时喜欢骂人，骂得最多的人之一就是这位钱玄同。两位章门弟子势不两立，却互不相妨，各有自己的地盘。

然从总的形势看来，南京方面还是处在不利地位。因为自清末起，中国思想界受进化论的影响特别大。其时列强环伺，国步维艰，人们无不觉得中国即将沦为列强殖民地，因而救亡图存的运动此起彼伏。“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以白话文取代言文，文学要求革命，大势所趋，符合历史潮流，不管《文选》派中人物如何饱学，也难阻挡时代的发展，北方学界的声势，显然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当时正处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各个系统的军阀忙于争战，无暇顾及其他。若从好的方面看，当时的一些执政者也有其开放的一面，他们对学术问题不加干预，因此各家各派可以自由发展。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可以称为近代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犹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国力虽弱，思想界却很活跃，创获也多，成为百家争鸣的又一高峰。例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顾颉刚、陈寅恪、赵元任等，各路大师都是在那时段中先后涌现的。这些学界要人，一直影响后代学术的走向，惠溉后人至深。桐城派和《文选》派中人物，没有遭到过什么政治上的打压，只是大势所趋，不能像过去那样风光罢了。

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大体仍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进化论之外，又增加了阶级论。当时认为，像胡适、钱玄同等人物属于资产阶级学者，李详、黄侃等人属于封建学者。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封建学者自

然低了一筹。何况与鲁迅叫阵的《学衡》派中人物也集中在此地，因此南京大学的前身，成了保守派的集中之地。李详、黄侃等人殁于抗日战争之前，他们的一些老同事，胡小石、汪辟疆两位先生，则仍在此任教。他们年岁相仿，经历亦相似，自然也被列入封建学者的行列。

汪辟疆先生学问好，成果多，和国民党中要人多有来往。因为他们那一辈人大都出身世家，国民党中的一些要人也多通文墨。汪先生和于右任等人诗酒往还，还参加过北极阁雅集等活动，于右任就利用职权送他一个监察委员的头衔。想起此事，我就觉得好笑，像他这样一个人，能监察谁呢？方光焘先生说，汪先生实际上是个文人，喝喝酒，做做诗，只是身在高校工作，在学术上也得有发展，但在政治上可没有什么心计。大约是在1948年吧，汪先生在国民政府的电台上还作过一次演讲，提倡读经，凡此种种，新中国成立之后自然会被视作落后的表现。

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里，大都集中有一大批本校毕业的教授。中央大学的情况当然如此，这在阶级观点鲜明的人看来，也就是封建势力集中地了。到了六十年代，一些观点鲜明的人已将南京大学中文系视为“封建堡垒”。

胡小石先生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一生清白，性格孤高，无论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都与政要没有任何瓜葛。他在护校运动中立过大功。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中人有些来往，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初期仍然出任文学院院长。到了1952年秋，转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南京大学在教育界的地位，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遭到了严重削弱，文科尤甚。哲学系合并到了北京大学中去，中文系中并过来的教师，



周勋初先生和夫人在台南亿载金城

只有任职于金陵女子大学的陈中凡先生一人，而在此之前，却调出去了不少名教授。吕叔湘去了北京，唐圭璋去了东北，段熙仲回安徽老家去了，张世禄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复旦大学去了。

时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初，罗根泽、方光焘、胡小石等几位先生先后去世，南京大学已无知名人物。三十年代声华藉甚的南雍重镇，已经虚有其名，无怪乎处在南京本地区的兄弟院系也对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学术水平表示轻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之间很少来往，因此中文系的窘态还不会明显地暴露，教师不会感到有什么压力。只是到了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影响，提出了反修（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编写一系列的大学教材，取代前此仿照苏联模式或直接从彼处引进的各种教科书。为了强调中国的独立自主，突出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得到重视。周扬安排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各编一套

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论选，大约是看到复旦有郭绍虞与朱东润两位专家，南大有陈中凡与罗根泽两位专家，因而让两家各搞一套的吧。只是陈先生此时已年过七十，罗先生患高血压与肝硬化，已不能任事，因此两校的实力已无法相比。

这项工作初起时，还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学生为主大编教材，轰轰烈烈，关起门来搞，仍然可以自我陶醉。但要两校相拼，拿出真货色来，可就显出高低来了。到了六十年代，上级指定两种批评史方面的教材都要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南京大学可是窘态毕露了。

六十年代之初，罗根泽先生去世，这里最后的一张王牌已告失效。

两处编书，情况大异。上海方面把前阶段的重点放在《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上。参加者中不但有实力很强的一批青年教师，而且在中共华东局的支持下，从杭州大学调来了夏承焘，从江苏师范学院调来了钱仲联，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了马茂元。他们在郭绍虞的统率下，住进了国际饭店，所需资料，均由位于对

面的上海图书馆负责供应。就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自1964年起，陆续出版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卷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反观南京大学，因无高级专业人员，只能由一位研究散文的老教师负责，集中了三名年轻教师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其时我已改为助教，匆匆赶去担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算是一名专业人员。大家心里有数，要想编出一本足以与上海方面抗衡的著作，根本无此可能，只是任务在前，也要交差吧，于是大家分析了一番形势，觉得应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我们应该编写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显示自己的特色。这书字数不能太多，控制在二三十万字即可。每篇选文之前，要写一段精粹的提要，总领全局。学生读古文时，不易厘清思路，因此遇到较长的文章，就要分段介绍，从章法上分析。词句方面，则应努力说清文论术语的内涵，深入浅出，好让学生容易理解，容易掌握。应该说，这种设想还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工作一年多，稿子交老教师审阅后，却不知什么原因，如同石沉大海，连废纸都不见一张了。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稿子原是由四年级的学生编写的，后由下一届学生接手，完成了初稿。等到大家奔赴上海交稿时，情况已经大变，大编教材的高潮已经过去，上级不再强调小将的革命精神，而是注意起用老专家，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我们由一位副系主任带队，一两位教师，再加两位学生，住进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招待所。我们也有自知之明，觉得稿子没有什么水平，也不乏东抄西袭的地方，但当对方一一指出时，却也感到难堪。特别是那位姓刘的主任语带讽刺，大家更是感到难受。回到房间，副系主任就表示要想法子反击，因为这

是对待小将的态度问题，但当时大气候已经改变，无力回天，只能灰溜溜地回校。

我作为一名正在教这课程的教师，当然感到丧气，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落家族中的飘零子弟。后来想想，这种想法也有些自作多情，因为上级本来也没有指望你挑什么大梁。两种教材的编写中，也只是做一些具体工作，没有资格担任什么领导性质的职务，因此无论从行政看，从道义上看，没有什么地方要我承担责任。只是我对南京大学的传统有些了解，知道师辈在此作出过贡献，因而才有那些悲凉之感。当然，这在当时来说，也会成为一条罪状，你想为封建学者招魂么？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的力量已经跌到谷底，其后又遭不断摧残，成了革命小将和革命教师大显身手的一块阵地。经过反复清理，“封建堡垒”已荡然无存。像我这样一名不成材的学生，仅因跟老师学得认真一些，也被加上“封建学者俘虏”的恶谥，成了一名革命师生群起而攻之的不合格教师。

“文革”结束，天日重光，社会观念起了根本变化，南京大学的教师不必再为历史蒙羞。因为大家的态度趋于客观，学界不再用进化论与阶级论的观点来衡量一切，甚至《学衡》派的价值也有人来重新加以评估。学者只要在某些方面作出过贡献，就会得到肯定。

到了八十年代，学术界成立起了各种不同系列的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后，我也被吸收入内。1981年时，《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把三年教学中积累起来的讲义改写了一下，沿用此前形成的思路，向少而精的方向努力，考虑读者需要，行文深入浅出，追求体系的完整与明晰。全书

仅二十万字，出版不久就售完了。其后在国内与境外多次翻印，还有两种不同语种的译本，传播也就更广，影响不断扩大。

1984年11月时，复旦大学主办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多为其时名流。程千帆先生与我得到了邀请，但他心脏不好，无法参加，这样我就必须前往。心想南大毕竟是个老大学，我又教过几年批评史，所以才会破格让我去一下的吧。之前中国关起门来搞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开过什么学术会议，这时要请日本顶级的学者来开会，又安排在条件优越的龙柏饭店，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该前去开开眼界。但我心中很虚，自知没有写过一篇《文心雕龙》的专题文章，很有可能去丢人现眼，因此接到邀请函后，尽可能挤出时间来读《文心》与《文选》，慢慢地磨出了一篇文章——《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

开幕式前，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会场。李庆甲任这次会议的秘书长，带着一批年轻教师恭候在门口。那时他已致力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且已取得初步成绩。见我到来，突然将手一摆，向青年教师介绍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勋初。”我一无思想准备，感到突然，心想是不是在开玩笑？再看看倒也不像。开会期间，我一直很纳闷，他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我才慢慢体悟出来。与人交谈时，常有人提到《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原来好多人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才能跻身这次会议。

“文革”之前，全国没有多少纯学术的刊物。到了六十年代，北京的中华书局办了一本《文史》，上海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办了一本《中华文史论丛》，这是当时规格很高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文章的人，都是一流学者。与我同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上发表文章的人，如杨宽、

平心、高亨、谭其骧、夏承焘、徐复、唐圭璋、唐长孺、俞平伯等人，都要比我大上二十到四十岁，他们当时正处巅峰时期，像我这样的年龄，很少有人会在上面露脸，或许就是这样让人记住的吧。

时至七十年代，任教于台湾大学的杨家骆主编了一种《中国学术类编》，由鼎文书局出版，内有“中古文学史等七书”，计收刘师培、王瑶、夏承焘、詹瑛、郭绍虞等人的文字和我的那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其他五人年辈较高，杨氏均有了解，故介绍颇详，介绍我时则只能泛泛地说该文“探骊得珠，久称佳制”。实则截至七十年代，我只发表过这一篇学术论文。当时正处极左思潮之中，一些人视此为繁琐考证，这也可以看到其时两岸文学观念的差异。到了八十年代，台湾大学的罗联添又将此文编入《中国文学史论文精选》和《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续编》，影响进一步扩大。其后我到台湾讲学或开会，好多学界朋友对我早有了解，就缘于这篇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其命运也与时代同步，一波三折。南京大学改换门庭之后，校内教师致力于摆脱封建势力的影响，竞相学习新理论。我很清楚，大家对我的评价是读书还算用功，但观点落后，因此《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境外的影响超过境内，校外的影响超过校内。这时看到自己的《文心雕龙》研究能够得到好评，摘掉了“学风陈旧”的帽子，心中自是高兴。

1987年时，暨南大学在广州珠海宾馆举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我写了一篇《〈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1995年，北京大学在皇苑大酒店举办国际研讨会，我又写了一篇《“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



京都清水寺留影（右三为周勋初先生）

颶创作论的形成》。这几篇文章都曾得到过好评。牟世金本想把《刘颶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放在《文心雕龙学刊》上，徐中玉要去后，放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上，列在前端，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李平等《〈文心雕龙〉研究史论》等著作都曾给予好评。张少康总结《龙》学百年成就时，则把《〈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选入了《文心雕龙研究》一书，董焱、马勤《20世纪“龙学”研究的回溯》则把此文作为将《易》学思想引入“龙学”研究的代表作。罗宗强在评论《周勋初文集》中有关《文心雕龙》的文章时，重点介绍《“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颶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以为辨析清楚了一个向为大家忽略的问题，即误读经说引起的文学观念变化，依经立说者构拟的体系其实并非经典真意，实已经过后人的演绎。以为此见带有原创性质。

我一直认为，自己并非《文心雕龙》专家，因为我治学的范围较广，写的东西五花八门，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花的精力也就有限。九十年代之后，事务更趋繁剧，已无余力再来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研究，因此好多《文

心雕龙》的会议，我都无法参加；上述三次会议，因系规模宏大的国际会议，勉力前往，为了不当场出丑，努力写出三篇文章，却能得到好评，实属意想不到的事。原因何在？却是值得寻味。

我想，这应当与我出身于“封建堡垒”有关。因为我的《文心雕龙》研究，有一个特点，即将此书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试看《解析》中文体论方面的一些“解题”，就可明白。我把各种文体的很多要素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这种研究方式所呈现的特点，也就是突破当下所谓“文学”的界限，而是把政治制度、时代思潮、文坛风气、历史演变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这样做，涉及面广，历史感强，学术史的意味也就浓厚。因我不断奔波在各个学术阵地，也就培育出了一种多角度考察问题的本领，谈天说地，纵论古今，自然会向学术史的方向发展。

我干的活很多，有人称我为“通人”“多面手”，我则自嘲为勤杂工。反正一有突击任务，要开什么新课，接手人家丢下的课，总会首先考虑到我。从教学工作来说吧，还参与大编教材，先编中国文学史，后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参加注释《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编《辞海》，注释法家著作《韩非子》。改革开放之后，改教越南留学生，开大一语文课，前后三次参加高考出题；……如此奔波劳碌，非勤杂工而何？我的这种经历，说明身份特殊，不可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做的都是实际工作，这倒也培养出了我苦干实干的精神，或许也可以说是“有心种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吧。

进入新世纪后，我已步入老年，各种科研任务都得一一结项，还要把若干著作增订完善后重印，只有《文心雕龙解析》一书未能完稿。想起当年讲课与交流学术时也曾投入不少心血，出版《周勋初文集》时编入十三篇讲义，只能算是一种半成品，未能尽抒所怀。但要想把五十篇文章全部加工出来，已无可能。之后我又完成了《诠赋》《丽辞》两篇的注释，已感力不从心，只能顺乎自然，看来只能以十五篇《解析》充数。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讲授“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时，王华宝尚在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攻读本科，也时来旁听。其后他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后称凤凰出版社）编辑，一直承担我在该社出版的各种书的责任编辑，来往甚多，一直以师礼事我。他就力劝我完成全书，以为这也是研究成果中的一个方面，有我自己的特色，自可独树一帜。其他学生也都表示可以参加进来，帮助我完成剩下的三十五篇的“注释”与“说明”。过去我一直不愿让学生帮着干活。当今学界竞争激烈，他们有自己的前程，理当集中精力高歌奋进，如今我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看来只能依仗众力，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心想《文心》毕竟也是一本重要的书，汪辟疆师认为“为研究文学者所必读”，黄季刚以为学者必须终生诵习，这时让他们细读一下也

有好处，这样还可留下一一种凝聚师生情谊的著作，也有纪念意义。于是我下定决心，邀约了九位在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中已有成果的学生，分别承担三十五篇文章的未了事务，王华宝统稿后，交我复看。自2012年年底起，王华宝已转至东南大学任教授，机动时间较多，可以发挥他的所长。只是此事还是费去了他们的不少心力，总觉有些过意不去。

我在《选》学方面一无成绩可言。聊可自慰的是，讲学日本期间引进了一部《文选集注》，后来整理成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受到学界好评，在出版总署、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的专家评议会上，定为六十年来百部优秀古籍整理著作之一。我之所以能够有此眼光，认识到它的价值，也与我的特殊身份有关。做的事多了，涉及的方面多，才能注意到他人看不到的地方。

当年任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一些教师，曾在《选》学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作出过很大的成绩，而我作为短期教过《文心雕龙》的一名教师，只是滥竽充数，势难有大的开拓，只能留下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著作，聊充一家之言。于此我只能说，限于条件，限于能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我只能自我安慰，我尽力了。

《选》《龙》二学，百年沉浮，当年“封建堡垒”中的“残渣余孽”如今还能圆满收场，留下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成品，而且能够得到学界的欢迎，可以说是晚年交上了好运，实属意想不到的事。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信然！信然！

周勋初 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周勋初先生书橱一角（吉强 摄）

周勋初先生，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后一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广博专精，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勋初文集》七册，收录《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骞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等16种专著。其后又有《李白研究》（选编）、《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录）、《李白评传》、《馥波集》等著作。此外尚有《唐语林校证》、《唐诗大辞典》（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主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纂辑）、《韩非子校注》（参与编写，修订）、《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晚唐部分于2017年出版）等有关文献整理的著作多种。

周先生不遗余力从事古代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开拓，教学、研究与整理并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评定“六十年来百部优秀古籍整理著作”，周勋初先生整理以及主编的《唐语林校证》、《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册府元龟校订本》入选，数量之多，独一无二。

一、顺其自然地登攀

徐雁平（以下简称“徐”）：这次访谈，想请您较为系统地介绍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历程。回忆总是要从头说起，请您谈谈青年时期的求学经过。

周勋初先生（以下简称“周”）：我1929年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西周家宅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中、小学阶段，兵荒马乱，生活极不稳定，学习极不正常。小学读了五年，换了五个学校，中间还从一位秀才读了半年私塾。高小五年级未读，跳级进入上海静园小学，突击记下英语26个字母，随后慢慢补课直到毕业。父亲周廷槐先生，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曾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夺魁，受到校长张寿镛的赏识，但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即告失业。我也在读了一年初中后失学回家。闲居一两年后，又跳级就读周浦中学。这时正值日寇投降，父亲找到了工作，我又有了机会进入上海沪新中学读书。父亲深感文科学生求职困难，于是让我就读理科。该校只上半天课，化学、物理负担很重，但从未做过一次实验，纸上谈兵，学的都是空头理论。况且初中二年级因跳级而未读小代数，高中二年级上大代数，一直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仅能勉强应付。

我之踏上古典文学的道路，带有很大的偶然成分。高中阶段读的是理科，但我对历史一直较感兴趣，1950年，招生广告上说有一所学校文史系要招生，这很合我的胃口，于是我就填了个第一志愿，但随后情况有变，结果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只是入学不到半年，发现肺病仍未痊愈，不知是高考体检时因疏忽而让我漏网了呢？还是其时适值有所好转，这时又告复发？万般无奈，只能转入疗养宿舍，直到

三年级结束时才恢复健康，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总的说来，前后生了七年肺病，只有大学最后一年才用功读了些书。

南京大学当时有不少名师，如胡小石、罗根泽、方光焘、陈瘦竹等先生，都曾给我很大的影响。大学毕业，正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新建，需要人，而与我同一年级的全国大学生都已提前一年毕业，这样我才有机会分配到该会的汉字整理部。前后两年半功夫，主要做编制发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具体工作。1956年时，知识分子政策出台，胡小石先生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我回去继续跟他学习，于是在年底又考了回来。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南京大学。1959年改为助教，1961年升为讲师，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教育部特批为教授，1986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徐：周先生，我看您的著述目录，1956、1957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时有两篇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文章，1958年读副博士期间在《雨花》上发表《携手并进》小说，1959年6月有学习金文的报告《禹鼎考释》（与谭优学合写）。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胡小石先生的弟子中多有擅长书法者，而您却没走这条路。这也就是说，小说、文字学、书法这三个方向，您似乎都没有去发展，这是环境的限制，还是个人的兴趣？章学诚说过，为学要看“性之所近，力所能勉”，您日后选择的文史研究是不是更适合您个人的心性？

周：1991年，《文史知识》编辑部约我写过一篇治学之道，当时即以《顺其自然地登攀》为题。若用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来说，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进取精神相结合吧。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固定的资源，总是在不断地突击，所以现在好多特点都和我的个人

经历有关。《禹鼎考释》是课程报告。1956年底回到南大，胡小石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传统的，一定要从小学入手，学习文字学、音韵学。他自己教我们《说文解字》、甲骨文和金文。不久大跃进就开始了，就和写小说发生关系了。那时已经有下放干部，我去采访，就写了一篇《携手并进》。写小说不是我的本意，这是政治任务。

胡先生字写得好，可以跟他学书法啊。诗做得好，可以跟他学学做诗啊。我个人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天赋，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做。后来为什么没能跟着胡先生学呢？这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每次做工作都是全力以赴，不可能腾出手来再花很多时间干其他事情。比如教课，批评史是五年级的课，要从孔子讲到王

国维，全是我一个人讲。那时强调古代文学理论，还要再加讲一门《文心雕龙》，这就连备课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每次突击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只能拼命地干。“文革”时，我既要编《辞海》，又要编马列文论，又要“评法批儒”，也是耗尽精力。所以我不可能腾出手来，既学写字，又学写诗。总之是条件限制，不是没有兴趣。

二、新意，法度，情理

徐：您的不少论文选题很新颖，且有以小见大的特点，如大家所熟知的《刘勰的两个梦》、《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等文，这是否是您的学术追求？



在江苏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1周年座谈会暨紫金文化奖章和社科名家表彰会上，周勋初先生（中）荣获表彰。

周：这里可能有些老师的影响，胡小石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我虽不才，但也追求创辟之功，写论文时，总想发前人未发之覆。大作家和重要著作中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挖掘出更多的深层涵义，这样才能显示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和思辨能力。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我又把注意力慢慢转到小问题上，为此写过《“芳林十哲”考》之类的一批论文，企图采用“小题大做”的手法，通过一些他人注意不够的社会现象，揭示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依此形成个人的治学风格。

这些论文题目或角度好，还可能与读书时注意发掘疑点有关。既有疑点，就得解疑。如我在阅读《三国志》时，发现内有曹氏“三世立贱”之说，这与历代帝王之家情况大异。何以如此？我从曹氏家世论及曹操的突出之处，说明他改变社会风气的努力，从而对建安文学作出新的解释。又如文体论中常引“登高能赋”之说说明赋体产生，我就觉得里面有个概念转换的问题，因而写作《“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对后人以经说立论，吸收山水诗等创作经验，用“登高必赋”说替代儒家诗论的过程作了考察。这种穿穴式的论证方式，在目下的《文心雕龙》研究中，似乎并不多见。

你说到的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82年，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中，这种特色可能更为明显。

我总想在学术研究中闯出一条新路。这种用材料的方式，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后来在我的唐代文学研究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如对笔记小说材料的运用。在正史本传中，重要人物的事迹往往都写得四平八稳，较难看出人物的

性格，韩愈在正史里的形象是正义凛然的，我写《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利用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展现一个更为复杂丰富的历史人物形象：韩愈曾经恶意嘲弄至亲至敬的同年崔群，刘禹锡批评此举为“轻薄”；韩愈平时还有矫激、尖刻、好胜、重名的毛病。王运熙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后，以为我的新见主要得益于研治唐宋笔记小说而发掘的材料。傅斯年有“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的说法，认为官方记载和私家著述互有短长，必须对勘互读，不能偏于一端。研究唐代文学，如果只是依据两《唐书》纪传和文人别集，忽略了笔记史料，恐怕很难得出新的结论。

我觉得考证文章中增加一些小说笔记的材料，能使气氛生动。当然，这类材料的使用得有限制，看用在什么地方。假如把这用来考察某一件事的背景，说明其时的社会风气，就很有说服力，应该发掘这类材料的深层涵义。《刘勰的两个梦》写得比较充分，还不全在于对于两个梦的象征意义的把握，应留意文章后半部分如何展开，即要注意到当时许多文人都有梦到多彩之物的现象，盛行一时的占梦风气，以及说梦与玄风之间的关系。文章要看到后面，才能看到深处。

徐：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主导古代文学研究的局面，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得到转变，一系列的文学家年谱和以考据见长的著作出版可视为标志。您在1980年出版了《高适年谱》，为何没有以同样的研究方法作李白研究？

周：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考证确实作用重大。但考证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文学有文学的特征，它不是史学，更不是自然科学。我做

《高适年谱》，对高适在天宝八年登有道科之前的行踪，没有十分的把握，只提供一种或可被大家接受的解释，因为史料不足。考证在面对较为特殊的对象时，有不少局限性。如研究李白，要对其生平考证得十分精确，就很困难，因为他结交的人中大都为中下层的无名人物，漂流各地，文献记载很杂乱，自己的诗文中也少明确的时地记录，考证起来，就有难度。这就得考虑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李白。

徐：您从文化背景角度研究李白，首先作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一文，引人注目；还有“剔骨葬”那篇，也很受人关注。请您简要谈谈相关研究。

周：我读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时，看到里面关于剔骨葬友（吴指南）的记载，也就想到了剔骨葬这一不见于汉民族中的葬俗，从而根据他生活地区绵州昌隆县的地理位置，说明他曾受到南蛮文化的影响。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还介绍他就婚相府，说是“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遂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矣”。这又引起了我的好奇。所谓“就婚”，即入赘之意。中国向来贱视赘婿，而李白言下还不无得意之感，许相国家孙女去世之后，他又到宗相国家去入赘为婿，这样的行动举止，与汉族文人很不相同，应该与他的家族背景有关。这就使我想到，李白此举受到了突厥文化的影响，因为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西域的游牧民族中还保留着更多的母系制社会的遗痕。

李白生于安西四镇最西端的碎叶附近，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托克玛克附近，这与杜甫等人的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他成长的地方，处于今四川省西北部，正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我自研究《九歌》始，对中国民族史一直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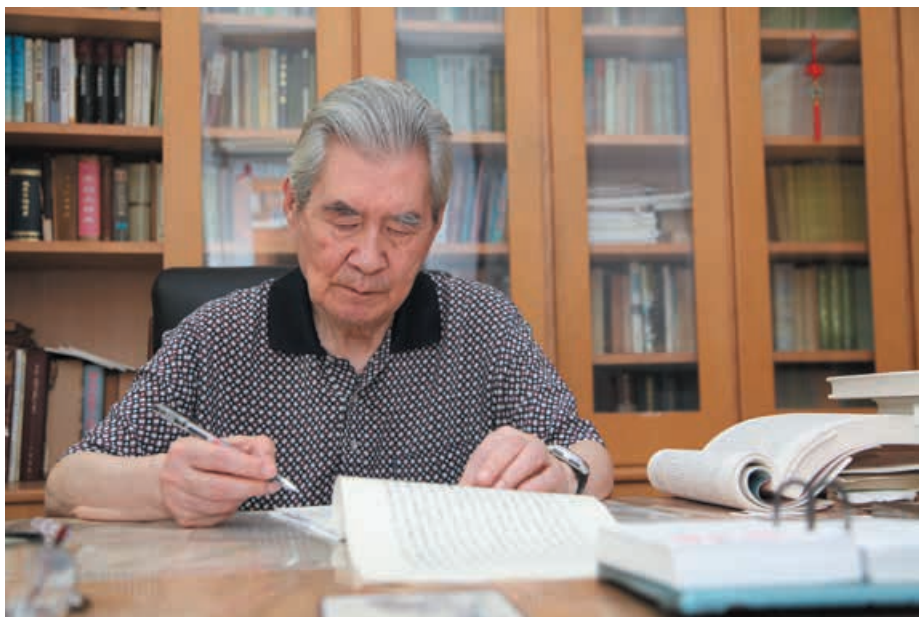
兴趣，对羌族的活动也很关注。这时我从李白《登峨嵋山》中的“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几句诗中又得到启发。骑羊子即羌族神仙葛由。羌人尚白，李白诗中多用“白”字，如白龙、白鼋、白龟、白鹿、白兔、白虎、白鹦鹉、白蝙蝠、白石等等，不一而足，随后我就写了《李白与羌族文化》一文，畅论李白与羌族文化的种种关系。通过上述考察，我将李白定位为“多元文化的结晶”。可以说，这是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探讨后，才得出的结论。

大家知道，李白笃信道教，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巴蜀地区本是道教的发源地，而他出川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爱名山入剡中”，则似显得突兀，大家对此似乎不太容易理解。

我对江南神仙道教的历史与传播也作了考察，引用了《五岳真形图》等材料，说明“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不光注目于风景的佳丽，还醉心于神仙的出没，因为道教中的神仙大都隐显于名山秀水之间。浙东之地，赤城、四明、天姥、天台，都是李白神往之地，所以有《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名作传世，他对金华牧羊儿的向往，抒发对赤松子的追随意愿，又可与皇初平的牧羊故事联系起来。宗教的传播，神仙的流动，看似飘渺无稽，实则有其统绪可循，一一追踪解读，也是治学中的一件快事。

徐：您的这些推论与研究很有趣味，初看觉得有些惊险新奇，但将它们与其他信息联系起来看，又觉得言之有理，能站得住脚。您写这些文章时有什么感觉？

周：你有新奇惊险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文中的见解与角度不同于一般所造成的。我的《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不少人读后也有同感。曹氏三代都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三国志》裴注中就提到过，但一般认为这



周勋初先生近影（吉强 摄）

一现象是曹氏家族的非礼妄为，却不挖掘其中的深层涵义。曹氏这么做，不但有阻止后族干政的目的，还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这样的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影响深刻。

总之，这些研究，在运用材料、设计视角，以及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时有新颖的发现与发明，但这种新，并不险怪，而是在法度与情理之中。

三、接续具有情意的讲学传统

徐：我们在研究所里听您讲掌故，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多钟点。这些掌故里面有许多前辈学人以及自己治学的心得，包含许多学术史方面的文献。请问这些掌故从何处得来？

周：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闲聊，可能就跟这些师辈的作风有关。因为我喜欢泛读，又有喜奇好异的习性，对小石师一辈来说，均

属晚年弟子，童言无忌，提问题时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结果常能听到好多不易获得的知识。但是随着革命秩序的建立，一切要求正规，课堂讲学已成接受知识的法定途径。而且班上的学生也多，大家如果都去老师家中请教，也势必难以招架。

我与这些师辈前后相差近半个世纪，谈话内容，也就不易找到共通的关注之点。小石师常与老学生吴白匋等人谈清末掌故，跟我们一辈谈的就少了。但也多多少少听到不少。现在江西义宁陈氏家族史的研究很受人关注。我的老师中有一位陈方恪先生，因为他排行第七，大家都叫他陈七先生。他是个公认的才子，诗文水平特高。解放初期他在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胡先生请他来为我们研究生讲版本目录。陈七先生喜欢清谈，不好好备课，有一位革命第一、学习第二的学生就贴大字报炮轰他，吓得他不敢来了。我倒很喜欢听他讲前朝掌故，所以对炮轰他的人很讨厌，但也无可奈何。

时至近代，社会转型加速，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断受到冲击。我的几位老师虽然已经不是书院出身，但前时的流风遗韵尚存，他们的师辈也喜欢有年轻人前去提问。小石师学问博大，他最佩服的学者是乡先辈沈子培先生，当时沈氏以遗老的身份退隐沪上，小石师则寓居清道人家中，沈子培常说年轻人可以带一些问题去谈谈，当时出入沈府的，还有王国维等人，都对此老的应答如响开示门径表示钦佩。根泽师常说，当年钱玄同在北京，喜欢年轻人去谈学问，提问题，他承此学风，也喜欢学生带问题去，他的研究生却不上他门，也不带问题去，这让他深感失望。

徐：我曾听徐兴无教授说，他跟从您读博士时，师生交流似乎以面谈为主，而类似现在的教室上课不多，似乎不用上那么多课程，但学术研究照样做得不错，这是什么原因？

周：这种上课方式，如《师门问学录》中所展现那样，是比较传统的教学方式。旧时书院讲学，往往有弟子问老师答的“问答”记录。这种学习，有从游之乐，有观摩濡染之效，还有感情交流，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这种教学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形成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能使教师奋发向上，只有不断努力，全身心投入教学，不敢松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只是目下情况有异，除了不能一对一地教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多的是专家型导师，而没有通人型导师。我不是通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我从先秦到晚清的学术与文学都能讲讲，所以还能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与学生面谈或闲聊，实际上类似中医里面的把脉，可以从中发现学生的才性，他的所长和所短，然后有针对性地调养培育。

徐：记得您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向博士生介

绍治学经验，说读书治学，要用六分精力与时间去泛读，用四分去精读。二者若能协调好，则能培养起笼罩全局的气概，并能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我当时有些惊讶，因为现在似乎更看重精读。您为何如此强调泛读？

周：我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也是个人经验的总结。现在教育领域内专业的学习更趋细密。以中文系的教师而言，有的只讲文学史中的一段，或是只讲某一种文体，有的教师毕生只读一本书，如《文心雕龙》；有的只研究一个人，如李白，或杜甫。这样做，也就是所谓单科独进。然而快则快矣，效果却未必好。一些教师对研究对象的情况确能迅速掌握，却未必能深入。因为就其所钻研的一本书或一个人而言，实际上牵涉面很广，就以《文心雕龙》而言，阅读这书，不能不对先秦至梁代的典籍与众多人物，乃至时代思潮社会动向都得有所了解。阅读一部书，不是只认识这部书中的一个个字，他对这些字中的含义都得有足够的了解。

用苏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者，也包括某些采纳欧美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专家学者，最常见的是一些博士论文型的学者。这就是说，他们在做博士论文时下过一番功夫，等到取得学位，参加工作后，一方面已很少有精力再去进行开拓，一方面此前积累的资源全部花在论文中，已无多余的资源可用，也无能力再行积累，于是就吃老本，躺在博士论文上吃用一辈子。处在这种情况下，势难涌现出什么杰出的大学者。我们把当下的学者与前相比，发现目前活跃于学坛的大都是一个一个小专家，已经少见堂庑博大的学者。

过分偏重专业的训练，忽视与之相关的学术，而从观察源流演变的角度看，对中国文化

的传统缺乏基本的了解，显然也会产生不少局限。事实也已证明，过分强调专业，过分依赖科技，忽视大脑思维的融会贯通，同样无法取得满意的成绩。因此，传统与现代的沟通与结合，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仍有很多问题要探讨。

徐：据我所知，您的《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在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研究领域，是很重要的著作，经常被引用。这本书在研究生教学方面，也有其独到的价值。请您稍加解说。

周：《当代学术研究思辨》是我在1987年主持“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我的研究思路是对当代学术研究的演变和发展规律分别进行探索，总结学者治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就教学而言，这本书中的第四组文章，选择王国维、陈寅恪的五篇代表作进行评析，也是一种细致的专家研究，影响较大。

我们如果只是讲资料，讲考证，文章看上去就没有灵气。如果学生一天到晚讲文献，不读些空灵的文章，脑筋就很死板。所以也希望他们多读陈寅恪的文章，多读闻一多的文章。他们的文章空灵，让人懂得如何触类旁通。陈寅恪还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说学者要有品格，不能人云亦云。他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见，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比如陈寅恪讲李白是胡人，我也不相信。但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启发性大，让人好好地考虑这些问题。好文章要能启发人，引导他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徐：《师门问学录》是一本很独特的书，这本书似乎可以看作一种传统讨论学问方式的遗存，所以书一出版，就很受人关注。凤凰出版社2004年出版，2010年出了马来西亚版，2011年凤凰出版社又出了增订本。这本书，对目前

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国学教育，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价值。请您谈谈这本书在指导学生方面的意义。

周：《师门问学录》的问世，情况比较特殊。我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只招了余历雄一个博士，所以我还能慢慢地、细细地用一问一答的方式给他讲。这个学生非常有心，把我讲的都记下来了。我看了后也觉得内容很好，觉得书中保留了一些传统。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方式，达到教学相长。此外，书中还有一种师生情谊在。

儒家的教学内容，不仅是传授知识，还包括对学生整个人格的熏陶。这种传统延续了很长时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教学方法中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目下教学方式则更讲求制度化。所谓制度化，也就是用大规模培养理工科人材的方式批量加工，犹如工厂里大规模生产产品一样。又因研究生扩招，要完全恢复传统讲学模式已经很难了。反正中国每过十年、二十年在教育学生的方式方法上就会有变化，西化之风越来越起主导作用，传统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教学方式能否占有一席之地，已难确说。但作为一种优秀教学传统，某些方面继承下去很重要。

徐雁平 男，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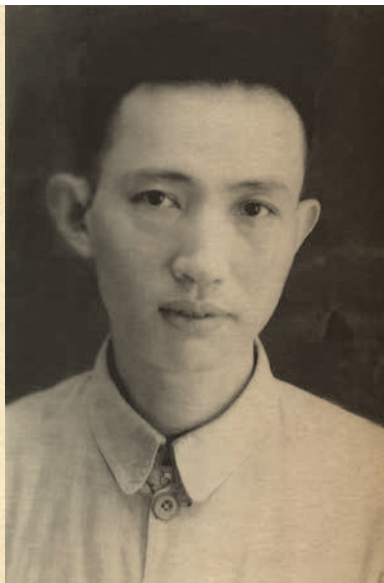
名人档案

江苏省档案馆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
出品

编者按：近百年来，在江苏钟灵毓秀的大地上，留下了很多文化名人生活、成长的足迹，本刊从本期起新辟“名人档案”栏目，由江苏省档案馆和我院合力打造，将以馆藏档案资源作为支撑，以民国以来江苏文化名人为主线，以图片丰富、文字生动为特色，力求文化性、统战性、可读性兼具，探寻文化大家的成长历程，挖掘本省丰富的文化资源，以飨读者。

关于傅抱石早年经历的若干细节

III 万新华



青年傅抱石

不久前，笔者前往江苏省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在傅抱石档案中发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涉及傅抱石早年经历，能进一步补充说明其早年生活若干细节，对他早年心态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这些材料，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傅抱石留学日本赞助之细节，其二是中央大学任教经历和政治部第三厅任职之经过。

一、关于留学日本赞助之问题

如今的大多研究者一般认为，傅抱石曾得徐悲鸿（1895-1953）推荐、帮助而留学日本。一些回忆性文章或研究论文多有相关叙述，有的传记则以大量的笔墨演绎了这段艺坛佳话，譬如“徐悲鸿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大力推荐傅抱石，建议由江西省资助留学”，并又如何与熊

式辉周旋等等，语言声情并茂，情节曲折生动，令读者意犹未尽，几乎深深地为两位大师之间的交往所吸引。众所周知，徐悲鸿乐于提携后进，好多画家都得到他的帮助，其中也包括傅抱石。多年来，这些传记文学式的叙述使这段往事在中国美术界流传极广。但是，这段为艺林所津津乐道的徐、傅之交的故事，似乎至今无法确定其清楚的材料来源。

提及这件轶事，笔者并不是要作简单的判断，仅作必要的补充说明。在江苏省档案馆藏傅抱石自述材料中，他特别提及了一位名叫“罗时实”（1903-1975，字佩秋）的少年知交。查考其政治背景和经历并结合傅抱石的自述，笔者几乎敢肯定罗时实在傅抱石留学经费赞助问题上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不可忽视。傅、罗两家乃为近邻，据张光宾披露，罗家在南昌有事业，主事之人曾资助傅抱石完成师范学业。1926年，罗时实与傅抱石相交，感情甚笃，始知资助他的人是罗家主事。张光宾在《追怀与感念——纪念先师傅抱石逝世十九周年》中写到，1948年，傅抱石夫妇回到南昌，谒见罗时实父母，叩拜谢恩，认为义父母。罗时实先后求学于东南大学、北京大学、英国伦敦，每逢暑假回家必看望已任小学教员的傅抱石，关系甚密。而且，罗时实对傅氏早年生活帮助极大。

其时，傅抱石、罗时实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两人同在江西省党部工作，傅是宣传部干事，罗是秘书处干事。但与傅抱石不同的是，罗时实在政治倾向上是典型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伐军攻克南昌的一个月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右派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驻南昌，南昌一度成为中国国民党极右势力的集聚地。罗时实便是陈果夫麾下AB团的主要成员。1927年4月2日，时任江

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 江苏省档案馆藏

傅抱石手迹 江苏省档案馆藏

西省国民党党部委员的罗时实被左派人士羁押并游街示众。“四·一二”事变后，罗时实正式投靠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成为CC派的重要亲信和主要骨干。不久，罗时实前往南京，一度在陈立夫创办的《京报》工作，1931年，任浙江台州专员，后成为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抗战时曾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秘书（陈果夫时任第三处主任）。1946年，罗时实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49年去台湾后曾执教于中国文化学院。

20世纪二十年代，江西一直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地区。经过一系列社会、政治跌宕之后，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傅抱石在1930年7月正式脱离中国国民党，继续从事中小学的美术

教育工作，并开始“自矢终身”地向艺术之途进发，用他自己的话说，“向金石家、画家的前途追求、向教授的目标追求”，决心要成为一名教授、画家。（傅抱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学习”个人书面总结》，江苏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个人书面总结》）

但平步青云的罗时实并未因此冷落傅抱石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两人的关系并未中断。1931年暑假，傅抱石与罗时实结伴由南昌来到南京，在九江适遇陈立夫过路去长沙。在“公和”轮上，罗时实向陈氏极力推荐傅抱石，称赞其才华，并请陈氏有机会资助其出国——这是傅抱石初识陈立夫的情况。后来，罗时实还为出国事宜去找已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并拍过一个电报给于1931年12月15日被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的熊式辉，请他帮助傅抱石出国。熊式辉先后两次以江西省政府的名义补助了傅抱石留日学费1000元。留学期间，罗时实还曾邮寄200元资助傅抱石。（傅抱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学习”个人书面总结的补充材料》，江苏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补充材料》）大约就在这一时间，傅抱石为罗时实镌刻过一方鸡血石名章，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此章印拓收于其1933年7月自编的《傅抱石所造印稿》。

1946年4月，傅抱石创作《隆中对图》赠予罗时实，题云：

佩秋我兄，去冬命写《隆中对图》，流亡蜀中，书卷阙如，每欲报命，均以不得可观之制，中怀惶恐，惭无可喻也。近辱损书，谓先返南昌，畅叙天伦，即将赴外，藉觐战后世界之得失，并属行前可握此帧为慰。予自奉瞻对，已二十年，其间解衣推食，护掖无所



1935年5月，傅抱石留影日本东京银座松坂屋《傅抱石氏书画篆刻个展》展场

不至，然予所答于兄者何耶？每当山阪雾重，就时慧放言往昔，未尝不汗出如浆，有愧故人也。兄知我爱我者，敬乞有以教之。丙戌三月十二日，时居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山斋。弟抱石并记。

（叶宗镐：《傅抱石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这里，傅抱石道出两人不平凡的交谊，情谊浓浓，十分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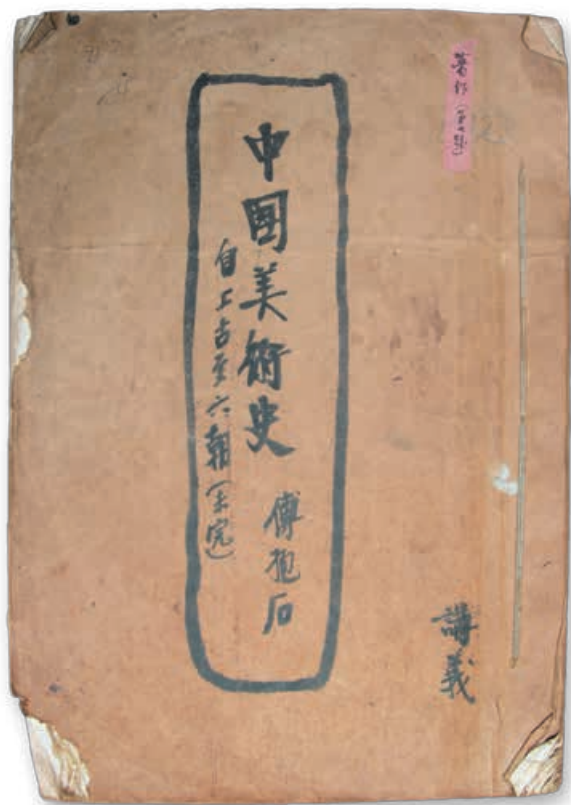
与后人叙说不同的是，傅抱石在自述材料中，并没有谈及徐悲鸿对其留学赞助问题上的任何细节。尽管如此，笔者结合后人的诸多回忆仍相信，徐悲鸿在傅抱石留学学费赞助问题上应该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认为徐悲鸿在当时条件下发挥决定性影响，显然是不太符合实际的。笔者以为，在古老中国几千年形成的讲究人情世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仅以徐悲鸿一人的推荐之力似乎不能轻而易举地成功办成。在1952年7月1日填写的另一份材料中，傅抱石还提到了南昌名士彭醇士（1896-1977）在1932年也曾向熊式辉进言补助留学一事。（傅抱石：《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乙表，江苏省档案馆藏）傅抱石在自述材料中提到，青年时期的他为了艺术理想曾以一技之长（篆刻）与南昌文化名流交流、学习、切磋，彭醇士就是他时常拜访的师长。

就以上说明，罗时实凭着和陈氏兄弟的关系，在傅抱石留学经费赞助问题上的确存在牵线的作用，而彭醇士也显然存在推荐之功。更主要的，这是傅抱石自己撰写的材料，确实无误。笔者特地提及这个细节，供研究者参考。当然，傅抱石在以后的生活中为了生计也曾数次向罗时实求助，已是后话。

二、关于中央大学任教和政治部第三厅任职之细节

1935年9月，因母丧回国的傅抱石经徐悲鸿推荐，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兼任讲师，讲授中国美术史课程。那时，傅抱石为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始终坚持不懈，生活十分艰辛，心态也十分复杂。他曾自述，“回忆起来，老实说，我是怀着万分自卑的心情走进中央大学的大门的，因为我是日本留学生，除了徐悲鸿先生和我接近外，连助教也不睬我。”（傅抱石：《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学习自我检查》，以下简称《自我检查》）“我课既不多，就拼命写文章、搞著译”，一则以稿费维持生计，二则以学术探索成功之路。（《个人书面总结》）

1936年夏，傅抱石得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书面通知，谓高剑父来校专任教授中国美术史，下半年将很难续聘。当时，徐悲鸿已离开中央大学去桂林，无人转圜。为了生计，傅抱石便托好友廖季登（时任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转托其同班好友程天放（曾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时任外交部驻德国大使），由程再转托萧铮（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系主任），引荐给张道藩（1897-1968），谋得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美术组专门委员一职（其他有宗白华、丰子恺、刘开渠、孙福熙等6人），研究艺术提倡事宜（后因抗战取消），时张道藩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立夫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傅抱石结识张道藩之始。同年9月，高剑父由中央大学学生孙宗慰、文金扬引路专门造访傅抱石，言因高氏不能担任中国美术史课程而学生又急需此项知识，邀请他继续担任此教席。为了照顾学生的求知愿望，傅抱石以代理名义继续授课。



傅抱石《中国美术史讲义》油印本 1935年 南京博物院藏

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专任教员也随迁，而兼任教员一律解聘。傅抱石便随中央文化事业委员会迁移安徽宣城，开始编撰激发抗敌激情的《明末民族艺人传》。不久，傅抱石在《申报》上读到郭沫若《在轰炸中来去》，得知郭沫若已在上海，曾向中央大学电话打听过自己的去向未果后去寻查田汉、阳翰笙等人。傅抱石获悉后，便往上海给郭氏写了多封信，告诉其自己在宣城的相关情况，但未得复信。1938年4月，已辗转回到江西新喻老家躲避战火的傅抱石，得到了刚在武汉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来信，旋即启程前往武汉投奔，以额外中校服

务员的名义在秘书室工作，成为最早到达武汉参加三厅工作的人员之一，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战洪流之中，为抗战起草文件，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据傅抱石自述，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举办抗战纪念周活动，蒋介石因陈布雷卧病命政治部第三厅草拟《抗战周年告世界各友邦书》、《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七七周年祭阵亡将士文》等相关文件。郭沫若便命傅抱石、田汉、阳翰笙等人同时执笔，蒋介石最后采用傅抱石草拟的初稿，其原稿上留有蒋氏修改处并钤有上级印章，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上缴作展览用。（傅抱石：《补充材料》）后来，傅抱石一直跟随郭沫若左右，往来于株洲、衡阳、东安、桂林等地，经历了“武汉保卫战”、“长沙大火”、“桂林大轰炸”等一系列事件。1939年5月，傅抱石辗转来到四川重庆，定居于巴县赖家桥。

不久，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吕斯百和学生艾中信等人获悉傅抱石已来到重庆，一再来函邀请其回校兼授中国美术史，因为当时中国美术史课程已停了两年。

此时，傅抱石重新燃起了追求艺术的理想之火，在仔细思考后准备回校兼课。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材料中是如此述说当时心态的：

1、我一生为了中国艺术而努力，只有中大有此系科，我有过一段关系，是应该回去的，也和我一向的志愿符合的。

2、第三厅的工作，从对我个人发展看，前途有限，尤其对我的专业有妨碍，而且从来就是额外人员，虽然一年两年的整编工作，总是我打头名（中校街上校待遇）。

3、蒋（介石）对第三厅的歧视日

见加深。

（傅抱石：《补充材料》）

1939年9月，傅抱石担起了中央大学兼职讲师（月薪72元），每周一次，当日返回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但是，第三厅是军事单位，绝对不允许兼职。出于这个原因，也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生计（人口多），傅抱石曾写信给已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秘书的罗时实，请他帮忙向教育部长陈立夫进言，希望能谋得一个教育部特约编辑的兼职（月薪100元）以贴补家用。而罗时实回信，说某天碰到已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处主任的张道藩，他正忙于负责国民会议选举事务，想急聘一个办公室编辑处理日常事宜，同时拟组织中华全国美术会，因傅抱石是做美术工作的，且熟人也多，有意请他去应职。当然，这出乎傅抱石意料之外。他虽不情愿而痛苦了很久，但为生活计，还是应了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处编辑一职，坐班制，日常工作如筹备中华全国美术会、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等事宜以及处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人事等行政事务。工作之余，傅抱石开始撰述《石涛上人年谱》。1940年7月，他不堪忍受张道藩的领导作风和烦琐的行政事物而坚决请辞，为此还引起了张氏强烈不满，罗时实也数次来信责备。（傅抱石：《补充材料》）

在兼职中央政治学校前的1939年12月，郭沫若从乐山处理完父丧回到重庆，傅抱石向郭氏提及中央大学教职之事，并请辞政治部第三厅之职。据他说，郭沫若当时感到十分伤心，这成了他坚决辞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处职务的原因：“记得那时，郭老说一声：现在形势如此，我们就划整为零吧！……不久在一次晚会上，郭老在讲话中说到，我们有两个同志——傅抱石、邢逸梅，回到自己的原来岗位上去了，我



傅抱石《水木清华之居图》1932年 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美术资料图书馆藏

希望我们的友谊不因此而变更。那一晚，我流了不少的眼泪，决心在以后的事实中赎我的罪。”（傅抱石：《补充材料》）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治学校是党政学校，专门培养国民党从政干部的，与傅抱石的专业兴趣大相径庭。他果断辞职，全心全意地回到了自己的艺术事业的追求道路。

1941年8月，傅抱石由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兼任讲师”升任“专任副教授”。从“兼任”到“专任”，傅抱石完成了自己个人事业上的一个转变。从此，他的教育生涯正式确立，生活也逐渐稳定。

叙述这段早年经历，一则真实再现傅抱石为家庭生计忙碌的来龙去脉，二则借此分析傅抱石追求事业的执著精神。无需否认，谋一个正式的职业成了傅抱石早年经历中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我们从他的几次选择中就能体会得到。多年后，傅抱石在自述材料中感慨：

当一心一意想回中央大学准备辞去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我考虑到老在三厅（我一直是额外人员）从对我没有多大前途的，尤其对我的专业有妨碍，就中央大学将来改为专任的关系来看，也是很好的。

（傅抱石：《个人书面总结》）

那时，傅抱石为谋生生活十分艰辛，心情当然十分压抑。毋庸置疑，早年较长一段的颠沛流离的谋生，造就了傅抱石朴素持守、干练尽职、务实忍从和积极进取等人格品行。对一切以谨慎、务实、踏实的态度来看待和取舍，将自己紧紧地与人情世态的甜酸苦辣联系在一起，成了傅抱石一生的处世风格。因此，坚持全面发展的理想也成了傅抱石人生奋斗的目标，正如他1958年6月所写的批判材料中所说：

今天我坦白地承认，若是我在中

央大学是专任，可以随校到重庆，我可能就不会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专家，就是大学教授，从来也没有别的。

（傅抱石：《自我检查》）

这是傅抱石在特定年代就“个人主义”所批判的自白，虽然为迎合时代潮流而自我贬低，但我们无不体会得到傅抱石内心那种追求艺术的诚挚热情，从中了解傅抱石的奋斗历程。当然，这就是笔者揭示这段史实的初衷和目的。但需要强调的是，有些“自白”的语言可能比较直露，因此，我们必须得联系傅抱石当年叙说的时代语境。离开这一点，我们的理解难免会出现偏颇。这是必须注意的。

万新华 男，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漫说范扬

III 沙洲

范扬，1955年1月生于香港，祖籍江苏南通。1972年入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兼任南京书画院院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范扬

时的诙谐和戏谑的成分，庄重得让人心生敬意。

范扬是一位极具名士气的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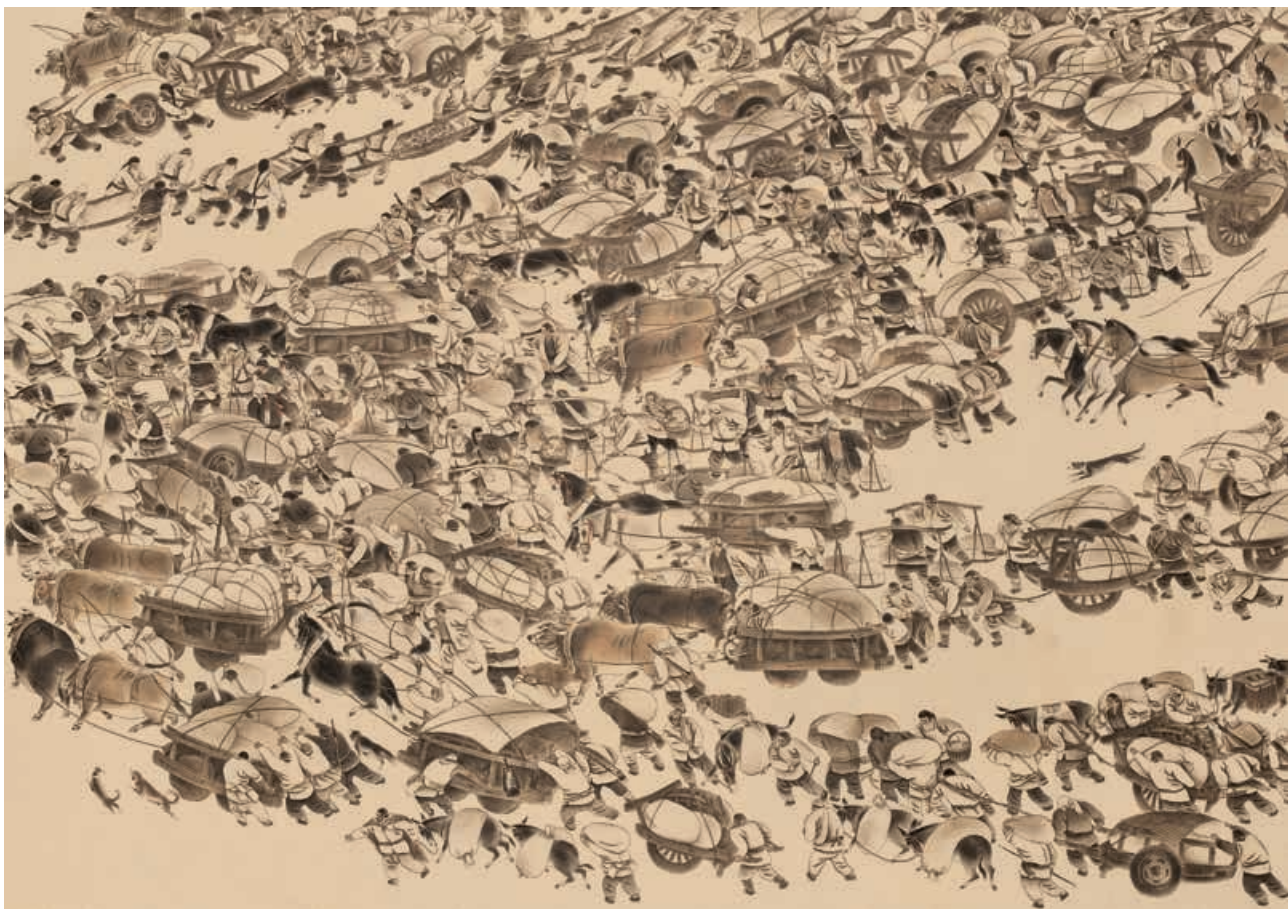
名士气，首先会让人想起东晋的竹林七贤，范扬当然不会像他们那般狂放不羁，更不会荒诞不经，他身上更多的有着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散淡。

时日如飞，声誉四播，范扬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范扬，依然是人到哪里，便把欢笑带到哪里，仍然是不拘形迹，横挎着那个小包，全无当红画家的作派。更难能可贵的是，岁月风霜可以让他慢慢变老，但没有消磨掉他的勇气和锐气，更没有抹去他的真性情。

朋友眼中可爱的范扬，他不会回避别人的“高度评价”，也不会忘记畅想自己的大抱负和大目标。他言之凿凿地讲到要成为一个历史性的画家的时候，语气里已经全然没有往日和平

作为一个接受过正规高等美术教育，而且又在大学美院担任过院长、博导的画家，范扬在美术特别是中国画方面经过了极为严谨的训练，有着深刻的体悟。尤其是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他有幸沐浴了思想解放的阳光雨露，还有机会得到劫后余生的名师大家的亲炙教诲。

范扬曾经说过，他在传统里浸润了十年，以后，又师法自然，钟情造化。这样的艺术成长轨迹，也是一批开宗立派的画家如徐悲鸿、傅抱石、吴冠中等等走过的路。这样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经过导引，少走弯路，比如他会老老实实地去画《八十七神仙卷》，体味吴衣带水



范扬 支前 1985 年

般的线条之美，典雅高贵的造型之美；他会从徐渭、董其昌的画中，感受“前人智慧的光芒穿越时空”；会从一直被贬抑的王时敏、王原祁画中，体会集大成者的精微。当然，最多的收获是，他博览群书，研习画理，胸中蕴蓄了对中国画、中国美术教育深入的思考，这也是他以后艺术得以喷薄而出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对中国传统，太多人是不得门径，在门外徘徊；也有的进去以后，迷失自我。范扬的可贵在于“以极大的勇气打了进去，又以极大的勇气打了出来”。他尊崇传统，取法其上，后又以造物为师，养育心性，以其过人的勇气、智慧和才情，实现了艺术上的跃升。他一开始便

出手不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物山水，就以其飞扬的激情，酣畅的笔墨，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三

范扬是以人物画名世的。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幅在全国美展获奖的名为《支前》的工笔人物画。这类作品，往往会以题材重大、鸿篇巨制、人物众多取胜，但要真正摄人心魄并不容易，但范扬这幅作品却很能打动人。他以中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构建画面，用鸟瞰式来反映场景，在人物和马匹等物体的处理上，

还明显吸收了民间工艺的稚拙，看得出范扬是下了苦功夫的。画面上的那盏马灯取材于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某次，同为南通老乡的刘延淮看过作品以后告诉他，马灯是从她家征集的，她的父亲刘瑞龙当年在前线用过。种种巧合，让范扬惊叹于造物主之神奇，这当然是后话。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他创作了一组古典题材的工笔作品，大都是唐诗诗意图，画面雅致秀丽，于勾勒渲染中穿越千年，表达当代人的向往和理解。在世纪之交，他又有一批大写意的水墨人物，其中现代题材的《西藏望果节》、《农夫与耕牛》等，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工笔中可以见到典雅堂皇，透露出他对宋元的追求，而现代题材的作品，则是吸收了西方特别是塞尚、梵高的画风。

范扬喜作佛像，尤其是罗汉图。罗汉作为释迦牟尼的得道弟子，因其免厄度众、梵行少欲而受尊崇，也是画家的一个长盛不衰的画题。

《宣和画谱》卷二载有梁张僧繇所作十六罗汉像一幅，以后都有名作见于历代的著录，仅元以后，就有赵孟頫、钱选、吴伟、仇英、吴彬、丁云鹏的罗汉图行世，清末民初，王一亭的罗汉图一时流行。佛家对罗汉像除要求目端鼻正，身着僧衣切忌根残肢缺外，并无禁忌，也因此为画家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范扬的罗汉图法相俨然，睿智安详，形骨奇特，姿态不拘，其所着僧衣，或红或紫，又以红衣风行。提起范扬，人们说得最多的是他的红衣罗汉，也因此有人把范扬称为“范罗汉”。在他的佛画广受欢迎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范扬的“佛缘”，他对佛画亦有研究，曾专文对民国画佛名家钱化佛先生的十二幅作品，一一给予精到的点评。他曾为四大名山的普陀山设计了邮票，为九华山高达九米，长40米的巨幅石刻画了原稿，这些，似应看作是对他长期虔心写作佛像的报答吧。

范扬的人物画，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题材，



范扬 农夫与耕牛 2000 年



范扬 阿罗汉图 2013 年

或是宗教题材，都富于深刻的文化意义，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文人情怀。他承接了传统一脉，又有新的拓展，对传统题材又赋予新的艺术阐释。他的宗教题材的画，最大的特点是入世，即在庄严法相中，蕴含了人间美好的心愿，尤其是他的罗汉图，喜庆吉祥，慈爱智慧，受到海内外同胞极为热烈的欢迎，也使这一传统题材重放异彩，这也是范扬为中国画坛和宗教文化作出的一个突出贡献。

四

范扬的山水画别具一格，是最能见识豪迈浑大气魄的。

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使得文人对山水怀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深情，所以才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款款告白，



范扬 参悟图 2013年

也使得山水成为画家“以形媚道”，寄寓人生向往的最好的载体。

范扬的山水画与传统的山水画拉开了距离。他的画，远观则山水城郭立现，近看则笔性墨法可见。画中少见点、皴，大都用短线写出，却依然浑厚华滋。他自己认为这种线条得益于董其昌，也深受梵高影响。这种粗笔头的线条，中锋用笔，短促有力，似乎粗头乱服，漫不经心，

但笔笔有交代，全无滞涩浮滑，在律动的线条中抒写着气韵生动的现代意味。他近年所作的《山亭清话》、《从连云镇下眺港区》、《安卡拉之晨》等，其线条愈加灵动洒脱，并更注意彼此间的关照呼应，既跌宕起伏，又笔笔相连，而且墨气更为充沛厚重，画面更加深邃繁密，体现了他正大厚重的风格，也是其采撷精华、为我所用的成功实例。



范扬 花开四时香 2013年

我们可以在范扬的画中，看到他高迈的写生创作能力。写生既是他作为导师的本职工作，更是他亲近自然、外师造化的途径。他在皖南、京郊和西藏等地的大量写生，留下了一批精彩的水墨写生作品。在《湘西东南写生记事》中，范扬写道：“想当年前辈先生也作水墨写生，固然能以旧笔墨随新意态，但总觉得是‘为形所役’，不能自主。而今我作图画，物劝意动，临事制宜，心之所悟，随手应之，可以自作主张，是为江山主人，略与石涛八大亲近也。”这种在大自然面前所激发的感慨，已成为他艺术灵感的重要触点。面对大自然，他以禅宗“顿悟”的方式而“一超直入如来地”，心悟手应，瞬间笔下所呈现的已不再是哪个原来的山林丘壑，而是化景为境，形神交融，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

五

陆俨少先生说过，说一幅画好是神完气足，而画画的人首先要神完气足。范扬就是这样一个神完气足的人。

当今国画山水审美，皆以宋元为尊，精微为美，这当然无可厚非，只是对所谓粗笔头、大写意者，论者识者以及市场，大都并不待见。在这种背景下，范扬的出现和被高度认可，就颇不同寻常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范扬和他的画，也一直在考虑他的画为什么会受到持久的欢迎。以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的画中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有一种倔强，有一种阳光，不管人物也好，山水也好，花鸟也好，都是始终张扬着对生命对生活的礼赞。他喜欢的徐渭、梵高，也是有着元气淋漓的生命。范扬的笔下，从不



范扬 曲径通幽处 2011 年

長嘯一聲山鳴谷應

舉頭四顧海闊天空

癸巳范揚

范扬 书法作品 2013 年

见胆怯和懦弱，总是蓬蓬勃勃，让平常的山水现出了无尽的生机，映照出充满活力的精神。他的人物似乎在沉思，在默祷，周身闪现出人性的光辉，有爱有温情，还有着我们所罕有的哲思。花鸟也表现出倔强的峥嵘，连拙朴的书法同样让人感到不一般的力与美。

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范扬的创作状态让人惊叹，“落墨之时，风云际会，亦不知造化赋我以笔墨，抑或我笔墨暗合造化”（范扬语），我们可以想见他作画时的状态，完全是一种解衣盘礴、物我两忘的情境，如此成就了他的大气魄，同样显示了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强大内心。在他身上，家学渊源以及母亲一族剽悍的外族的基因，让他从小就具不甘人后的志向，以后人生的种种历练，磨砺了他不为世俗所羁的性格。更由于有了学养的累积，腹有诗书气自华，才能心中自信，充满阳光，无所挂碍，呈现一片自由的天地，传递阳光和希望。

六

客居京华的范扬，其绘事的精进是无可多议的，在其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的行事中，也留下了十年旅京的印痕，在他江南文人的灵动逸致中，掺入了北方的雄强大气，他的视界，也当然会更为高远。担任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副院长的他，还要带几十个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他的老本行，工作室模式则成为他培育人才的新的实验。讲课中，他绘画主张化作一串串连珠妙语，带学生出外写生，这对他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学生画出了好作品，他高兴，同时不忘叮咛几句：“要保持当初学画时的冲动喜爱和宗教式的热爱”，“养得好心性，要靠长期修为”云云。

不会安于现状的个性，让他在艺术上不会满足，不会守成，他也明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道理，也因此会在艺术上苦苦追求以期更大的作为。他同样不会放弃他的社会责任，为家乡为边远地区为困难群体，他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他和同是画家的太太潘金玲常常牵挂着甘肃山区“范扬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他应邀兼任南京书画院院长后，举行的一次展览竟然邀请到了全国30多家书画院的院长，“画坛的一次盛会啊！”他为此颇为自得。

“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这是范扬家乡南通狼山上的名联。范扬喜欢其中的豪迈和胸襟，因此也成为他经常书写的联语。作为文化家族南通范家的传人，范扬接受了深厚的家学文脉，这使得他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和才情，他也接受了家族的荣耀，让他始终秉持坦诚宽厚和大气。他感受更多更深的，则是一份文化传承的沉甸甸的责任，他知道，这是需要用一生用全部心力来进行的修炼。范扬严肃而庄重地说，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没有什么比文化的建树更重要了！

因此，正被热热闹闹包围着的范扬任重道远。

2013年10月8日于天厚斋

沙洲男，在省级机关任职，业余写作。

情真意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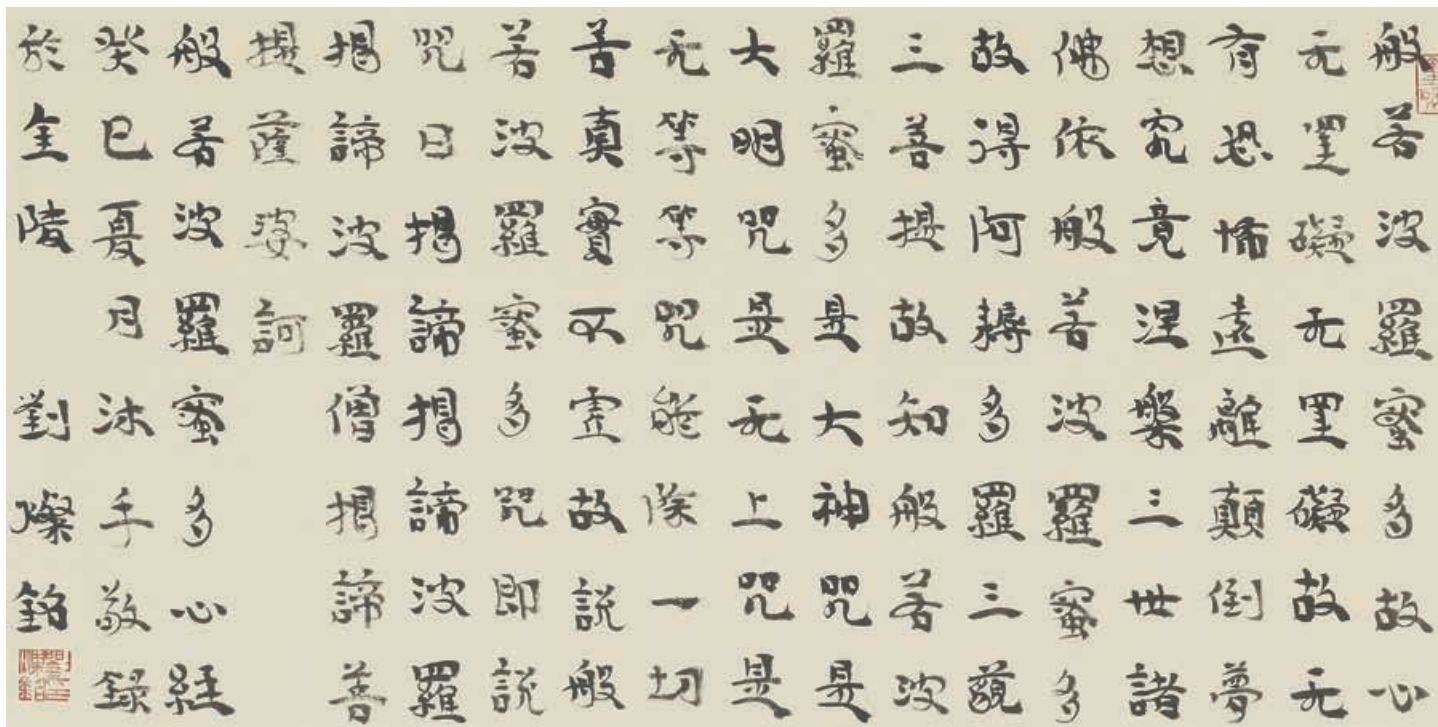
——读刘灿铭书法的点滴感受

III 张瑞田

刘灿铭，1963年生，江苏靖江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现代书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刘灿铭



刘灿铭作品

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我去深圳写作。行囊中有几本书,主要是与政治、文学有关的,其中还有两本书法方面的书,一本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本就是刘灿铭的书法作品《草书千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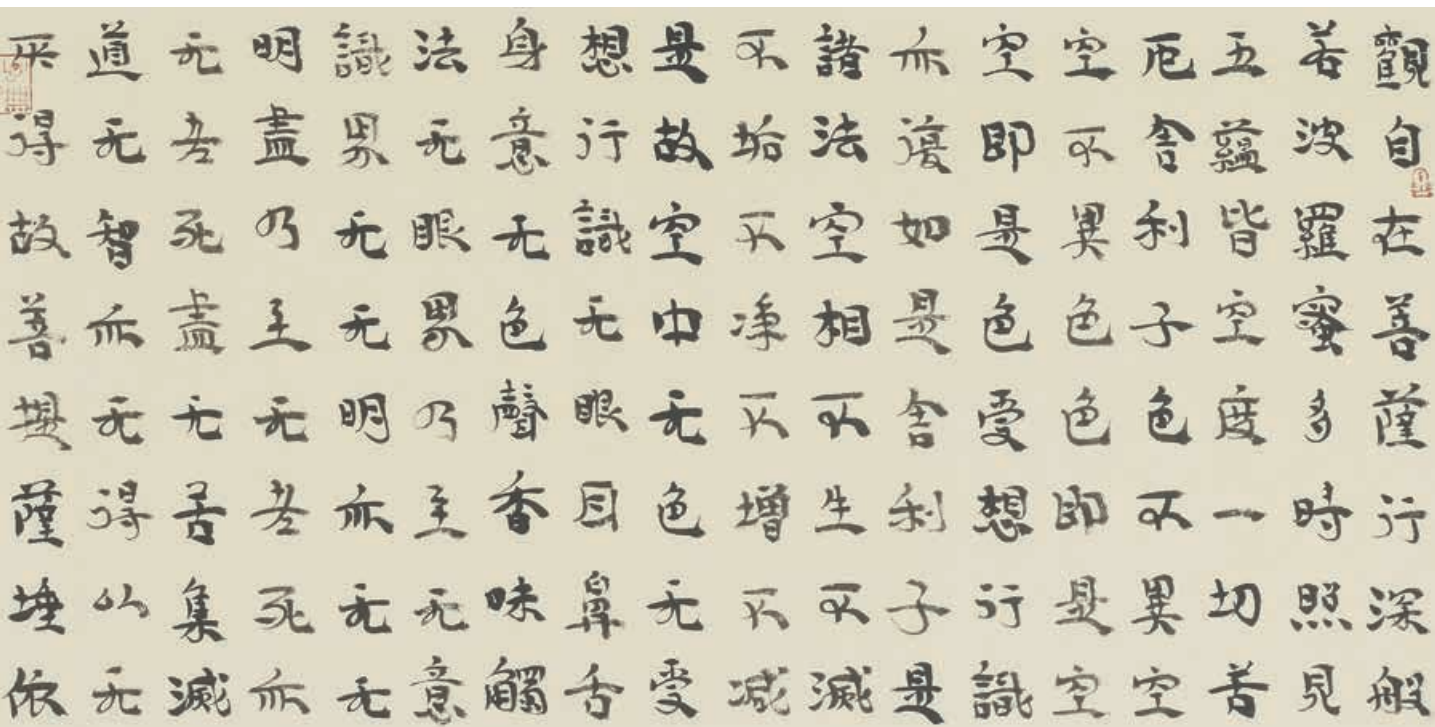
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书法的专门家,或者是有着某种追求的书法爱好者。看待书法的目光,始终是随意的、淡然的。书法带给自己的愉悦,只有自己知道。为什么十年前被刘灿铭的草书吸引,为什么阅读刘灿铭草书会有那么优美的心态?这样的问题,似乎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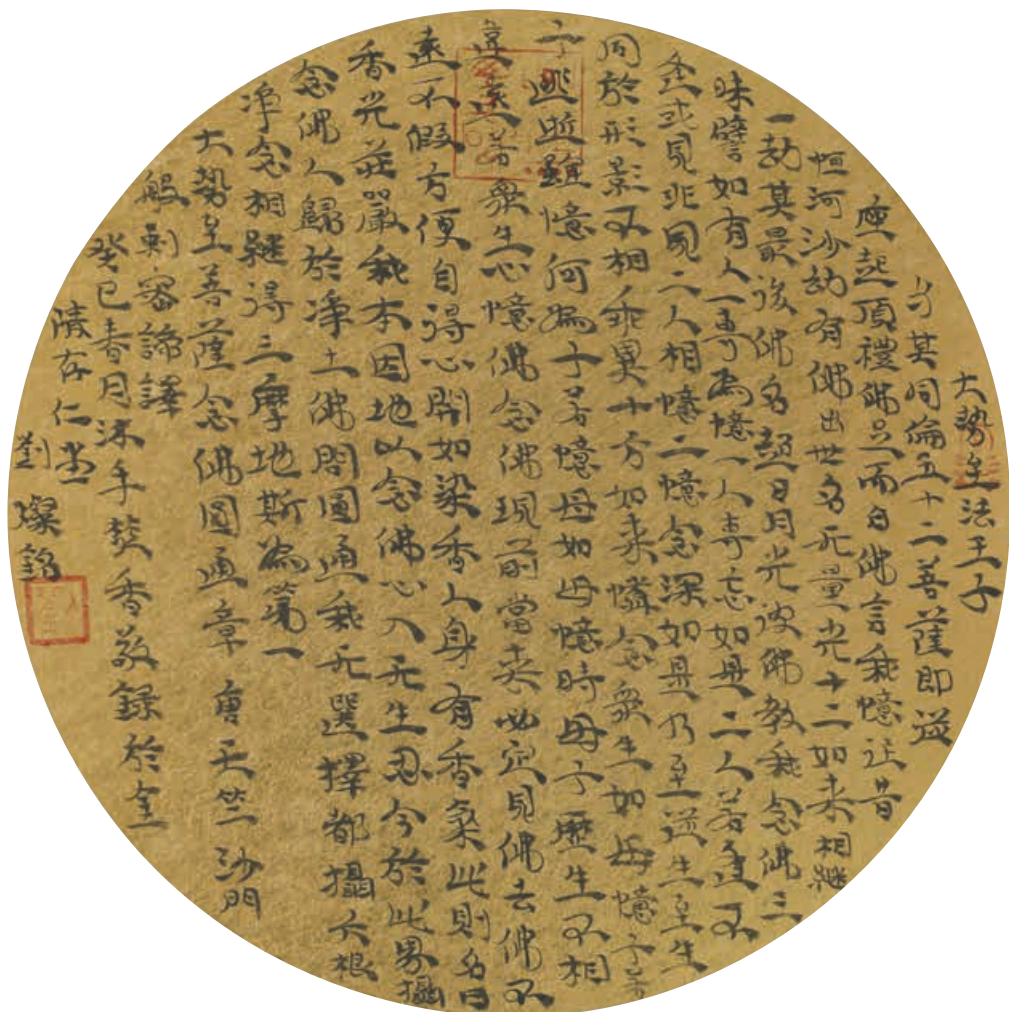
偶尔,会将自己欣赏书法的体会写成文章,积累多了,对书法的关注自然也就多了。这时

候,我才开始追问刘灿铭的“行踪”,原因很简单,2003年一段时间对刘灿铭草书的沉迷,有可能激活了自己对书法独有的情感。至今还记得,黄昏时分,一个人从荔枝公园穿过,回到住地,泡一杯绿茶,打开刘灿铭的《草书千字文》,自己便有了幸福的感觉。

是肯定自己的目光不俗,还是肯定刘灿铭书法创作的卓尔不群?几年后,当我有了一点书法的理性判断,我发现了刘灿铭独有的艺术色彩,发现了刘灿铭面对书法的别样目光。

我不知道刘灿铭至今如何评价自己十余年前的作品《草书千字文》,但是我知道,自己为何愿意阅读这本才情恣肆的书法作品集,自己又为何念念不忘。仰赖一个“情”字,是刘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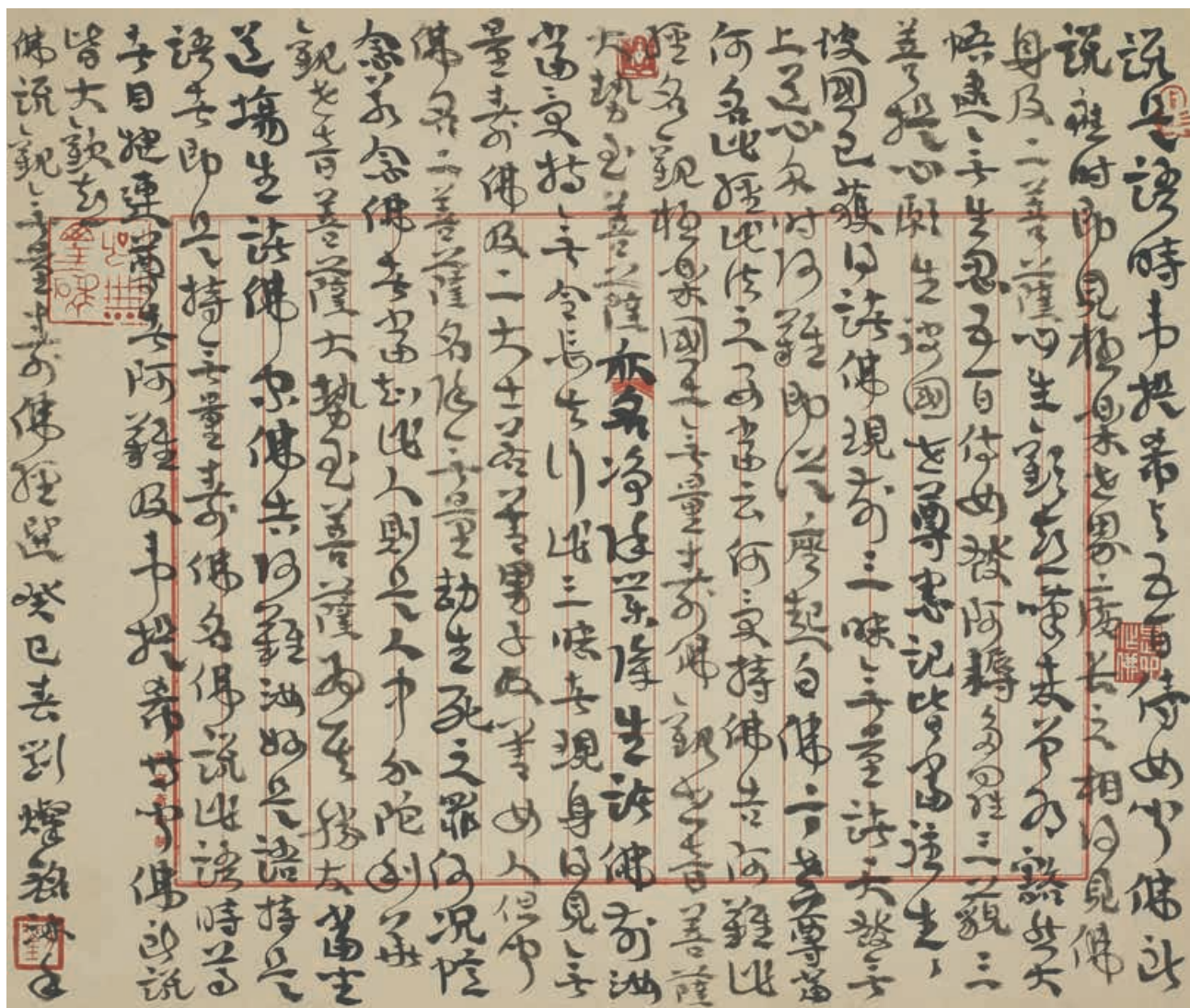


刘灿铭作品

铭的生命激情，丰富了他的书写，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与刘灿铭同龄，肖兔。许许多多的文章涉及到这样一个常识，肖兔者的情感丰富。而情感丰富，无疑是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基础。这样的理解和判断，在刘灿铭的身上应验了，的确，他的笔墨自始至终弥漫着浓郁的情感。恰恰是这一点，在十年前几近于放逐的深圳岁月，我被刘灿铭的书法陶醉。

刘灿铭是主观型的书法家。第一，他以积极的态度介入书法，审美的选择，首先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体验。不盲从，也不避讳，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上展现自己的心扉。第二，他具备对书法的认识高度，这种素质，也许是天赋、才华。正是基于对书法的认识高度，他才会得心应手地取舍。有所不为，才有所作为，刘灿铭深明此理。第三，创作过程中，激情是第一位的。因此，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再客观、抽



刘灿铭作品

象的线条，依稀可见作者的身影。他不想成为被动的角色。

通过以上三点，欣赏刘灿铭的草书，我们的感受会十分清晰。刘灿铭没有拘泥于局部笔法和墨法的互动，他一如既往地向前行进，手中之笔，随情逶迤，随性开合。有着高超笔墨驾驭能力的刘灿铭，对草法烂熟于心的刘灿铭，心无旁骛地“驾驶”他的情感战车，错错落落地、轻重缓急地、似是而非地、大张旗鼓地表达一

己的书法识见。炽热的情感，个性的表达，让我们看到了迥异于其它、并有着独有感悟和语言的书法艺术作品。因此，在横向取法泛滥日久的当代书坛，在书法风格日趋同质化的今天，刘灿铭依然是独特的存在。

情真意长，这是文学评论的重要修辞。我们的传统书论，与传统文论息息相关，因此，以此观照书法当然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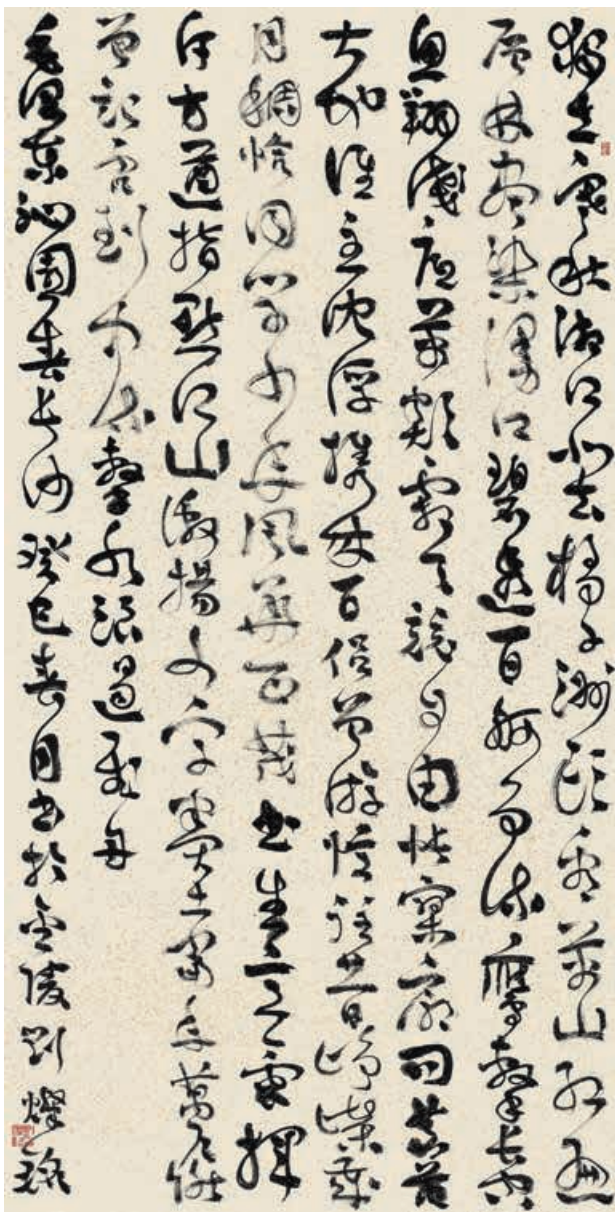
情真，自然意长。但，这需要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书法家首先确立符合艺术规律的审美观。近几年，浙江、辽宁、江苏等地的几位颇自信的书法家，为了寻求变化和突破，肆意改变书体结构，又以粗细不均的线条，放大书法的视觉效果。致使作品粗俗不堪，让人无言以对。我认为这是缺乏符合艺术规律审美观的表现。

刘灿铭是六零后书法家。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共处的启蒙年代。这个年代培养了我们的理性思维，反思自身，关心现实，追求卓越，憧憬未来，庶几是我们的共识。之于书法，刘灿铭的确表现出追求卓越的精神。对传统的分析，对当代书法的认识，对自己艺术形态的把握，均表现出一位现代人的风度和气质。

如果说《草书千字文》是我了解和认识刘灿铭的窗口，那么，最近所看到的楷书、隶书新作，则是对刘灿铭的进一步了解。显然，作为学院派书法家，刘灿铭的积淀够厚，用功够勤，眼光够远。我的兴趣不在于刘灿铭临过多少帖，写过几年字，而在于刘灿铭的字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刘灿铭的楷书，吸收写经体的几多养分，而字法的简约、含蓄、宽博，依然落在传统美学的语言系统中。刘灿铭的隶书也是循情而来，不求整饬，惟扬散淡，不求沉稳，惟尚开张。用笔的精到，起承的清晰，情感的抒发，可触可感中和的气息。

中和的气息缘于刘灿铭对世界和自己的理解。刘灿铭意识到了世界的局限，也意识到了书法的局限，当然，更意识到生命的局限，因此，他依凭自己的情感导向，节奏分明地向读者传达笔墨间的意蕴——豁达、率真，问道、思虑，宁静、致远。



刘灿铭作品

张瑞田 男，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当代作家、艺术批评家，先后出版文学、书法著作五种。



张元济 (1867 - 1959)

民国出版二杰

三
叶兆言



陆费逵 (1886 - 1941)

张元济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大老板，与蔡元培同学，都是浙江老乡。张大一岁，同一年考中进士，殿试时，蔡谈论西藏问题，张凭什么被光绪看中，我弄不明白，只知道皇上还算喜欢。让他找过想自己读的书，并且亲自接见，询问对维新的看法和建议。据说接见那天，紧接在正得宠的康有为后面，因为都属于改革派，最后没为了戊戌变法掉脑袋，也算万幸。

张元济可以吹牛的资本很多，见过大清皇帝，见过孙大总统，见过袁大总统，见过蒋委员长，又见过毛泽东，都不是简单的说话聊天。光绪诏见，年轻气盛的张全心全意想为国效力，当时天下还在慈禧老太后手上，他总算有心计，说了一会，见皇上身后似有人影晃动，便不敢再往下讲。

政治立场上，张元济属于立宪派。立宪派的想法就是，英国比法国好，日本比俄国强。这当然与所处的时代有关。那时候，大英帝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小日本后来居上。像法国那样，动不动就暴力革命，这不好。像俄国那样，完全是封建帝王专制，也不好，它在日俄战争中，竟然不是日本的手。

有了这样的立场，张元济显然不太乐意与孙中山走得很近。他心目中的中国，是国家强大，对内没有战争，对外反抗列强。谁来当老大并不重要，有皇帝也行，没皇帝也行，立宪或共和都无所谓。进入民国后，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大佬，扮演的是传媒大亨角色。手上有点钱，给点赞助不是问题，他曾捐款支持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还请孙中山吃过饭，却有一件事弄得国父很不开心，这就是张拒绝出版他的代表作《孙文学说》。



商务印书馆旧影

张元济的解释是言论出版不自由，“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考察民国时期的出版，尤其民国初年，不说绝对自由，也可以说相对自由。时间已是1920年，离共产党诞生还有一年，话这么说，多少有些推诿。孙中山是有名的大炮，哪能受得了这委屈，愤怒地指责创业二十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已被封建余孽所把持。

说张元济与后来的民国政府结梁子有些过分，不过真算不上太热络。他后来显然后悔没出版孙中山的书，毕竟这么做，得罪了后来得到天下的国民党。图书出版是桩大买卖，不与当权者很好合作，便赚不到白花花的银子。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越来越大，在文化界地位也越来越稳定，在商言商，虽然社会大名流，也不免要考虑经济利益。

辛亥革命后，张元济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顺应大局，不当保皇党，不为满清殉葬。就像张謇力行实业救国一样，张元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出版事业上，他的帝国就是商务印书馆。称民国时期的商务为出版帝国并不夸

张，在开启民智和昌明教育方面，它起的作用绝对不同凡响。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成为打击目标，遭遇了毁灭性的轰炸。侵沪日军司令曾公开表示，轰炸几条街区没什么意义，消灭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文化重镇，以及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大火造成商务印书馆1630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

张元济以旧学翰林的身份，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考虑到整个人文组只有二十八位，他老人家能够取得一席，与学贯中西的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硬生生地挤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平心而论，他的学问也就那么回事，算不上名副其实，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完全因为文化地位。

张元济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微妙，仗着虚长二十岁，是前辈是老乡，忍不住就会倚老卖老唠叨几句。他似乎并不太赞赏这个后生，很有些鄙视蒋的出身。1930年，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称蒋等新兴权贵是想“当孔子诛少正卯”，是“一班屠狗卖缢的和乡下老太婆”，打着革命旗号，借统一玩专制的把戏。

不过他并不属于那种喜欢与当权者作对的人物。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前朝遗老，“戊戌党锢子遗”，他始终反对内战，反对专制，反对暴力。蒋虽然不赞成这观点，也不能不给面子，毕竟他在文化界很有影响。1956年，张元济给躲在台湾的蒋写信，回忆过去，期望未来，恳劝蒋“默察时局”，效仿浙江先贤吴越国王钱缪，放弃独立，归顺中央，与共产党再次合作。

这样的信写了也是白写，蒋介石看了，一定會在内心深处骂“娘希匹”。当然，信最终有

没有到蒋的手上，也可以存疑，据说是以广播的形式对台湾喊过话。信的文采很好，八股文的底子，起承转合有板有眼，听众却未必能懂，完全是古文，用典也太多。

1949年9月，开国大典举行前夕，张元济曾与毛泽东一起游天坛，并且摄影留念。毛知道张年轻时做过京官，便问是否来过这里，张回答说此处乃天子敬天的地方，自己不过是个小官，怎么能有资格来，毛听了哈哈大笑。

陆费逵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不姓陆，和常见的诸葛和欧阳一样，是复姓，应该叫“陆费”逵。大家都知道，《百家姓》远不止姓氏一百，光复姓就有八十一个，“陆费”还不其中。我堂嫂的一位姐夫就姓陆费，复姓的人一般只喊姓，小时候听岔了，一直觉得这人名字很怪，叫“路费”。

这位远亲与陆费逵是本家，很近，究竟近到什么程度，我一直也没弄明白，只知道确实是有关系。陆费逵祖籍浙江桐乡，与茅盾和丰子恺是同乡。不过他出生在陕西，十二岁去江西南昌，在那一直到成年，参照新旧习惯，既可以浙江人，也可以陇西人，更可以南昌人。他的远祖在明朝时还姓费，后来出嗣舅家姓陆，再后来，费氏本支无人，又兼祧陆费两家，从此复姓。

记不清是哪位长辈说过这故事，反正我早就听说过，知道陆费逵精明强干。辛亥革命前夕，他正在商务印书馆就职，收入相当丰厚，已经几百大洋。那时候的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国内出版界无人敢跟它叫板。陆费逵独具慧眼，预感到帝制即将结束，悄悄招集了几个人编写

新课本。据说商务的老板曾私下问过他，时局不稳，要不要准备一套新的教材，他虚与委蛇，说暂时还没那个必要。

辛亥革命爆发，旧封建教材不能用了，陆费逵来了个窝里反，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成立中华书局。他及时推出了自己编的适合共和政体的新课本，打了老东家一个措手不及，一下子便站稳了脚跟，迅速成为出版界老二。这套教材不仅满足当时教学需要，而且赚足了第一桶金，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的经济基础。

陆费逵的故事说明出版业两个简单真理。首先要抓住机遇，把握好时代主旋律，商场如战场，不仅要准，还要够狠。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新教材，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押的是共和胜利，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牵一发动全身，错一招输全局。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出版界航母，实力虽然雄厚，却转身困难，毕竟旧教材是其看家之本，不像中华书局那样灵活，船小好掉头，没有任何负担。

其次，教材永远香饽饽，谁捏在手里都赚大钱，谁能垄断谁就是大腕。今天的各家教育出版社，所以财大气粗，靠的就是教材，甚至只是很一般的教辅。要知道，因为科举制度，我们向来是个崇尚教育的国度，老百姓心目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商人重利本是无可厚非，打着教育旗号做买卖，名利双收轻而易举。

陆费逵的母亲是李鸿章侄女儿。时至今日，你可能不知道陆费逵是谁，但一定会听说过中兴名臣李鸿章。出自名门常为大家津津乐道，按辈份，应该是张爱玲奶奶的堂姐妹，张爱玲得喊陆费逵一声表舅。

熟悉张爱玲文字的人都知道，在她小说中，富二代、官二代皆不是什么好东西，基本上败家子，大多数没出息。谁要是以为在那个时代，



中华书局旧影

大户人家的孩子就有前途，一定大错特错。富不过三代，那是太平年代，到了乱世，一代都熬不过去。往好里说，陆费逵是书香门弟，其实早家道中落。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煮酒论英雄，将陆费逵与外国的爱迪生和高尔基并列，评为自学成才典型。入选的还有叶澄衷和杨斯盛，叶是家产万贯的五金大王，杨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大王。与同样是出版大亨的张元济不同，陆费逵成为别人羡慕的成功人士，首先得力于母亲教育。

张元济科举出身，戊戌变法失败，维新人士遭到镇压，砍头掉脑袋，政治上的无出路让他义无反顾投身出版。那时候，陆费逵刚十三岁，已能够识字读报，受新思想影响，与保守的父亲难免冲突。好在开明的母亲支持，不赞成儿子走科举俗路，不强迫读八股文。当时的科举形同高考，敢不理睬这根指挥棒，真不容易。

陆费逵十分自豪，他一生中只付过十二元钱学费，母亲教了五年，父亲又教了一年，入南昌英语学塾附设日本专修科一年半。究竟学会了哪一门外语，我也弄不明白。他的成就不是在学问上，一个搞出版的天才，不在乎有多

少学问，而是要知道什么才是学问。陆费逵的强项是知道该出什么书，什么书对世道有用，什么书对国家有好处，什么书能够赚钱，能够名利双收。

除了独步天下的教科书，陆费逵手下的中华书局还有两个绝活。一是印钞票，今天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近乎滑稽，事实就这样。我见过这种印有孙中山头像的纸币，国民政府货币改革，统一的法币都是由中华书局承印。承印不代表可以随便印钞票，这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只能说明你有这设备，有这能力和实力，在此之前，中国纸币都由外国公司承印。

还有是印大型工具书，中华书局的《仿宋版二十四史》、《辞海》、《古今图书集成》，都赫赫有名，一般出版社玩不起，也不想玩。陆费逵要玩就是要大，而且出手阔绰，譬如字数达2亿的《四部备要》，他竟然敢许诺，谁发现一个错字，奖赏十块大洋。

叶兆言 男，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南京人》、《旧影秦淮》、《陈旧人物》、《江苏读本》等。

庆有学说播宇内 笙无一管为身谋

——记我国农业微生物学奠基人樊庆笙先生

III 方式 编写



1989年10月，出席第六届全国土壤微生物学术研讨会时的樊庆笙先生。

相对于人文学者而言，科学家离开了他所从事的那一学科领域，很难为普通大众所熟识；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衣食住行，点点滴滴，质量之提高改善离不开科学家们的智慧和耕耘。已故的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樊庆笙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

樊庆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农业微生物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1944年，他研制了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的青霉素，是我国研究青霉素的先驱者。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他的“紫云英北移成功”的科研成果，是我国绿肥生产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获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奖，并在国际农业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抱病筹建金陵研究院，培养农业高级人才，实践了他一生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远大抱负，更显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风骨。

樊先生于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5至1990年间，先后担任民盟江苏省委五届、六届副主委，七届、八届顾问，省政协七届、八届常委，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十分关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认真履行职责，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孜孜于学 首研“青霉”

樊庆笙先生于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野卯口，他的中学时代，正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的影响下，他下决心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1929年，



1935年，樊庆笙先生（中）和同事们湖南常宁县采标本。

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州萃英中学，同年保送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193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获该校最高奖“金钥匙”奖，并留校任教，担任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教学工作。1940年，金陵大学选送三名老师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修一年，樊庆笙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细菌系攻读微生物学。一年之后，导师看中他的才华和勤奋，愿意资助他读博士，问他每月要多少生活费，他说了一个最低的数字，50美元。靠着微薄的资助，度过了三年。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资料，使他积累了广博的学识，练就了精湛的实验技术。

1943年5月，樊庆笙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细菌学博士学位。但因珍珠港事件，太平洋航线全被日军封锁，回国无望，暂就业于美国西格兰姆发酵工厂。1943年秋，美国组建了一个“美国医药助华会”并决定在中国援建一个血库，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应聘的都是血科

专业的医生、护士，共六人，林语堂先生的女儿也在内，樊庆笙以细菌检验专家的身份报名参加这个援华小组。

1929年，英国微生物学家发现了盘尼西林代谢物有噬菌现象，是当时微生物界最辉煌的成就。这一发现影响了美国科技界。要回国了，樊庆笙首先想到要带一些盘尼西林的菌种回国研究，一旦研究成功将可救治很多抗战伤病员。他的想法得到了助华会的支持，他们备齐了有关研制盘尼西林所需的仪器、设备和试剂溶剂，还有两支宝贵的菌种。加上威斯康星大学赠送的一支，他一共拿到了三支宝贵的沙土管菌种。

1944年1月20日，樊庆笙和医药助华会的同事们一起登上美军运输船，踏上了回家的路。闯过无数艰难险阻，辗转半年回到了祖国，樊庆笙最牵挂的就是尽快进行盘尼西林的研究。当血库在昆华医院尚未运转的一个月里，樊庆笙找到当时卫生署中央防疫处处长、我国著名的细菌病毒专家汤飞凡先生，并得到了汤飞凡先生的支持。在防疫处内，用随身带来的设备、菌种，与汤飞凡、朱既明等先生一道，开始了

盘尼西林的研制工作。就在1944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面世了。战乱中的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制造出盘尼西林的第七个国家（依次是英、美、法、荷兰、丹麦、瑞典和中国），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此时，樊庆笙考虑应该给产自中国的盘尼西林定个中文名字。一是形态上，这种霉株泛青绿色，所以取其“青”；二是意义上，英文中的词尾“-in”在生物学上常翻译为“素”，如维生素（Vitamin）。两者合一，终命名为“青霉素”，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946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樊庆笙即向血库申请离任，重返成都金陵大学讲台。1946年8月，樊庆笙随金陵大学返回南京，并同时受聘为卫生署上海生化实验处技正，负责青霉素菌种选育及发酵条件的研究。为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他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完金大的教学，即赶到上海抓青霉素生产的关键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为青霉素

的批量生产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青霉素在上海虽已进入批量生产，但产量不多，这种救命药有“一两黄金一支青霉素”的说法。时至今日，随着医药科学的发展，青霉素日益成为常见而有效的药品，几十年来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樊庆笙冒着生命危险带回的三支沙土管，如今静静地躺在南京农业大学校园内的农业博物馆里，鲜为人知。

固氮兴农 微生物报国

樊庆笙先生自幼生长在旧中国的江南农村，深知农家生活之艰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必要，从少年时代就萌发了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振兴中国农业的愿望。他搞了一辈子微生物，从青霉素到固氮，从紫云英到食用菌，从发酵到菌根，他毕生致力于我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创建、发展与壮大。



1944年，旅美华人参加美国医药助华会回国抗战，图为该会在昆明援建的血库成员合影，后排左一为樊庆笙先生，左二为林语堂先生之女Adet林。

固氮作用和光合作用是生物和农业科学的两个重大课题，通俗地说，固氮菌通过固氮作用将空气中游离的氮固定下来，改良土壤，使植物和农作物吸收和生长，土壤微生物对农业生态、作物生长、提高农业生产有重要作用。樊庆笙的科学研究成果从来就不仅仅是无菌室里的试验和报告，而是广袤田间蓬勃的生长和喜悦的收获。其中，“紫云英北移成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成果。

紫云英（俗称红花草）是长江以南稻作区的冬季主要绿肥之一，种植历史悠久。为了确保稻米的持续优质高产，农民会采用粮肥轮作制：即晚稻收割后种一季冬绿肥紫云英，作为第二年水稻生产的底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北地区开始扩种水稻，效仿苏南粮肥轮种的办法，但“桔生淮南，逾淮成枳”，人们多次试种均宣告失败。

1963年秋，南京农学院土化系师生在苏北兴化县蹲点，又提出了试种紫云英的问题。有人说紫云英适宜暖性气候，到了苏北要冻死的。可是，樊庆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紫云英根瘤菌具有专一性，它只能与紫云英共生而发挥其固氮作用。苏北地区历来不种紫云英，土壤中缺少紫云英根瘤菌。在樊庆笙的指导和倡议下，紫云英接种根瘤菌多点试验于1964年在高邮、宝应、兴化等进行沅改旱的稻麦两熟田上展开。几个月后，第一次试验获得了可喜的结果，紫云英接种根瘤菌后生长正常，安全越冬，绿肥亩产成倍增长。再次扩大试验又告成功。从此，紫云英北移揭开了序幕。

为了能把实验成果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解决当时紧迫的粮食问题，樊庆笙又马不停蹄地构思着建根瘤菌厂之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本着“因陋就简、土洋结合、讲究实效”的原则，



走遍大江南北，为农业生产服务。

在兴化县组建了300平方米的菌肥工厂，生产出的根瘤菌除了满足本省新稻区的需要，还支援了安徽等省。在国内化肥生产量低，大部分依赖进口的情况下，江苏苏南苏北大力发展紫云英等有机田，使土壤地力提高，有机用肥增加，稻麦连年丰收，对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有很大的贡献。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菌肥生产已进入到现代机械生产模式，有了把紫云英种植向北推进的物质基础，使紫云英越过长江、淮河，北移成功，并沿陇海铁路西进关中，在渭河稻区引种了江南的优质绿肥，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业增产措施。1978年，“紫云英北移成功”获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奖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紫云英北移成功，是根瘤菌共生固氮的一项突破性成果，引起国内外农业界的重视。1986年，樊庆笙在南京主持召开了中、日、美紫云英学术讨论会，发起成立了“国际紫云英学会”，被选为会长。生物固氮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符合生产“安全农产品”以及“低碳农业”的发展趋势。

樊庆笙教授多次在业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中

提到：土壤微生物研究工作者，要从土壤中走出来，既地下，也地上，地球上丰富的土壤微生物资源应该更多更好地为我国国民经济服务，为人类服务。这是他学术思想的“根”。

教书育人 桃李芬芳

樊庆笙教授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农业微生物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农业教育家，他的一生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自1933年毕业于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并留校任教，至1951年被任命为公立金陵大学第一任教务长；自1952年出任南京农学院副教务长并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业微生物教研组，至“文革”期间南农并入江苏农学院在扬州工作八年；自1981年任南京农学院院长，古稀之年扛起了复建南农的重任，至1984年辞去院长之职专事教学科研，直至晚年抱病筹建南京农业大学金陵研究院，终在病榻上永别最后一届博士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世人赞颂老师的滥觞笔墨，但用在樊老师身上却是极为贴切和毫不夸张的。^①

樊庆笙的教育方法，可从学生的回忆中一窥堂奥。1938年，在战区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齐鲁大学等校都西迁到华西坝，与东道主华西大学合称华西坝区大学。樊庆笙偕裘维藩、齐兆生和汪菊渊先生共居华西坝附近金陵大学教工宿舍内一室，人称“四知斋”，四位都是勤于科教的学者，后来都成为全国有名的专家。各校学生可以互选他校开设的课程，就在这一年，东吴大学生物系的学生殷恭毅选修了金陵大学樊庆笙老师的《植物分类学》，并给他一生的学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门课有诸多名词要死记硬背，内容繁琐。而樊师采取田野教学为主，实验室鉴定标本为辅的教学方法，使这门比较枯燥的课程变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了。每当我们随樊师在校园和田野，边走边赏识名花芳草和自然野景，边观察识别各种草本藤本植物时，心情舒畅自然，激发的记忆功能，远胜在课堂听课。樊师先不按分类系统，而将当令开花的植物先讲，讲述植物的名称、俗名，拉丁文学名，各部形态，结构，生境，生态和用途等，樊师缓缓道来，我们边看边记笔记，印象非常深刻。在实验室上课，樊师引导我们观察蜡叶标本时，再讲分类系统，要求我们按目、科、属、种、形态特征等填表写报告。由此受益较深。

在外敌入侵之际，中国的教育家们还在恪尽职守，全身心地教书育人。这生动的“牧野教学图”，也是一个民族在多灾多难中的自救和自立吧。多年后的我们看到这段文字，也不由心生向往和敬意。

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樊老师对学生首先是以要求严格著称的。他培养的博士生，要进行中期考核，不合格就予淘汰，不讲情面。因此，他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很高，研究生们也以是他的亲传弟子而自豪。1952年，樊老师在南京农学院率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土壤微生物教研组，招收研究生及接受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进修教师和委托培训人员，为新中国的高校和农业科研单位培养了一大批早期微生物教学和从事生物固氮研究人才。多年之后，当年的学生盛承师在湖南农业大学任教，仍一直



恢复高考后，樊庆笙先生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

珍藏着早年樊老师修改批阅过的实验报告，并经常拿出来给新任校长们看，希望学校像樊老师一样严格要求学生。

樊庆笙还十分重视对学生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总是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创造学习和实验的条件。五六十年代，试验田由学生自己开垦，实验室的仪器都是学生自己安装。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搞农业研究的人，所有的实验结果都要落实到田间才能算数。我们要的不是死读书的学生，而是能动脑、能动手、又有创造性见解的学生。

早年出国留学的经历，给了樊庆笙开阔的科研视野和开放的科研态度。“文革”后南农复校，他针对当时科学研究落后、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带头呼吁，亲自组织，聘请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在南京农学院举办了几次全国性的研究班、培训班，把微生物学的研究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他邀请了美国细菌学会会长、加州大学 R.H.Hungate 教授来华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厌氧微生物培训班，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厌氧微生物实验室。在他组织的历次培训、研修班中，先后邀请国外同行中的佼佼者前来授课，从而了解国外的学科发展、学术新概念和新技术的

应用。

他还积极倡导老师、学生学习外语，能够自己阅读外文资料，以开放的胸怀博国际农业科技之长。凡有条件出国的，他千方百计为他们联系，送出去深造。了解和掌握国外同类学科发展的先进水平与学术前沿，以扩大视野，认清本学科的发展思路，并力求获取境外合作渠道，缩短与国外的差距。

在樊老师的最后 20 年，他的学生们写出了近百篇科学论文，大到拟定课题、提出方案、具体措施，外文资料的翻译，小到外文摘要语法上的修正，为自己学生，他都事必躬亲，具体指导。1993 年，年逾八旬，结肠癌手术后，他还在病榻上审阅了学生《土壤微生物学》全部四篇十四章 35 万字及 126 幅插图的书稿，并撰写了对后来者寄予殷切期望的序言。

樊庆笙在农业教育园地辛勤耕耘的 60 个寒暑中，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活跃在我国农业科技的各个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农业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多年前，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看望季羨林先生时曾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温总理的话语说出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樊庆笙教授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1957 年，樊庆笙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全

家都受到株连。在艰难的环境中，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当时允许他做的一切有利于教学科研、农业生产的事。20世纪六十年代，还在“半靠边”的樊教授头顶草帽，布衣旧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穷乡僻壤。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紫云英北移项目就是在这时期完成的。

1979年，樊庆笙的“右派”彻底改正，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在批准他入党的大会上，这位诚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激动地表示，“要将自己后半生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他不虚此言，无愧此言，此后的二十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

1979年1月，南京农学院复校从扬州迁回南京。1981年，樊庆笙以古稀之躯挑起了重建南农的重担，出任南农复校后第一任院长。为此，他殚精竭虑为学校基建、整顿教学、培训师资、学科建设、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而日夜操劳。

樊庆笙一生坦荡，淡泊名利。他任南京农学院院长期间，为了加强学科建设，为著名教授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他多方争取经费，为他们建立国家级研究室，而他自己的研究室直到他退居二线后才建立。

樊先生一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对青年教师编写的教材讲义和翻译的文献资料，他都认真修改，润饰文字，自己从不署名。撰写论文及科研成果名次，总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

樊庆笙与陈华癸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前林士所张宪武教授是我国农业微生物学的三位创始人，除了他们的学识业绩，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在著书立说、学术研究上的亲密合作、坦诚相待。他们一起切磋学问，交流



樊庆笙先生晚年仍工作不辍

南京农学院微生物小组访问英国购回的书籍及仪器清单

书籍清单	—— 交总图书馆编目	
Introduction to Fungi 2nd Ed		£ 10.95
Soil Conditions & Plant Growth 11th Ed		£ 16.95
Plant Virology		£ 10.50
Genetics		£ 7.95
Cell Biology & Biochemistry		£ 4.50
自动定氮仪 一套		£ 150.00
DEAE-Cellulose 500g		£ 27.00
手提式幻灯片机 一台	交给微生物教研室使用	£ 6.99
机械绘图用品 一套		£ 3.50
磁板色笔 2枝		£ 1.06
共计		
樊庆笙 1982.4.15		

樊庆笙先生参加农业微生物小组访问英国购回的书籍及仪器清单

治学和教书育人的经验，成为土壤学界的佳话。陈华癸院士在樊先生八秩大寿时寄上祝辞，由衷叹道：同利为朋则利乖而积怨恨，同道为朋乃相得以益彰。

当年，在整理樊庆笙办公室遗物时，有一张他亲笔写的1982年出访英国时购买仪器和书籍的清单，总价239.4英镑，全部移交给图书馆和教研组使用。事实上，樊庆笙克己奉公，一生清廉，受到普遍的赞誉和尊敬。

70高龄出任院长的樊庆笙已有专车待遇，但他上下班都和普通教职工一样，总是站在候车地点等校车，从来不要小车接送。有时因工

作不能及时赶上班车，他就步行至卫岗坐公交车回家。中午吃饭，自带饭盒，热一下吃完了，喝口茶，靠在藤椅上打个瞌睡，睁开眼又办事。每天，教职工们自发地把校车司机后的座位留给了白发而勤勉的老校长，这是他唯一的“特殊待遇”。

为纪念母校金陵大学，海内外校友提议在南京农业大学成立金陵研究院。1995年，为了筹建金陵研究院，对母校金陵大学怀有深厚情感的樊庆笙不顾80高龄和重病在身，担任筹委会主任，联络海内外校友，筹集资金，制订研究院发展规划等。整个金陵研究院的筹备过程，也是他和病魔奋力赛跑的艰难路程。

1998年是樊庆笙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当他得知每天要花费上千元、已经花了学校两万元时，一生清廉勤俭的樊庆笙拒绝用药，要求出院，回家用中草药治疗。主治医生只好在病历上写道：患者拒绝治疗，要求出院。1998年7月5日，樊庆笙与世长辞，享年87岁。病重期间，他曾口述由其女记录对金陵研究院筹备工作结束后组成人员名单的考虑，提供大家讨论之用，因觉考虑不够成熟，暂搁置一边。这竟是他最后的遗言。

樊庆笙后半生四十多年，一直是在五十年代分配的青石村123号内度过的。因拆迁而不复存在的青石村123号，也成了学子后人记忆中的温馨家园，精神与力量的不竭源泉。在孙辈的眼中，老外公唯一的“休息”，就是摆弄青石村家门口的小院子——

在小院里，外公种过土豆、花生、蚕豆；也养过牡丹、茼蒿、美人蕉。门旁一株芭蕉，郁郁葱葱；院里一棵枇杷，高大挺拔。篱笆上爬的是喇叭花，墙角栽的是金银花，一串红。窗门前

一棵老桂树；阳台上则是文竹、茉莉、仙人掌。每年盛夏乘凉，小凳子旁一丛“晚饭花”；金秋季节，桂花飘香，满院芳香扑鼻，沁人肺腑；外公真不愧是个农学家，始终让那小小的院落绽放着生命的多彩……每年大年初一，外公总是第一个起床，打扫庭院，然后把爱睡晚觉的我们一个个唤起床。这时桌上少不了一盆清水鹅卵石的水仙，茎上缠了红纸，喜气洋洋。

那棵枇杷树，也萦绕了很多人的思念。很多学生记住了果实的清香甘甜，也留下了师生共摘枇杷的似父子如孙祖般的欢乐……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希望能籍此文，感知和学习我们前辈知识分子的学识和人品，传承他们为实现强国梦付出毕生心血的奉献精神，和历经磨难终不悔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许，在樊先生逝世之际，南农大一位老师的挽联可以作为他一生的写照：

固氮兴农，庆有学说播宇内；

微生报国，笙无一管为身谋。

注释：

① 1914年，私立金陵大学首设4年制农科，开中国四年制大学高等农业教育之先河，1930年，农科扩展成为金陵大学农学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原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改名为公立金陵大学农学院；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农学院从母体迁出，与国立南京大学农学院合并，并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成立南京农学院，六十年代初，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两所重点农业高校之一；1972年1月，学校迁址扬州，与当时的苏北农学院合并成立江苏农学院；197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南京农学院在原址南京卫岗恢复办学，并列入农业部所属全国重点大学；1984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农学院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樊庆笙教授纪念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2]《樊庆笙：中国青霉素研制先驱》，《姑苏晚报》2009年10月3日第二版。

方式 女，《雅集》编辑。

（感谢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林敏端女士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协助）

跋涉“儒林”四十载

III 陈美林



陈美林先生评注《儒林外史》书影（2002年版）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我所在的学校撰写《儒林外史》前言。学校决定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小组承当，我被指定为四名成员之一，并被推为执笔人。完稿后，经系领导审核后寄出版社；出版社则排印若干份广为征求意见，被认可后，通知我们稍作润色即可定稿。此际由于形势变化，我被调出“前言”小组，从此乃由职务行为改为个人研究，迄今已逾四十载。漫长的跋涉，可忆可叙之事颇多，非一篇文字所可尽述，乃略说大概，以供有兴趣的读考参考。

一

笔者的研究从作家起步，进而探讨其作品，再进而评述前人的研究，作家吴敬梓和作品《儒林外史》是不因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的客观存在，可谓是第一性的存在；而不同研究者对它的研究成果则因人而异，可谓第二性的存在。

二者都纳入我的研究领域，或有先有后、或同步进行。一般说来先行研究作家，举凡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学养等等，均有所考察、评述。为了尽多地掌握作家的情况，除了查阅公私藏书中有关文献资料外，还去他的故乡全椒及滁州、合肥等地访人寻书。

当年去外省办事，须持本省革委会介绍信方可。我们乃向江苏省革委会申请，开具去安徽省革委会的介绍信，由他们转滁州地区再转全椒县二级革委会。手续虽烦，但接待认真。由全椒县委副书记王郁昭、县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韦邦杰两同志接谈，又找来文化馆武漪波等同志介绍情况。我们先问吴敬梓是否有后人，他们说有吴炽荣，还有旁支吴坪，但二人不和；他们又说程十发画吴敬梓像，曾索去吴炽荣照片一张。后来见到吴炽荣，据其自称为吴敬梓十二世孙；问其是否有家谱一类文献，他说以前有过一本草谱，是根据胡适、张慧剑等人著作编制的，“文革”中毁去；问及吴敬梓的子

女，他或说二人或说三人，前后不一；除此以外，也谈不出什么有用的情况来。1981年在滁州召开“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有报道其为“第八代孙吴炽荣”（《滁州报》1981.10.13），也有报道为“第九世孙”（《文学报》1981.10.29）；1984年在南京召开“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则称其为“吴敬梓后裔吴炽荣”（《新华日报》1984.11.3）。其人于1989年病逝。

至于吴坪，吴炽荣一直不予承认。在南京纪念会召开期间，有关媒体多有报道，我收到一位住在南京秣陵路20号的吴增佩来信，自称是吴敬梓后人。我十分重视，因为吴敬梓死在扬州却葬于南京，其子吴烺已入《金陵通传》，此人或真为吴氏后裔也未可知。乃前往寻访，交谈之后知其在公交公司工作，对吴氏先人情况一无所知。因为吴坪曾任小学教师，有一定文化素养，笔者乃写信向其询问，收到他于1986年7月10日的复信，说此人乃其继母唐氏抱养之子，与之并“无血缘关系，但相处甚好，常来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等等。吴坪在此信中还说“我对远祖吴敬梓及其著作学习甚少，知者甚微，因而颇感愧甚，很多地方，敬祈指教，对您在这方面所付辛劳，深表感谢和敬意”。吴炽荣病逝后，在2001年12月滁州召开“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坪则以吴敬梓后裔身份出席会议，并散发其于2000年8月编纂的《全椒西墅草堂吴氏家世概述》，除《全椒志》外，并未提供其它文献资料。数年后，《南京晨报》（2005.6.9）报道《吴敬梓后人欲来宁寻祖坟》，说全椒退休教师吴其华来宁，对记者说：“吴敬梓生有四个儿子，他是长子吴烺的后人”，“吴敬梓生父名雯延，吴敬梓是他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自幼便被过继给

长房吴霖起为嗣”。吴其华自述与笔者的考证吻合，但笔者与其从无联系。吴其华还对记者说，“原来家族曾经有族谱的，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红卫兵抄家，因此族谱被大火焚毁，遗憾的是并没有留下抄本及记录”。其所言与吴炽荣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所说倒是一致的。笔者是以吴敬梓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不是研究吴氏后裔的传承，那是谱牒学者的任务。无论后裔如何，并不影响对吴敬梓本人及其作品的评价，所以其后裔问题不在笔者所探讨的范围，只不过将笔者几十年来所接触到的人和事于此约略一说，以供有意于此者参考。

安徽之行，“访人”之结果大体如此，于笔者的研究并无助益。倒是“寻书”却大有收获。当年胡适做《吴敬梓年谱》时，根据的是民国九年张其浚修纂的《全椒志》，而张其浚在修志时遍求康熙年间蓝学鉴、吴国对主纂的《全椒志》而未能得见。笔者安徽之行居然得见此志。虽然蓝学鉴修志时，吴敬梓尚未出生，但吴国对为其亲曾祖，编辑、校阅人员中颇多国对子、侄即吴敬梓祖辈，所记吴氏族人事迹甚多甚详，还录有吴氏族人文，对于了解吴敬梓前数代先人事迹颇为有用。可以说是笔者首先将此志引入对吴敬梓的研究领域中来的。此后我写有专文《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发表。

之后，更用力于公私藏书中发掘吴敬梓有关资料，颇有所得，也在撰写论文时有所称引，从而渐为外界所知。拙作《吴敬梓身世三考》等文章发表后，其中引用的一些材料引起一些同道的兴趣，如陈汝衡先生来信说“大作《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繁征博引，足令读者心悦诚服，功在艺林。不佞近正边抄边校拙作《吴转》，获此殊觉喜出望外”（1977.8.4）。此后不

断来信，希望与我交流资料，如1978年1月17日来信说“听魏绍昌兄谈，南师有三篇敬梓史料：一为‘年谱’，二为‘移家赋注’，三是大作‘生父嗣文’考”，希望我能提供。原先是准备做“年谱”的，但当时搜集的资料尚不足以谱写，如以大量的他人资料架起谱主吴敬梓，则并无意义，乃改作吴敬梓年表，至八十年代后期乃完成《吴敬梓评传》。至于《移家赋注》，的确也在进行，不仅此赋，对其余的诗、词也有选择地进行注释，因常向唐圭璋、段熙仲、徐复等老先生请教，因而为人所知。但彼时注释词赋的目的在于考察吴敬梓的家世、生平、思想、交游以为做评传之用，至于将其汇编为诗词笺注的专书一时尚不及去做，计划在研究性著作完成后再为之。这些词赋的诠释，不但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不时称引，也供有关同志参考，如在我所主编的110万字的《儒林外史辞典》中第二编“诗词赋”，邀请王步高教授撰稿，他也说明曾参考拙作《吴敬梓评传》等著作。当年一位审读《吴敬梓评传》的同道对我言及，“书中颇多新资料，也有大量注释，此前未见他人为之，可说明一下”。此言极是，但因拙作已经付印；同时在一篇短短的“后记”中也不能尽言。进入新世纪后，乃先后发表《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及其续篇《再论》二文，稍稍做些追述。

二

在我们于七十年代初去安徽访人寻书以后，安徽也跟进对吴敬梓的研究，七十年代中期，安徽大学、滁州地区、全椒县成立三结合研究小组，曾来我校“取经”学习。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李汉秋同志很想与笔者晤面交流，便请我系顾复生同志陪同来舍间，应他之请，乃将

第一稿撰写经过及主要内容讲述一遍，并应他所问及的问题诸如有关资料以及自己的设想、见解等作了回答。此次相见，乃成为与李汉秋同志结交之始。他们返回安徽后不久，便寄来了一份“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根据安徽省委批转的关于《注释法家著作、评法批儒编写出版规则》”拟出的《反儒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写作提纲，征求意见。他们按照这份提纲写出《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小册子先于1976年6月由安徽大学印成学报增刊，1977年1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约七万字，李汉秋同志都曾先后寄给我。

我所执笔的“前言”第一稿由工农兵学员接手后写成第二稿，再转入新的“前言”小组成员手中写成第三稿，在1977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卷首刊出。这篇“前言”与安徽的小册子一样，都将《儒林外史》说成是“反儒”的作品，而且在“前言”中断言吴敬梓是“用经学新解等曲折、隐蔽的方式进行反理学斗争”的。这一论断其实是毫无学术根据的，为了廓清此说，我在撰写一些考证吴敬梓身世的文章之外，还对其思想渊源有所探索，并先后写成文章陆续发表，其中有一篇《略论吴敬梓“治经”问题》，就是为辨清“反儒说”的根据所谓“治经”的内涵。拙文于1977年刊出后，很快收到河南任访秋、上海陈汝衡等先生来信表示赞同。我校段熙仲、徐复两位老先生对经学研究有素，也表赞赏，特别是段老对我说建国后大学里已停开“经学”课程，问我从何处学来，是否任铭善先生所传授。我告知段老，笔者于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当时任先生只开语言课，并不讲授“经学”，我不过是为了写文章查找有关著作自学而已，其实并无研



范进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众人
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儒林外史》第三回）



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总不得断气，伸
着两个手指头。（《儒林外史》第五回）



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一手拿着金杯，
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儒林外史》第
三十三回）

究。此后，段老在 1979 年招收的汉魏六朝研究生的论文答辩，邀我参与；我告知素无研究，他便以此文为例，坚邀笔者审阅两位研究生的论文并参加答辩，后来他的一位硕士生还成为我的博士生。

当然，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撰写的这些论文，要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方能陆续发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李俊民先生读到过一些，特别是最早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后，便让古籍组（即后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沪版 77 古字 252 号”约稿信，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书稿，“读者对象为大学文科师生”。我复函同意后，便由责任编辑邓韶玉同志与我联系，编辑室主任陈邦炎先生过宁时还来舍间相访，交谈关于书稿的有关问题。1982 年交稿后，方知由何满子先生负责审稿，所以他对我

的研究状况十分了解，后来他在《中华读书报》（2002.3.27）发表的题为《伟大也要有人懂》的长篇书评，评论拙作《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时，还提及笔者的早期研究，文章说笔者是“从基础性研究着手，花力气探究吴敬梓的家世生平，考证出吴敬梓是生父吴雯延出嗣给长房吴霖起的，这一出嗣关系加上上代的嫡庶和功名显晦等复杂的原因所导致的遗产纠纷，严重地影响了吴敬梓的人生选择，使之由搢绅子弟变成宗法制度的叛徒。因此，他的考证与‘红学’界考证曹雪芹直追到将军魏武之子孙的繁琐考据有别，对研究作家有其必要性。这些研究收集在 1984 年出版的《吴敬梓研究》一书中”。何先生接着说，“此后他转入作品研究，主要作品有《新批儒林外史》和《儒林外史人物论》”。的确，笔者的研究是从作家起步，进而进入作



众人看那泰伯祠时，几十层高坡，上去一座大门。
虞博士到了。（《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

李士俊 绘

品研究，但在作家研究时，不忘其作品；在作品研究时，又处处联系其作者，只是不同阶段有所侧重而已。

在《吴敬梓研究》出版前后，已开始重点研究作品，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成果是《新批儒林外史》，而《儒林外史人物论》则是九十年代的著作；同时八十年代继《吴敬梓研究》之后，对作家的研究仍在继续，其成果则是《吴敬梓评传》。

八十年代初期，因研究作品《儒林外史》，从而对清代几家研究该书的评点本有所探索，除对评点这一形式本身进行考察外，又对卧闲草堂评本、齐省堂评本、张文虎评本以及黄小田评本都在深入研析的基础上撰写了评论文字。以此，便产生不妨操刀一试的念头。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得知笔者这一设想，便以此相约，

终于在1989年12月出书。因评点形式的作品不见于市场久矣，所以拙作一出，颇有新耳目之效，至1998年2月已印行七次，累计六万册。而且，据《儒林外史》法译本译者张馥蕊研究员在寄赠其所译时有信说，“大作《吴敬梓研究》及《新批儒林外史》均在法购到，并已拜读，深佩用力之勤，极富参考价值”云云，可见《新批》等书也传至海外。

《新批儒林外史》出版前夕，匡亚明同志邀请我参加他所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活动，由于他已读过笔者的《吴敬梓研究》，决定请我承担《吴敬梓评传》的写作任务，并决定此稿与他的《孔子评传》，还有其它两部共计四部评传，做为1991年举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赠书。如同《吴敬梓研究》作为1984年召开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赠书一样，受到与会者的认可。何泽翰先生在得到《吴敬梓研究》一书后，乃寄赠墨宝题诗一首：

阳狂玩世秦淮客，薄俗纷纷过眼新。
著述九流甘未等，风标百代慕高人。
徽音愧我才难企，遗躅欣君地与邻。
更有金陵图咏在，赓歌好作盛时民。

美林先生于吴文木外史最为专精，
特赋赠即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弟何泽翰

此诗又刊于岳麓书社出版之《湖湘诗萃》第二期。

《吴敬梓评传》出书前，匡亚明同志特书赠横幅：

美林先生雅正：

萋兮斐兮，成此贝锦

谨录诗经小雅巷伯篇句，预祝《吴敬梓评传》以传世之作早日面世。

一九九〇年二月

匡亚明时年八十四

《吴敬梓评传》于1990年12月出版。九十年代初，常有海外学者来访，他们提及在北京大学访问吴组缃先生时，吴先生告诉他们，要研究《儒林外史》可去南京访问笔者。感其盛情推介，乃托友人捎去《评传》一部，吴先生及时复信云：

美林先生：

承赐大著《吴敬梓评传》，目前已由友人带到。大作观点平正，取材翔实，诚为有分量的著作，读后得益不浅，不胜欣慰，尚此致谢。顺问：

撰安

吴组缃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

这几部书稿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完成的。后来写了几篇文章，回顾这几部书稿的撰作过程，有《“知人论世”、“见由己出”和“法不前定”——〈吴敬梓研究〉出版二十年回顾》《“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运用传统形式整理〈儒林外史〉的回顾》和《“设情以位体”——〈吴敬梓评传〉出版十五周年回顾》等，此不再多做引述。

三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前二十年间的“跋涉”经历及主要成果已如上述。九十年代以至近日后二十年间的“跋涉”，仍延续前二十年的途径继续向前、深化。

《〈儒林外史〉人物论》。1989年下半年中华书局胡友鸣先生和另一位同志来舍间约稿，约我为《文史知识》“治学之道”栏目写一篇文章，

同时在刊物上开辟一个专栏，我允其所请。便在过去做《新批儒林外史》的基础上，将作品中的人物逐个挑选、排比，并列出他们之间的种种关系，拟出写作意向，征得编辑部同意认可后，便于1990年年底动笔，先行写好几篇寄去，从1991年7期开始刊出。发表了十几篇后，编辑部建议再写几篇，做为“文库”之一出书，不再在刊物上发表，于是1993年4月签订合同、1994年交稿、1998年出书。《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究卷》中有对拙作的评论，说这二十几篇人物形象分析的文章“构成了《儒林外史》人物论的完整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力求从文化背景、作者际遇、时代特色、作品内涵等方面分析人物性格及其形成的内外因素和主客观条件，从而颇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思想和艺术特征”。

深化作品的研究，还有一成果就是对《新批儒林外史》所做的修订工作。虽然该书一再印刷，但其间一些印刷错误未能改正。见书后，一有空闲即对之修补，但直到新世界出版社负责人周奎杰女士来宁，方有机会重新出版。周女士原为外文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主任，因在北京图书馆见到我用笔名出版的对古代戏剧的改写本，便通过中文版编辑找到我，将我的改写本出版了英、法、德文本。此际她已调入新世界出版社，知道我有意将《新批》重新修订，便表示可由他们出版，乃更名《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交给新世界，2002年出版。见书后，为精益求精起见，仍不断修改。2009年，又由该社出版了《清批》的修订版。

这些，均是对《儒林外史》做深化研究的成果，至于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作家吴敬梓的深化研究，《吴敬梓评传》虽已印行几次，也未有机会予以修改。直到

2009年底接到南京大学出版社通知，拟出版典藏版，乃借此机会做些小的修改。所谓典藏版于2011年11月出版，其实，除了开本变大外，纸质、装帧均不如前，特别书前所附照片（包括匡亚明先生墨宝在内）一律去除。不过，内容虽是“小改”，毕竟做了一些增饰。据出版社告知，这本评传累计印数达一万六千册，在二百部评传中印数过万者仅十余部，2001年还曾被香港公开大学馆藏图书制成光盘版。至于深化作家研究的论文颇多，如《试论“思想家小说”作者吴敬梓的思想》、《吴敬梓生平文献资料的引用、解读和考辨》、《为吴敬梓“让袭”说“寻根”小议》等等，不再罗列。

至于作家与作品综合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如1994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主编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儒林外史辞典》，共分作者、诗词、思想、艺术、资料、辞条六编，清华同方还为之出版了光盘版。这方面的论文也有《吴敬梓的生活环境与〈儒林外史〉的地域特色》等，可参见笔者的论著目录，此不详列。

后二十年“跋涉”的一项重要成果则是《〈儒林外史〉研究史》。为了做这一课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末就撰写了《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鲁迅与吴敬梓》二文。八十年代起，对清代四家重要的批评本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论卧评有二篇，齐评、张评，黄评各一篇。进入九十年代，则写有《〈儒林外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二百余年来〈儒林外史〉研究之回顾》、《二十年世纪〈儒林外史〉研究概况》等专文；此外，还就历来研究吴敬梓思想、《儒林外史》主题、人物形象的等专题成果分别做了回顾，这些，都是为了撰写《〈儒林外史〉研究史》的铺垫。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乃申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项目，被获准立

项（编号为[1995]09—023）。正当其时，新入学的博士生吴波君希望参加这一项目，出自薪火相传的考虑，乃允其所请。其所做的协助，即根据笔者长期积累的资料、发表的大量论著，按照我们拟订的章节，剪辑或稍作改写纳入书稿中。在这过程中，我还先后发表了《撰写学术史的思考》、《撰写〈儒林外史〉研究史的再思考》、《〈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等文，供其思考汲取。有些文章虽然发表在后，但其中见解却提前与之详谈过。他每完成一章，我便审读一章，提出意见，供他修改，经过吴波君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一部三十几万字的书，先行上报结项。初稿通过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考虑到作为一部学术专史，要力求出精品，拟再作磨合。吴波君也同意，但他即将毕业赴湘工作。经与其研究，便由我主动找李忠明君来商量，请其接手此项工作。忠明早于吴波十年来随我学，对我的研究情况更为了解。只是由于本身工作十分繁忙，修订数年之久，其间我又补写了不少有关研究史的论文供其采纳，最后完成一部五十万字的书稿。海峡文艺出版社以之申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获准后很久，我才知道著作责任人仅列笔者一人，我便向出版社提出不可忽视吴、李二君的贡献。出版社答复是，他们做过专门研究，认为该书内容大都是笔者的研究成果，又考虑到知名度，便如此申报。既成事实，也无可奈何。但令人不解的是正式出版时作者栏中却漏列笔者，虽来函道歉并补寄来重新制作的版权页，但书已印出，也只能随它去了。清华同方于2011年出版光盘版时，根据当年与海峡社签订的正式合同做了改正。

“儒林”跋涉四十年的主要成果大体如此，而且已成为历史的产物。学术的发展是无限的，

学人的生涯则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生涯中力求做出最大的贡献。何满子先生在收到我赠送的《〈儒林外史〉研究史》时，于2006年11月8日来信说：“兄真是为吴敬梓拼搏大半生，成绩卓荦可观，中国研究《儒林》第一家也。”“拼搏大半生”是事实，“第一家”云云，却不敢当，学术在发展，新人在成长也。

四

苜蓿生涯六十年，跋涉“儒林”四十载，无非是讲堂之上，讲授诗文，或是埋首牖下，仰屋著书而已。偶或应邀参加一些社会、学术活动，此文则仅就有关“儒林”者，略作回顾。

1984年春，南京电视台先后摄制专题片《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以及系列片《儒林外史》，应他们邀请担任文学顾问。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拍摄《中华文明之光》中的《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专题，专程来南京采访，除了接受他们的采访外，还让弟子陪同他们去全椒。笔者以为将古典文学名著搬上电视屏幕，是向广大群众宣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极好措施，自应支持。

参与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的复建工作。1983年冬，全椒县委文书记（忘其大名）派车来宁接我去全椒，讨论纪念馆的重建工程。于1984年10月8日开工，1985年底竣工，全椒方面还制成纪念馆画册，送来几十本，让我代为赠送海内外学者。此后历届县领导如阚家衡、殷守余、龚金龙、李忠烈等同志常来舍间或接去全椒，海外学人来访，或陪同去全椒，或介绍他们自行前往，为弘扬吴敬梓的成就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该县领导李忠烈同志还于1997年11月21日来到舍间，将他们在景德镇烧制的吴敬梓座像赠我，以表示全椒人民对我的感谢。可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也许我的一些研究文字不符合某些人炒作之需，几乎与我断绝一切往来。笔者研究吴敬梓就是为了肯定他的成就和贡献，但也从不讳言其不足；至于吴氏家族史上的种种矛盾，也根据可信的文献资料予以考证，做实事求是的叙述，绝不作迎合、媚俗之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曾多次建议在南京修复秦淮水亭，媒体多有报道，在笔者担任省政协六、七两届委员时，两度写有提案，终于在1997年10月建成，并应邀撰写《秦淮水亭重建记》碑文。2004年应约撰写《十年动议，政协促成——吴敬梓秦淮水亭修复记》，刊于《江苏政协》9期，全国政协所编《人民政协记事》也收入此文。可是建成不数年，已经荒败，《金陵晚报》（2011.9.28）大字标题报道《夫子庙“吴敬梓故居”如今成了茶馆》；黄强在《文人置业那些事》一书中问作者：“不知当年花费十年工夫，多方呼吁才复建了吴敬梓秦淮水亭的陈美林教授，近年可故地重游？假若见到此情此景，他又有何感慨。”又有人手持《扬子晚报》（2011.11.30）的报道，问我吴敬梓移家南京前，全椒的“田庐尽卖”，怎么当今全椒要花巨资修建探花第和吴氏宗祠呢？如果吴敬梓仍然住在高墙深院的探花第中，仍然是一个搢绅子弟，能写出《儒林外史》来么？这些问题，我回答不出。假若吴敬梓还活着，他本人能回答出么，我也不知。

有关《儒林外史》学术讨论会，据统计建国后共举行七次，第一次是1954年在北京召开的吴敬梓逝世20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皆一时学界名流如茅盾、曹禺、翦伯赞、吴组缃等。彼时笔者刚参加工作一年，也未研究过《儒林外史》，自然沾不上边。

1981年秋，在安徽滁州召开纪念吴敬梓诞



陈美林先生 2004 年在吴敬梓故居秦淮水亭留影

生 280 周年学术讨论会，笔者被邀请与会，《滁州报》1981 年 10 月 13 日报道。出席会议者尚有各地“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范宁、章培恒、霍松林、赵齐平、陈美林、李厚基、高明阁、宁宗一等七十余人”。

1984 年 11 月，在南京召开纪念吴敬梓逝世 230 周年学术讨论会，由时任江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的汪海粟同志任主任委员，委员 22 人，除本省有关领导和学者外，外地尚有何满子、章培恒、袁世硕、刘世德、宁宗一等。因拙作《吴敬梓研究》刚出版，作为会议赠书之一，同时任文学顾问的《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专题片也要在会上放映，所以也安排为委员之一，但未参与任何工作，只是接获通知，开幕式必须参加。最后一天成立“中国《儒林外史》学会”，本人未到会场。《新华日报》1984 年 11 月 3 日、7 日均有报道。出席此次会议者有全国各地学者

120 余人。

1986 年 6 月，在全椒召开纪念吴敬梓诞生 285 周年学术讨论会，《安徽日报》（1986.8.26）报道“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陈美林、李汉秋、宁宗一主持了会议”，与会者五十余人。

1996 年 7 月在扬州召开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的《儒林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起因在于国外一些同道来访时多次提起希望一同讨论，乃由笔者时任会长的江苏明清小说研究会与扬州大学联合举办。扬州大学建议要加上“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的名义合办，但此际学会尚未登记，恐有不便，扬大同志说只开一次讨论会，也无大碍。彼此明确只讨论学术、不涉及学会的原则，再征得会长章培恒的同意并表示与会后便加上这一名义。岂料开幕式前收到章培恒同志来信，不知谁人对他说学会要换届，他表示既然如此，要辞去会长职务，并不来与会。

紧急去电说明，也赶不及参加开幕式，只得罢了。此会与会学者有来自美国、瑞士、韩国的学者多人。《扬州晚报》（1996.7.15）、《扬子晚报》（1997.7.20）均有报道。

2001年为吴敬梓诞辰300周年，原先安徽大学与南京师大拟联合办会，双方负责人已经具体会商过，岂知安大于10月26日单方召开。为团结起见，笔者也应邀赴会。同年12月5日滁州又召开纪念会，因性质相同，不拟赴会，但滁州方面考虑会长章培恒不能到，便再三邀请并派车来接，乃去参加，但提前离会。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也举办学术讨论会发来邀请，原拟赴会并写好发言稿，但同时在政协礼堂举行的纪念会，未发邀请函，所以文学所的讨论会也就未去参加，发言稿乃委托在北京的一位弟子张平仁教授在会上代读。

2011年11月全椒主办纪念吴敬梓诞辰310周年讨论会，11月1日全椒旅游局长田胜林同志来访，并持汉秋兄10月29日一函，说：“全椒筹备纪念诞辰吴敬梓310周年并筹组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筹）。鉴于吾兄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拟推兄台为名誉会长，祈请俯允，以光学界”云云。据田局长说，一切就绪，届时派车来接。既成事实，不便拒绝，以免误解为反对，只允参加开幕式。但此后一无消息，仅会后托人捎来一纸名誉会长证书及会议文集。行文至此，也有必要将1984年成立的“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的前后，据笔者所知略作回顾。1984年暑假前夕，“前言”小组负责人前来舍间通知我，说要成立学会，要我下午去参加会议。我说没有接到校或系领导委托，我也早调出“前言”小组，不便与会。中午，谈副校长屈尊来舍间通知我与会，在问清我校尚另有人参加，便允去坐坐。只因在南师的会上坐了半天，外界便

以为我是筹备人员，安徽大学孟醒仁先生便带领几位青年同志找到我，反对该校一位同志出任副会长。我再三说明未参与筹备，他又去找了别人。我明白这种事会引起种种矛盾，所以在成立学会的11月7日晨，即离开学校避会。第二天方知道依然被推为副会长。后来见到名单，名誉会长为吴组缃，会长是章培恒，副会长除笔者外，尚有李汉秋、宁宗一，理事有刘世德、聂石樵、陈毓罍、鲁德才、李厚基、何满子、郭豫适、何泽瀚、袁世硕、孟醒仁、谈凤梁、李灵年、吴圣昔、杨子坚等四十人。关于2011年新成立的学会，仅知道会长为李汉秋，至于副会长，理事等，未见名单，一无所知。1984年被选为副会长，2011年被推为名誉会长，两次笔者均不在会场，历史的重复竟然如此相似。总之，副会长也好，名誉会长也好，均与笔者在“儒林”中跋涉无关。多年来从不提及，甚至政府有关部门请我撰写《秦淮水亭修复记》碑文时，也拒绝写上这一头衔（当然也有他人在某种场合径行加上，则无法一一避免）。本文之所以涉及，绝非以此炫耀（其实这种事又有何炫耀价值），只是回顾往昔，不得不写出这一史实罢了。

“儒林”跋涉四十载，可忆可叙之事尚多，如天假以年，或再为文追述。

陈美林 男，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等学术著作四十余种。

陈小滢和她的纪念册

三 张昌华



凌叔华（中）、苏雪林（右）和陈小滢

陈小滢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其父陈西滢时为武汉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母亲凌叔华能文善画，有一代才女之誉。父母忙于自己的事业，把女儿交给保姆，以至独生女小滢变成了“野孩子”。小滢对笔者说，她童年的快乐就是与小伙伴们穷玩，在草地上打滚、爬树摘果子，追逐嬉闹，是个地道的“疯丫头”。她浑身散发着一股野小子气，讲义气，爱打抱不平，还与孩子们拜把子“桃园三结义”。小伙伴称她“铁姐”、“铁哥”或“铁弟”。

父爱如山，母爱似水。尽管儿时在生活中，小滢的父母对她的呵护不那么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但精神上传统文化的熏陶如春雨润物，滋润着小滢健康成长。据《让庐日记》（杨静远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记载，1944年正值抗战艰苦岁月，小滢14岁，见街头布满“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大标语及学校的动员，与几位同学写血书报名参军。当时小滢暂住袁昌英家，闹得袁家一家人紧张得不得了。终因年龄太小，没被批准。那晚她在灯



陈小滢（左）与杨静远（张昌华 摄）

下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后按捺不住心头涌动的热血，给国民政府派遣在国外宣传抗日的父亲写信抒怀。1945年1月，陈西滢收到信，为女儿的爱国行为而自豪，将信交给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编辑朋友看。编辑阅后立即发表，并在原信前加上按语，曰：“陈源教授十四岁的女公子从乐山来信给她爹爹，要求从军。编者捧读再三，实在爱不释手。我们中国将来必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失败。编者征得陈源教授的同意，发表原信，一字不改，以飨读者。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胞读后，都感到惭愧和奋勉。下面是陈小滢小姐的信。”

而母亲凌叔华则以另一种方式给小滢一种不寻常的母爱。为培养女儿对文学、艺术的兴趣，1940年为小滢建了一本纪念册。1943年，武大迁至乐山，物资匮乏，已上中学的小滢自己用搜罗的杂色纸张打洞装订了第二本纪念册。凌叔华很高兴，在纪念册的扉页上画了一幅《乐

山风景图》，以资鼓励。也是在乐山，第二本册页用完了，乙酉元旦，朱光潜先生送了小滢一本“豪华版”（硬壳）纪念册，还在首页上题了“皆大欢喜”四个字。这三本纪念册与小滢形影不离，相伴一生。且说第一本吧，1941年凌叔华携小滢入川，小滢怀揣纪念册坐火车、小火轮、大卡车、马车乃至步行，由北京、上海、香港、柳州、桂林、贵阳，颠簸大半年才到重庆，最后抵乐山。抗战胜利后，小滢独自一人搭人货混载的大卡车到重庆找二叔陈洪。她怕纪念册丢失或被窃，与其他重要物品缝在大衣的夹层中，穿在身上，像个大熊猫，以至进旅店小旋转门时被夹住，还是服务员将她拽了出来。再以后，随着父母工作更动，这三本纪念册跟她漂洋过海，作漫长的国际旅行：英国、美国、西班牙、法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刻下，当年的黄毛丫头陈小滢，岁月已将她雕刻成拄杖的老妪。2011年，这三本纪念册随着八十岁的老人归根北京了。闻知这三本纪念册风风雨雨七十

多年的传奇，笔者作了多次采访，饶有兴味地记录了这个把“根”留住的故事。

小滢对我说，这三本纪念册是她人生的动力和心情驿站，是长期远离乡井的心灵依托，是对根的一种怀念。她说：“那里面有祖国的沧桑，童年的故事，前辈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眼前的三本纪念册，其貌实在不扬，角卷纸破，纸质泛黄发脆。七十多年来，不知被多少人抚过，阅过，不知有多少人被感动得笑过、哭过，或唏嘘过。小滢说，在册页上题词的前辈已渐次凋零，张充和大概是惟一健在一位；当年儿时玩伴也走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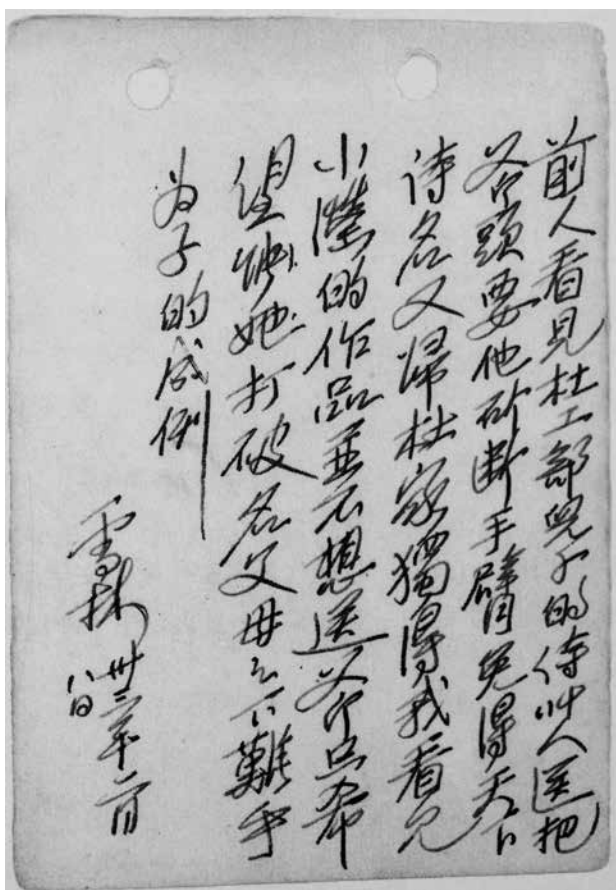
我拜读过这三本纪念册，从俗人俗语评雅事的角度，概括为三个字：“高、大、趣”。

高者，境界也。

通览纪念册上各路名流的题墨，我得出的第一印象是境界高。即令是当年儿伴或青葱岁月同龄人的留言，一扫凡言俗语和小资情调，多为励志警句和修身养性名言。诸如“要做大事，须立大志；要立大志，需在小时”（方克定），“莫等闲白少年头，空悲切”（启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刘保熙），“无私则刚，无欲则明”（司徒慧敏），“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余楨），“不哭，不笑，理解人生”（皮公亮）。小滢儿时“把兄弟”李永直在她立志执笔从戎时写的：“铁弟，我不流血，谁来流血！”令人震撼。爱国情怀，燎原心胸，国家兴亡，少年有责，跃然纸上，读来谁不为之动容？

在众多的名流题辞中，我最欣赏的是苏雪林。

苏先生是小滢母亲凌叔华的好友，同享“珞珈三女杰”者。小滢天资聪颖，幼时文章出色，又擅丹青水墨。面对这样一位晚辈，苏雪林不予溢美，题的是：“前人看见杜工部的儿子的



苏雪林题字

诗叫人送把斧头要他砍断手臂免天下诗名又归杜家独得我看见小滢作品并不想送斧只希望他打破名父母之下难乎为子的成例。”为便读者理解，笔者先作笺注。唐从杜甫祖父杜审言到杜甫，杜家以诗享名天下，令世人羡慕且妒。杜甫的儿子杜宗武把自己的诗呈阮兵曹（兵部阮姓官员）看，阮兵曹阅后，以一柄斧与原诗一并退回。杜宗武捉摸其意，窃思：斧者，拆开是“父”与“斤”（砍削），遂于友人私语莫非是要我将诗作呈父亲斧正？阮兵曹获闻后却说：“我要让人（或你自己）砍了你那擅诗的手，免得天下诗名全归你杜家了。”苏雪林期冀小滢，破父母盛名难乎为子的惯例，希望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心真谓良苦。我与小滢讨论苏先生这一题词时，年已垂老的小滢感慨不已，大有



吴稚晖题画

此生在文学、艺术上乏建树，有愧对前辈厚望之憾。

大者，范儿也。

纪念册中文学前贤名录中，信手列出一位也令人眼睛一亮：（齿序）民国元老吴稚晖、清科举最后一位探花商衍鎤、爱国将军冯玉祥、社会活动家李德全、经济学家杨端六、作家袁昌英、语言学家赵元任、赵杨步伟、作家丁西林、哲学家冯友兰、作家苏雪林、美学家朱光潜、漫画家丰子恺，以及方令孺、许广平（景宋）、陆小曼、赵清阁、沉樱、叶浅予、戴爱莲、萧乾、王世襄、张充和等，还有缅甸国际友人哥雷（王英汉），无一不是一代名士，无一不为一

方人物。且人物涉及的社会门类众多，文武皆备。文含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武中冯玉祥将军自不待言，还有不穿军装的国民党中将杨端六，系蒋介石当年的经济学老师，毛泽东曾请他于1920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演讲，《大公报》报道时署“杨端六讲，毛泽东记”，足见这些时下“名不见经传”者是何等人物了。

趣者，味也。

欣赏那些琳琅满目的题墨，虽风格迥异，然时代印痕、个人风格、幽默谐趣尽藏白纸黑字间。1946年，小滢随母赴英与父亲团聚，适与冯玉祥夫妇、叶浅予夫妇和冯友兰等同乘“麦琪将军号”横渡太平洋。时国难当头，冯友兰

信手题了“同舟共济”四个字，一语双关，内涵深远。冯玉祥写的是“君子三要：要科学、要民主、要和平”，尽显将军本色。叶浅予签名潇洒，一如其人风流倜傥。

杨端六、袁昌英是小滢的干爸干妈，笔下流出的情感又是一番风景。杨端六题“一只可爱的花得着日光雨露的调养自然会繁茂起来”，落款是“滢季干女儿赏玩”；饱喝洋墨水的袁昌英用英语摘录了诗人雪莱《致云雀》的片段，文末却署“送给我亲爱的干女儿，爱你的干妈”。

赵元任的题字中英两种，中文部分夹杂着拼音和冷僻的汉字，似无人能全识，显出他语言学家的范儿味和老顽童的可爱。张充和幽默，没头没脑天上掉下一般，只写一句：“你还记得我在落伽（珞珈，笔者注）山变的戏法吗？”答案只在两个当事人心中。丰子恺作的是幅一个小女孩为盆花浇水，题为《努力惜春华》。

许广平（景宋）、陆小曼、赵清阁的几幅作品，是1946年凌叔华在上海候船拜访他们时代小滢求的。值得一提的是许广平，她写的是“多才多艺，博学和平，像我们先生一样”，且称她“小滢妹妹”，异常亲切。鲁迅、陈西滢笔战的硝烟毕竟已随岁月逝去，从留存的文字中看得出许广平的襟抱。她谦称是凌叔华的“学生”，也有缘可溯。许与小滢的十四姨凌淑浩是天津女子师范时同班同学。凌叔华也曾在该校就读，班次较许高，后入燕京大学。许进北女师大时，凌曾在女师大授过英语，故尊称凌为“先生”。陆小曼一生挥不去徐志摩的影子，她题的是徐志摩的一首小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水仙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忧愁。”落款是“陆小曼写于小滢妹一笑”。我妄测，陆写此诗与其说让

小滢一笑，还不如说博凌叔华一笑。谁不知道徐志摩、陆小曼和凌叔华之间曾有一段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感往事呢。

文末必须补缀一笔，纪念册中年齿最长、资历最老，与小滢家族关系最亲的是吴稚晖（吴敬恒），他的留墨是一幅《大佛与小佛》的画，据说这是迄今能见到的吴氏惟一的一幅画。画面一个大佛的双肩盘着两尊神态可掬的小佛，大佛头上还顶立着一尊小佛。题字为：“我从千佛来，来见嘉定（乐山，笔者注）佛，千佛是小滢前生，大佛我与父亲所见。”为写此文，我请小滢提供此画背景资料。小滢说：“1942年，吴老先生到敦煌参观归来，途经乐山，特地来看我们的。”又说：“吴、陈两家有亲戚关系，吴稚晖是我父亲的表叔，是吴老先生将我十五岁的父亲带到英国，又把我二叔陈洪带到法国的。两家人很亲，我小时候吴老先生很喜欢我。”我问大佛、小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小滢说前两句她懂，后两句到现在也不明白。能解这个谜的只有吴稚晖，非他莫属了。

小滢的纪念册，所收藏的绝不止友谊，更是历史，或曰历史的见证，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雪泥鸿爪。高艳华女士协助小滢将其梳理编成《乐山纪念册》，201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梁实秋女儿梁文茜说“所用的资料都是‘野生’的，所以很好看”；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评论说，“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回忆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开拓了一段很值得回味的历史”。

张昌华 男，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文化随笔集《书香人和》、《民国风景》、《百年风度》等。

[佳作同赏]

编者按：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增辟“佳作同赏”栏目，陆续发表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以供读者朋友们同享。



翠嶺晨嵐圖
 長歲
 目極湖
 山千
 里外
 人
 在水
 天一
 色中
 雲
 縹緲
 亂山深
 最
 吾
 傍
 翠嶺
 已卯中秋
 前一日
 寓於石
 之
 食硯齋
 晴窗
 宋玉麟
 畫



宋玉麟 《翠嶺晨嵐圖》 1999 年

[佳作同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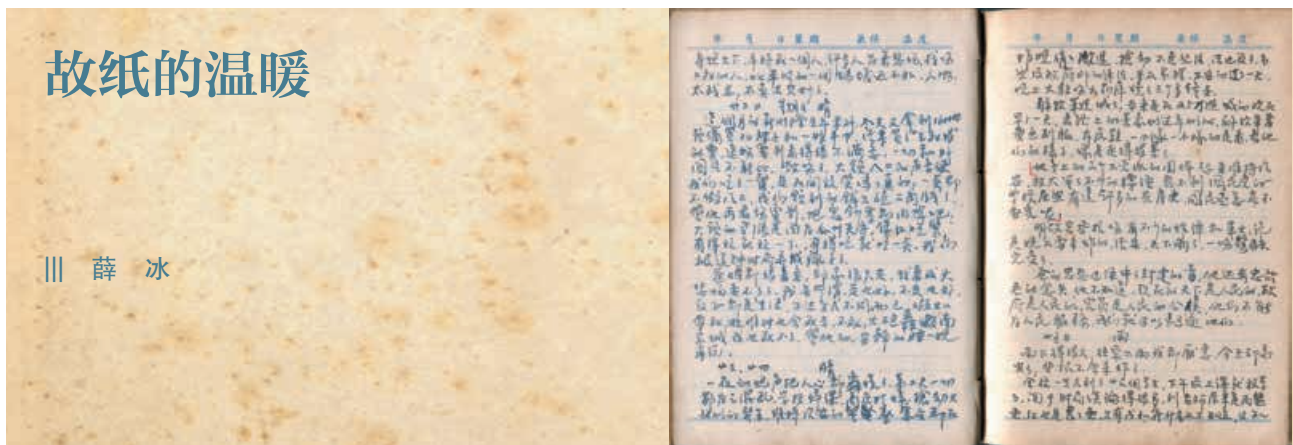




薛亮 《太行铁壁图》 2012 年

故纸的温暖

III 薛冰



1949年4月日记

2013年初，观筑历史建筑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卫新先生说起，美大纸行旧址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他希望将这幢小洋楼的一、二两层辟为公益展厅，用于举办民国文化的主题展览，打造成一个丰富生动的“民国印象馆”。我很赞成他的设想。因为展馆的前身是民国年间的纸

行，最后就商定了第一个展览要做民国纸品展，展厅他来安排，展品由我提供。

经过紧张的筹备，为期十天的“片纸闲墨——民国纸品展”于4月2日拉开帷幕。一楼展厅中，是“社会变迁”、“人生风俗”、“读书教育”和“笺封杂纸”四个纸品系列，二



辛亥日记二



洪宪文书加盖“中华民国”字样



农艺专校抗日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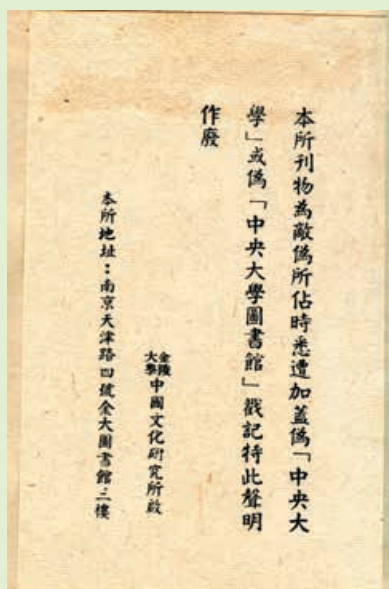
楼展厅则是从民国元年 to 三十八年逐年出版的四十几种书刊，用以展示民国年间出版物的用纸、印刷、装帧等各种形式和时代特征。

展厅面积不大，我只能择取几个民国关键的时间节点挑选展品。

“社会变迁”部分，第一件展品是商务印书馆印制的1911年日记本，扬州法政学堂的一位学生，以毛笔工楷记下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见闻。他10月13日即从《时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武昌闻已失守矣，瑞督走汉口，张彪被戕，标、协以下多死伤者。此《时报》之电也。”第二天的消息更为确切：“阅《时事报》，悉张彪已逃日租界。革军领袖即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也，故新军叛者六十一营；而汉阳亦于次日失守，盖兵工厂、铁厂皆黎旧部，故不战自定，厂失而汉阳随之也。又闻汉口车站已为革军所得，汉口市面非常恐慌，钞票以银元局失而信用亦失。彼党亦造军用钞票云。”15日，两淮盐运司“以鄂乱，禁人送报”，而“吾侪欲发电，电局

辞以涉及军事，概不能发”，然而大势所趋，革命的消息已经封锁不住。19日，作者第一次表露对革命的态度：“盖彼国民军之程度，实皆优美，故所作为皆有条不紊，而对民、对外又悉平和，此尤识者所共认而外国所注意者矣”，“又善用怀柔之道，人心益安。此则政府之殷忧而国民之深望也”。

民国五年袁世凯的称帝，是一场短暂的闹剧。展品中有两件印有“洪宪”年号的警事文书，所用是江苏巡按使公署专门发行的经折式“官纸”，页尾钤有“江苏巡按使公署发行官纸公章”和“江苏省立官纸印刷厂厂长章”两方篆书朱文方印，且要求加盖发行分所章。尾页正中，以毛笔填明日期，为“洪宪元年三月四日”，上钤“如皋县印”篆书朱文阔边大方印，边长达六十九毫米。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在全国各界的激烈反抗下，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没用完的这种公文纸，遂在“洪宪”年号上加盖“中华民国”字样，继续使用，所以第二件公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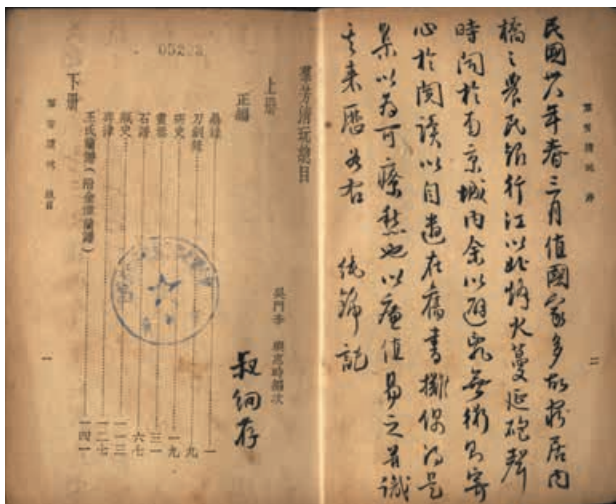
金陵大学声明



《河徙及其影响》封面



中国政治秘闻



萧纯锦题记

的日期已是“中华民国五年九月八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英文典大全》后衬页上，钤有农艺专校特制的印章，印文是：“全国同胞要一致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我们要用铁和血去报复国仇。九月十八日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国耻纪念日。卧薪尝胆，复仇血耻。”学校以这样的方式，宣传抗日，使此书成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南京沦陷期间，金陵大学藏书被汪伪中央大学所掠取，这本《河徙及其影响》封面，被盖上了伪“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印。抗战胜利后，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收回藏书，并在书前粘贴了一纸声明：“本所刊物为敌伪所占时悉遭加盖伪‘中央大学’或伪‘中央大学图书馆’戳记，特此声明作废。”堂堂正正，毫不含糊。

1948年4月下旬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当年6月，福州千秋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中国政治秘闻》，披露选举中的大量高层黑幕，并借李宗仁“肃清贪污”、“清算豪门”的竞选口号，提出反孔、宋豪门运动，揭发福建、四川等地的腐败政治实况，显示出当时文化人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而这样的书能够公开出版，也说明国民党统治分崩离析、风雨飘摇已到何等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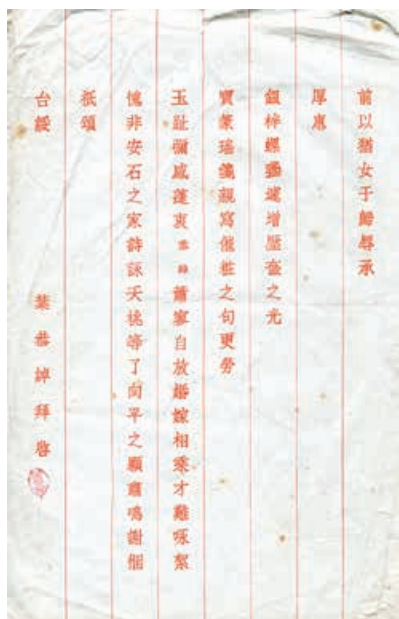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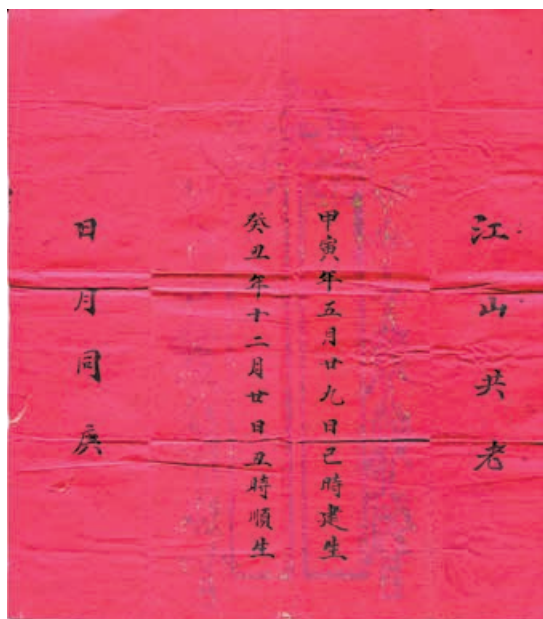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萧纯锦在一本《群芳清玩》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记：“民国卅八年春三月，值国家多故，穷居内桥之农民银行，江以北烽火蔓延，炮声时闻于南京城内。余以避乱无术，则寄心于阅读以自遣。在旧书摊偶得是集，以为可疗愁也，以廉值易之，并识其来历如右。”在那个历史大转折关头，知识分子的纠结情怀跃然纸上。



中大日报



喜帖



叶恭綽谢帖

4月1日，南京发生“四一”血案，中央大学等院校师生为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至“总统”府请愿，回校途中遭遇暴徒袭击，死3人，伤200余人。但中央大学师生并没有屈服，4月16日学生应变会发行的《中大人报》第八期，仍以整版篇幅刊载抗议文章及各地声援的消息。

最后是南京一位小学教师1949年的日记，4月22日，她写到：“这个月的薪水除五斗米外，今天又拿到160000，预备买双袜子和一条手巾，结果买了‘生死恨’的票”，一场电影看下来，“大头八二的声音使我们吃了一惊”，一块银洋兑换82万钞票，“我们领到的钱只值二角钱了”，无可奈何之际，她只好再看一场电影，“把鬼钞票都用掉吧”。23、24日的日记是记在一起的：“一夜的炮声把人心都轰慌了，第二天一切都为之混乱，学校停课，商店打烊，抢劫又狂似的发生，维持治安的警察宪兵都在昨晚悄悄撤退。抢劫不是犯法，法也没了，当然没政府哪来的法。

呆在家里，不安的过了一天，晚上大校场火药库烧了三个多钟点。”24日一早，“解放军进城了，本来是在25日进城的，现在早了一天。马路上的景象似过年似的。解放军着黄色制服，布底鞋，一小队一小队的走着，看他们的样子，像是走得很累了。地方上的几个不党派的团体起来维持治安，政大写了不少的标语。想不到国民党的学校居然有这许多的共产党，国民党怎么不要完呢！”她并且记下了对新政权的认识：“现在的天下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就可以驱逐他们。”

“人生风俗”部分，以一组纸品，反映了从合八字、办婚礼、生孩子、庆高寿到悼丧亡的人生历程，每一个环节都有隆重的仪式和相应的文本，显示出对于生命的珍惜与尊重。旧时男方向女方求亲，先要请媒人去“问名”，即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请算命先生推算双

方八字是否相合；如无妨碍，请文士写出喜帖，雅称“龙凤帖”、“鸳鸯帖”，两边写上“江山共老，日月同庚”等吉祥语，核心内容则是并列的男女双方生辰。在婚姻法颁布实施之前，这种喜帖就相当于结婚证书了。

举行婚礼，照例要邀请亲友，民国年间通用的红卡纸请柬，写明新人身份、婚宴地点、时间等，当时使用阳历时间不长，为免误会，往往同时注明阴历。婚礼现场，主人会准备一本“喜籍”，登记来宾赠送的礼金礼品，既表示对送礼者的尊重，也便于日后还礼。婚礼结束，讲究的人家，还会对参加者表示谢意。文化名人叶恭绰先生曾专门印了一种谢帖，郑重其事地感谢宾客馈赠礼物并前来参加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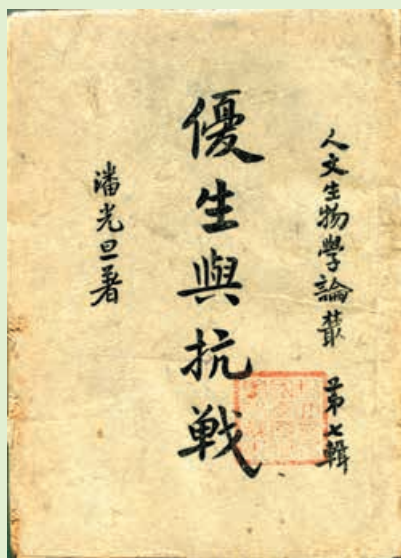
新婚夫妇生了孩子，满一百天时会举办庆祝活动，称“过百岁”；满周岁时会邀集亲朋让

孩子“抓周”。客人照例须准备礼品，多是孩子的玩具、饰物，主人也同样要登记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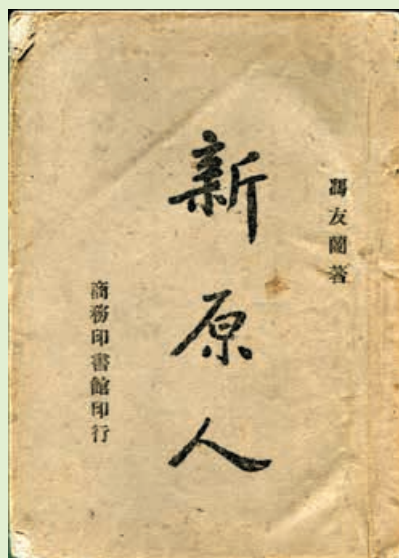
“人生七十古来稀”，当时人年届花甲，往往就隆重地举行庆贺活动。如展品中的《沈仲芙先生六十寿诗合刊》，时值抗战期间，东台沈氏流寓上海，不愿大办寿宴，遂作八首“六十述怀”诗，邀各位亲朋唱和，汇印为一辑，冠以寿星照片和“全家福”，以此作为纪念。

老人去世，家属照例要发讣告，从江浦县桥林镇侯家的讣告，可以见出其一般形式。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则会印制专门的《哀启》，于讣告内容之外，介绍死者的生平事业及亲友的评价，还会请当地名人题赞。如无锡陈献文《哀启》，在死者遗像后，印有钱基博先生的《陈献文先生遗容赞》，这都具有盖棺论定的意味。有条件的人家，还会将亲友的怀念文章，汇印成





《优生与抗战》 江西土纸本



《新原人》 重庆土纸本



大学丛书《中国古代史》 土纸本

纪念集。

这样一些礼仪，如今多以被遗忘或淡化。究其原因，恐怕不能仅用生活节奏变快来解释，深层次中透露出的是对生命的漠视。

民国年间出版的书刊，有传统的雕版印刷宣纸线装本，石印本、排印本也有仍采用线装形式的，讲究的还会外加青布函套甚至红木夹板，但更多的则是西式的平装和精装本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土纸本。按传统的版本学概念，图书用纸质量越好越受人重视。然而，当时坚持抗战的四川、广西、云南、江西、陕北等地，在日伪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之下，出版用纸严重短缺，不得不以民间生产的土纸印制书刊。这种粗劣的土纸本尤其令我感动，尽管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仍顽强地坚持文化的传承，这就是民族的希望。

美大纸行位于南京升州路东口，紧邻甘家

大院，民国年间号称“城南第一高楼”；2009年城市改造中险遭拆毁，经社会各界争取得以幸存。观筑历史建筑文化研究院对该建筑精心维修后，入住其间。可贵的是，陈卫新先生明确提出，这样的民国建筑，应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源，让广大市民都有机会置身其中。这次民国纸品展，固然只是一个尝试，可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市民的高度评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想，这也就为南京城里各式各样历史文化遗址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这工作不一定非得政府出面，有条件的公私业主，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模式，为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光彩。

薛冰 男，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著有《家住六朝烟水间》、《南京城市史》等著作四十种。

1865：战争与救赎

III 贾梦玮



“金陵制造局”门楼，透过便门，可以看到园区内的佛首雕塑。

人们习惯说“历史耐人寻味”，“1865”的前世今生，尤其如此。因生产车间已搬迁，如今的“1865”是一片创意产业园区，有高档宾馆和休闲餐饮会所，创意公司和艺术家村，灯红，酒绿。可其肇始，却是1865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当年戒备森严，生产的是杀人机器。因其最早创建于1865年，这里被现在的人们称为1865园区。

1865园区现存7栋清代建筑和11座民国建筑。现为厂史陈列馆的三栋建筑是园区内年龄最大的厂房，名称和建造年代当年都刻在门额上：“机器大厂 同治五年”、“机器右厂 同治十二年”、“机器左厂 光绪七年”，旁边有铸铁立

柱，上面刻有“光绪四年金陵机器局监制”的字样。这些文字如今都还清晰可见。1865园区为中国民族工业肇始地之一，至今已近150年，其间沿革不断，这里一砖一瓦都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史。还有旁边的三藏殿、大报恩寺遗址、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遗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历史与实践，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留下的痕迹：历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涂抹。时间创造了一切，也改变了一切，诠释着一切。时间老人嘴角的一抹微笑，常常让我感怀不已……

1865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对于南京（金

陵)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和李鸿章这个大清朝冉冉升起的新星来说,意义更是不同寻常。彼时,南京的硝烟刚刚散去,百废待兴;李鸿章正当男人的盛年,功高而意兴。

上年,洪秀全盘踞了十二年的金陵被攻克,江浙肃清,清廷赐封劳苦功高的李鸿章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1865年,因原两江总督曾国藩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军剿捻,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意气风发,到任金陵。是年,李鸿章42岁,已经经历了诸多国际国内大事,眼界大开,认识到闭关锁国已无可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说:“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事,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在任江苏巡抚驻师上海时,李鸿章参观洋军,深受触动,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已。”(《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在和洋人“常胜军”共同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更是亲身见识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威力与威胁,以及对内镇压的不可或缺。太平天国的失败是湘军、

淮军和洋枪队合力围剿的结果,洋枪洋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善于总结的李鸿章认识到“洋务”的重要性与紧迫感,制枪造炮成为“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战争武器成了自立自强、救人救国的优先选择。

因此一到南京,李鸿章马上将他在苏州创办的洋炮局迁来,以其机器设备、生产材料、管理人员为基础,在南京创办了金陵机器局(也称“江宁机器局”),为当时的四大兵工厂之一(另三家是同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局,左宗棠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局,崇厚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江南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的建立,是李鸿章洋务生涯之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前些年北京建起来的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刻上了这一重要历史:“公元1865年乙丑,清穆宗同治四年,南京设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是江苏省内第一家引进西方技术的兵工厂,“屋宇皆仿外洋之式营造,以道员一人掌之。购机器于外洋,募洋匠为师,督诸匠制造炮位、烟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炸弹、洋枪抬枪、铜帽等项,解济淮军及本省留防勇营之用。”(《续江宁府志》)对于当时的南京人来说,无疑是个新鲜玩意儿,连1860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曾国藩都惊叹:“制造各种机器,皆用火力鼓动机轮,备极工巧。其中如造洋火铜帽、锯大木如切豆腐,二者尤为神奇。”(《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29)。“锯大木如切豆腐”,这对于闭关锁国多年的农耕社会来说,其震撼力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开始时的状况相当简陋。枪炮子弹为主要产品,后来兼及枪炮甚至舰船。因工艺不过关,曾发生多起事故,炮弹试射时炸死多人。连李鸿章自己也说,“近始兼习洋枪、



建于清末的机器大厂、机器左厂、机器右厂，现为厂史陈列室。



“1865”园区的“文革”遗存

小炸炮，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后来不断兼并扩建、引进人才，规模始大，质量得到提高。就是这样一座厂，当年也曾创造过多项全国第一，可见当初民族工业的落后程度。1865年，中国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当年三月

在南京举行了“黄鹄”号的首航仪式。1886年后，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铸钢炉，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铸钢，制造成功中国第一门克虏伯式后装线膛纯钢炮。1888年，徐建寅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成功当时先进的马克沁重机枪（当时又称为“赛电枪”），此为中国第一挺重型机枪。

金陵机器厂制造的武器，清政府用来镇压过国内的反叛起义，偶尔也打过洋人；国民党

掌握此厂后，制造的枪弹杀过日本人，也杀过共产党；日本占领时期，这里制造的武器既打国民党也打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金陵兵工厂（金陵机器局）厂长李承干回到阔别已久的厂区，为一个民族的大难不死喜极而泣，连西服也来不及脱下，就和同事一起跃入游泳池中，欢呼来之不易的胜利。哪知和平从来没有真正来临，国共和谈破裂，这里生产的武器弹药又一次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1949年，共产党接管后，这里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部军械部军械总厂”，后又改为“国营307厂”（1953年）、“国营晨光机器厂”（1957年）、晨光集团公司（1996年）。

金陵机器局的厂址当年选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扫帚巷，加上以后不断的改建扩建，覆盖了历史上多所佛教建筑遗址。金陵机器局所在地是古长干里，就是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那个长干里，而长干里是佛教三大舍利汇聚之地。制造杀人武器而且要不断升级换代的兵工厂选址在佛教圣地，客观上颇有讽刺意味。

早在公元248年，印度高僧康僧会在吴大帝孙权的支持下，在长干里创建了建初寺，并建第一座阿育王塔，此为南方第一座佛教寺庙。东晋时，建初寺易名为长干寺。东晋孝武帝宁康年间，高僧刘萨诃在长干寺发现了佛祖真身舍利，以及佛祖发、爪等圣物，长干寺成为佛教圣地。其后寺内又建起了两座阿育王塔。公元537年，梁武帝下令对长干寺进行扩建改造，并将佛祖舍利及发爪分为两份，分别放入两塔地宫之中，据佛教史记载，当天晚上，藏入舍利的两塔顶部同时大放光明。隋唐时长

干寺虽破败，但因佛祖舍利在此，因此不可避免地被人“惦记”。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润州刺史李德裕打开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找到21枚舍利。其中11枚被李德裕请往润州（今镇江市），在甘露寺建塔供奉，1136年后的1960年被考古发掘出土；另外的10枚仍留在长干寺，1186年后的2010年终于在南京重放光明。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因埋在长干寺地下的佛祖舍利经常显灵，全城僧众累又感应，宋真宗因此下诏重修长干寺，并兴建九级佛塔，真宗以10颗感应舍利为由，为塔赐名“圣感舍利塔”。借此机会，北印度高僧施护将其带来中国的佛顶骨舍利献给长干寺，藏于新建的宝塔地宫之中。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更名为天禧寺。此后，长干寺（天禧寺）继佛祖舍利、佛顶骨舍利之后，又迎来了第三份舍利，这就是玄奘顶骨。宋代天圣年间，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传得玄奘顶骨，并带回金陵，葬于古长干寺的东岗，上建白塔。此事见载《景定建康志》和元《至正金陵新志》。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玄奘顶骨因故迁葬于长干寺南岗，上建喇嘛塔形式的三藏塔，后来又在塔前建起了三藏殿。

宋元两朝，天禧寺一直是地位崇高的江南大刹。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对天禧寺进行大修，寺、塔焕然一新；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天禧寺不幸毁于大火。四年之后，朱棣下令在天禧寺原址重建佛寺，名为大报恩寺，“准宫阙規制”，规模、规格均超越从前，成为明朝的皇家寺院。特别是大报恩寺的九级琉璃宝塔，高达78米，周身饰以五彩琉璃，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塔”，自此此塔不断出现在历朝文人骚客的诗文中，西方来华传教士认为大报恩寺塔是“堪与世界七大奇迹媲美的建筑奇迹”。而这一

切，连同三藏塔，都毁于清末太平天国的战火，只留下一座三藏殿。

大地一片干净。地下的一切，等待着时间来发现、挖掘。

后来人们发现，这里还是古西天寺的遗址。1930年代增建厂房时曾挖出一完好的铜质古塔，高约三尺，底座约两尺见方，七级八面，每面的顶端各系铜铃。据同时出土的碑文记载，此塔为盛放名高僧班的答的舍利子所建。班的答

为印度来大明传道高僧，当时江、淮、

闽、浙等地的佛教徒不少在家

供奉他的画像；洪武二年

（公元1369年），明太祖

朱元璋赐给银章，称为

西天善世禅师。据《金

陵梵刹志》载，禅师

圆寂火化后，“获五

色舍利子无算。烟焰

所及，凝缀松柏，咸

若贯珠。车驾临视，

赐名西天寺”。清

初，西天寺之名几

近无闻，但建筑尚

存。汪世清《石涛

诗录》记载，大

画家石涛三十八

岁时（1679年），

“夏五月避暑

西天寺怀谢

楼”；三十九

岁（1680年）

定居西天寺前

面的长干寺。

历史的一面是“建设”，另一面是“毁灭”；

一面是“入世”的战争，另一面是出世的宗教。

待到李鸿章选址建厂时，这里已是一片废墟。

1937年，日军占领金陵机器局时，因在三藏殿后小山头上建造神社，挖出一石函，盛有包括玄奘顶骨在内的众多佛教圣品，但日军为独吞文物，一直对外封锁消息，1943年2月3日才由汪伪的《民国日报》披露此事，2月23日文物被移交给汪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签收。移交的文物包括玄奘顶骨，纳骨小龕，金质佛像，黄铜佛器，瓷器，珠宝，古钱等。1944年在南京小九华山建造一座新三藏塔，安葬玄奘顶骨的一部分。玄奘顶骨的其余被褚民谊瓜分，有的在国內，有的被日本人窃走。今天可以查实的，有北京广济寺、天津大悲院、成都静慈寺、南京博物院各一份；西安兴教寺的一份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由日本送还的；天津的一份，1957年由达赖喇嘛代表中国政府赠送印度，安放于玄奘当年留学讲经的那烂陀寺的纪念堂内；被日军窃走的部分，藏于日本埼玉县慈恩院，后又分出一部分给台湾，安放于日月潭寺塔。南京博物院的一份几经周折，1973年移入灵谷寺玄奘法师纪念堂的木塔中。

2008年前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对大报恩寺琉璃塔地宫进行发掘，十颗感应舍利及佛顶骨得以重光。因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完全建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所建长干寺的塔基和地宫上，密封了千年的北宋长干寺地宫被打开。地宫中出土的所有物品均为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所藏。地宫出土的“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

报恩寺碑（原载《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朱偁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报恩寺琉璃塔顶遗物



三藏殿

(原载《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朱偁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石函记”的铭文，详细记载了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金陵长干寺主持可政大师得到宋真宗的支持，修建九层宝塔，藏“感应舍利子10颗，并佛顶真骨”，“内用金棺，周以银槨，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后来的考古发现与此记载完全一致。除了感应舍利和佛顶真骨外，地宫还出土了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12000余件各类供养器物，包括金、银、铜、水晶、玻璃、玛瑙、丝绸等多种质地的物品，成为继上世纪陕西法门寺之后又一重大的佛教宝库，是迄今为止21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2010年6月12日，在海内外108位高僧大德的吟诵声中，“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大典”在南京栖霞寺举行，通过电视镜头，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佛顶骨舍利和十颗感应舍利重光的全过程。至此，十颗感应舍利在南京地下藏了1500年，佛顶骨在南京地下藏了千年，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唯一的佛顶骨。

后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法了解前人、往事，孙权、朱元璋、朱棣、西天善世禅师等前人能知道他们身后在此发生的事情吗？舍利倒是一颗没少。佛教的慈悲与救赎有时“命

悬一线”，但从来也没有断绝过。

后来的晨光机器厂、晨光集团倒不是完全与佛无缘。有众多佛像由其制造：香港天坛大佛（高26.4米）、无锡灵山大佛（高88米）、泰国吻洞大佛、澳门观音像、茅山老子像、山东南山大佛、海南三亚观音像（高108米）、重庆华延津佛、峨眉山十方普贤铜像、苏州重元寺观音像等等，晨光机器厂既是航天军工企业，也是举世闻名的佛像制造企业，制造佛像用的是军工和航空航天技术。佛寺的废墟上建兵工厂，军工企业铸制佛像，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轮回？杀戮解决不了的问题转而向宗教寻求支持？屠杀与慈悲，这又是怎样一对矛盾的概念？

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时光老人嘴角那一抹微笑，神秘而意味深长……

参考文献：

《记忆1865》，曹路宝主编，方志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贾梦玮 男，《钟山》杂志主编。



虽然门楼破败、门窗紧闭，依旧可以想见当年的喧闹热闹，人头攒动。

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有个老旧的“天堂电影院”吧？无论是在面貌一新的故乡小镇，还是在城市已然拆迁改造过的街角，虽然早已不可触及，但那美好难忘的光影记忆一直都在。

所以，如果你在2013年的初夏，沿着南京老城北新燕街高高低低的路面，在若有若无的小雨中，走过一片低矮错落的老旧房子，在它们安静而宿命地等待推土机的表情中，突然间看见了“燕子矶影剧院”的门额，是不是会心弦为之一动，像是见到了睽违已久的老友，不，更像是在梦境中走进了尘封的记忆。

燕子矶影剧院建于1954年，像当时所有的

电影院一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带给人们数不清的美好时光。当年，作为燕子矶地区唯一的娱乐场所，电影院放映时场场爆满，影院有716个座位，遇到一票难求的情况时，走廊加座，能坐二三十个人。最火爆的当属《少林寺》放映时期。影院连续放了三天，有一天连放了7场，放映员都是轮流吃饭，甚至还有人为抢票打上一架。

最后一位留守者王振红见证了这座房子的兴衰。1980年，18岁的王振红成为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的员工，正赶上影院红火的时候。八十年代末，随着录像机、小舞厅、台球的流行，



这扇铁锈斑驳的小窗，曾有多少热切的手递过毛票接过电影票，在影片热映时期，为抢票打上一架也时有发生。



当年的标语依稀可见



松花江牌放映机，是上世纪 60 年代生产的，是南京最古老的放映机了。

(燕子矶办事处文化站供图)



走在胶片间，仿佛走在时光的记忆里。



这里集中了南京三分之二的电影胶片，在往昔岁月里打动你的那束光影，必定蛰伏在其中的某一角落。

电影的观众少了，电影院为了维持生计，也常租给一些过往的小表演团体。“想都没想到败得这么快”，1989年12月燕子矶影剧院歇影，成了南京电影公司的胶片仓库，王振红一人守着2000多部胶片过了23年。这里存放着南京最古老的放映机，全市2/3的电影胶片也集中在这里，每个月给机器上油保养，每天开门通风是他的工作。

要拆迁了，沉寂了许久的老影剧院又引来一些怀旧者的探寻和留连。走在高高低低的胶片架间，看着那些熟悉的电影名称，仿佛走进了电影时光和过往岁月。儿童的打闹嬉戏，年轻人的青涩情事，中年人的饭后消遣，都被时光的魔法尘封在这一个个铁皮盒子里，但在记忆深处，依然闪耀着愉悦和亲切的光亮。

吉强男，《雅集》编辑；

魏方女，《雅集》编辑。



最后的留守者王振红



当年的电影海报栏



王振红收藏的老电影海报，“等我想要收藏时已经有些晚了”，你能记得的有几张？

我这里所说的“秦淮”是一个广义的范围，泛指金陵城南一带的书市。

说到书肆，马上就会联想到状元境，紧邻贡院的状元境，之所以成为明以后各路士子云集之地，正是其繁华的书市吸引着文人骚客。卢冀野先生在《冶城话旧》一书中的《状元境书肆》一文中写道：“状元境相传为秦会（桧）之宅址，故名，近数十年为书买卖麇集之所。”也就是说，从宋到民国，状元境这块读书人的“宝地”之所以书肆昌盛，一方面是它比邻文庙、学宫、贡院、书院，借着各路的文气与书卷气；另一方面是它受着状元府第浓郁的仕途官气的庇荫，尽管秦桧不齿于士子之口，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还是要走的。我没有仔细考察过秦淮书肆和状元境一带书肆书坊的历史渊源，以及两者之间的历史关联，但就小时候（20世纪六十年代初）逛夫子庙时的印象而言，状

境一带的旧书店昌盛景象尚历历在目，而现如今夫子庙一带的旧书肆早已荡然无存了。记得“文革”时期的夫子庙曾被天翻地覆地洗劫过一番，那本属“封资修”重灾区的旧书肆则更是在扫荡之列，那些旧坊书肆刊本中的珍本、善本，乃至孤本早已不知散失于何方了。时过境迁，恐怕城南一带的旧书肆也就仅存杨公井一处胡小石先生所题的“南京古旧书店”了。难怪纪果庵（纪庸）在《白门买书记》中有所慨叹：“金陵非文物之区，自经丧乱，更精华消尽；徒见诗人咏讽六朝，继怀风雅，实则秦淮污浊，清凉废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如果纪果庵先生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洗劫，恐怕还不知如何贬斥金陵书肆文化之弊呢。

旧时的状元境究竟有多少家书店，可能很难考证了，就纪果庵而言：“书肆旧多在状元境，白下琐言云：书坊皆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

秦淮书肆

III 丁帆

夫子庙魁星阁旧影（原载《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朱偁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二十余年来，为浙人开设绸庄，书坊悉变书肆，不过一二存者，可见世之逐末者多矣！益深致慨叹，顾甘君之书距又五十年，状元之境，乃自绸庄沦为三四等旅舍，夜灯初明，鸠槃茶满街罗列，大有海上四马路之观，典籍每与脂粉并陈，岂名士果多风流乎！”如今再读这些文字，绝无隔世之感，纪果庵面对民国时期的书业凋零发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慨叹，虽颇有遗老风韵，却也道出了世风日下的人心。可他也绝不会想到本世纪初的秦淮旧书肆凋敝的风景是如此地“悲壮”。诚然，虽已到了商品时代，世纪初不乏读书人，也不乏高楼矗立的“新华书店”和各类书店。然而，能够去淘旧书的好去处只剩一家“南京古旧书店”，且大多出售现代书籍。昔日的那种依偎在旧书店书架边读书度日的学子早已成杳然黄鹤，今天依着开架书孜孜捧读者已是寥若晨星，读书人都成了走马观花的“匆匆过客”；“青灯黄卷”的读书氛围不再，其行状或恐早已被现代莘莘学子们视为冬烘先生的古典迂腐。显然，历史已经跨进一个新的纪元，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电子时代，一页光盘就可储存无数部巨著。那旧书，尤其是竖排版的线装书早已被作为时代的弃物，它的价值仅仅存在于文物保护的价值上。它可以被拍卖师槌拍到一个天文数字上，但是，有谁在乎它的精神价值，有谁还会在乎一个旧学者甚至在阅读方式上所得到的快感和慰藉呢？如今，电脑已经进入了全球联网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你很有可能从检索系统中调出你所需要的任何典籍，你很有可能在电子出版物上查找到你所寻找的任何资料，可你却很难读到那种阅读方式给你带来的那种氤氲，那份情致，那片清纯和特别的愉悦。

旧金陵的城南一带，从水西门到莫愁路，一直延伸到清凉山，路边有许多旧书摊，旧书摊上的书之杂多是不足为奇的，小时候的文学发蒙多是蹲在书摊前看小人书而缘起的，因而对其颇有着恋之情。如今大街上的旧书摊早已匿迹，亦只有几个大学门前尚有时冒出一两个这样的摊位，所谓“旧书”，亦至多是“文革”时期的“毛选”之类的旧书而已，版本决不会上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我时常感叹时代的飞跃致使这些“古籍”灰飞烟灭得如此之快。如今找出一本20世纪初版本的“旧书”，可能就得算“珍本”了，那么，我时常面对我们院图书馆里的线装本、特藏书库而望书兴叹，只有在此时，我才仿佛进入了一个旧读者的乌托邦。我虽然不能阅读完这汗牛充栋的古籍，亦就是有时偶然查个资料而已，但是即便是呼吸一下那种带有霉味的空气，也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深知这种陈腐迂阔的遗老气息不利于自己的思想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是可以抛弃的观念，可这丑陋的美感却又时时地敲打着我的心扉，使我时刻不得安宁，沉溺于那古典浪漫的夕阳之中而不能自拔。

如今的秦淮河一带，青砖乌瓦马头墙式的仿明清建筑规划可谓殚精竭虑，不能不说是现代建筑业对旧建筑的拯救；就连贡院的恢复，明远楼的修葺也呈现出对文物的精心保护；而耗资若干亿的秦淮河疏浚工程亦似乎颇具决策者的文化眼光，潺潺流动的清澈河水必将诉说金陵千年的历史变故。然而，金陵秦淮书肆却似一江春水永不复还了，尽管取而代之的一两小书店亦作“古旧”状，然而却再也寻觅不到那种逛书肆、淘旧书的古意和乐趣了。呜呼，秦淮书肆唯有入梦来。

丁帆 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名士有部落 风雅世其家

——记常州钱谢两家六代诗书画传家

III 马建强

一、钱谢世代风雅并蒂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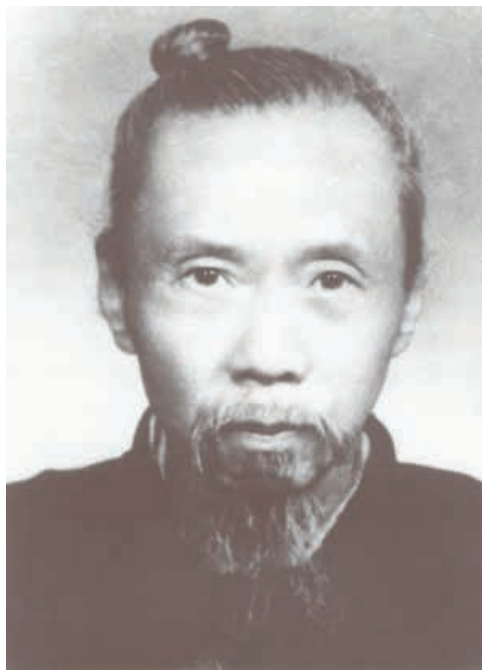
钱、谢均为江南豪门望族，江浙一带的钱姓始祖多为吴越武肃王钱镠。不过我们现在说起钱姓，往往只会提及无锡的钱家，比如无锡城内的钱基博、钱基厚、钱钟书、钱钟韩，无锡荡口七房桥的钱穆、钱伟长、钱临照、钱俊瑞、钱令希、钱易（一门六院士），或者浙江的钱玄同、钱学森、钱三强等，很少有人提及常州钱家。其实常州钱家也是阵容豪华。有数据显示，仅仅常州钱家历代进士便有33人，另有状元一人，秀才举人不计其数。常州钱家一脉数支，本文单说常州菱溪钱名山一支。

古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江南谢氏尽诗豪，东晋多才冠六朝。”“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本文所述常州谢家也是华丽家族世代风流，据考证，远祖为魏晋时期的谢衡，家族名人有谢安、谢玄、谢灵运、谢朓等。民国年间常州谢家中谢玉岑与亲弟谢稚柳、亲妹谢月眉、儿子谢伯子，一家四人都是一时称雄的书画大家，真是满门隼才、世所罕见。

钱谢两家中，钱名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

枢性人物。钱名山（1875—1944），名振铨，字梦鲸，号谪星，后更号名山，别号藏之、庸人、海上羞客，以号“名山”传世。享年70岁，歿后被乡人谥为“贞愬”，被门生谥为“清惠先生”。钱名山世居常州城东门外菱溪塘，书香门第，耕读传家，家训为“读书便佳，为善最乐”。其祖父钱钧（1819—1877），传世有《夷夏用兵鉴古录》、《佳乐堂遗稿》等。父亲钱鹤岑（1849—1906），举人功名，传世有《九峰阁诗集》等。钱名山姐姐钱梦龟（1872—1930），传世有《云在轩诗集》等。妹妹钱梦蛟（1888—1977，蛟一作蛟，本文取蛟），传世有《北窗吟草》、《北窗医案》等。弟弟钱梦鲲、钱梦鲤也均为名诗人、名画家，尤以钱梦鲤所画墨龙名噪一时。钱名山写诗称赞为“吾家幼弟才绝奇，遗墨一纸云淋漓……雷电之朝风雨夕，亦恐破壁随君飞。生气所发不可遏，传之千古当如斯”。谢仁湛（谢玉岑、谢稚柳之父）也有诗赞：“麟角峥嵘笔墨奇，平生手迹最堪思。留将一卷烟云在，传到乾坤混沌时。”

钱名山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志存高远，聪慧异常。16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9岁中进士（1903年）。钱鹤岑临终前遗言钱名山曰：



钱名山 (1875—1944)

“尔性高疏，当著书名山以老，经世，俗事也，非尔任。”故钱名山高中进士后，虽曾任晚清刑部主事，但为人正直性情刚烈，目睹晚清朝政腐败，预知其气数已尽，遂毅然弃官归里，从此读书、教书、著书、刻书一生，讲学于寄园书院近二十年，弟子过千，名人辈出，桃李天下，常州学风为之复振，一时称盛。诗词书画文方面著述甚丰，诗有《谪星诗集》、《名山诗集》，词有《谪星词》、《名山词》、《海上词》，文有《名山集》及《名山续集》、《名山三集》、《名山文约》等。书画方面成就更大，康有为称其书法为“除我之外，当世无与此公匹敌者”。晚年钱名山以书法之法从事画画，所画墨竹“天机随处发，无复四旁上下”，可谓“名山心画”。相比在诗书文章方面的成就，钱名山的仁爱道德更是江南无双。他一生仁心慈善悯爱，济贫救困救世，世称“江南三大儒（另两位为高吹万、胡石予）”、“常州一圣人”。钱名山不仅成为常州钱家的中兴式人物，也是常州文运昌盛的标志性人物，

常州文教发达的代表性人物。

常州自古鱼米之乡，从来富庶之地。世家大族久居于此，诗书传家，风雅祖述。他们在历史传承中，彼此门当户对家族联姻，使得家族实力更加强大。常州钱家到了钱鹤岑这一辈，也就是钱名山父亲这一辈，钱鹤岑的妹妹钱蕙荪（字畹香），嫁给了常州谢祖芳（字养田），以此为起点，钱谢两家变一家，可谓强强结合优势放大，成为常州文运的重要支柱。谢祖芳，举人功名，传世有《寄云阁诗钞》四卷。夫人钱蕙荪，传世有《双存书屋诗草》。而谢祖芳父亲谢玉阶，传世有《吉羊止止室剩稿》等，祖父谢春堂，经商出身，祖居常州城内天皇堂弄，家境丰厚。谢祖芳有一兄，名为谢云披，谢云披育有一子名谢仁冰。谢仁冰亦儒亦商亦官，曾任职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南京政府关务局、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其子谢启泰（1905—1972，后改名为章汉夫）、谢启美（1923—）均为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外交家，章汉夫建国后曾长期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谢启美改革开放后曾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85—1991）。

谢祖芳钱蕙荪生有两子，一为谢仁卿，一为谢仁湛，均为秀才功名，传世分别有《青山草堂诗钞词钞》、《瓶轩诗钞词钞》。谢仁湛娶妻宜兴望族傅用宾之女傅湘纫，生有子谢玉岑、谢稚柳，女谢汝眉、谢亦眉、谢月眉、谢介眉。谢玉岑（1899—1935），其人诗、词、书、画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被誉为“江南词人”，其时名流大家如张大千、夏承焘、黄宾虹、朱彊邨、高吹万、徐悲鸿等都极为推崇谢玉岑的惊世才华，可惜天妒其才英年早逝，享年仅36岁。其弟谢稚柳（1910—1998），为诗、书、画、书画鉴定、考证、研究方面均有建树的一代宗师，曾出任

中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被誉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第一人”。其妹谢月眉，工笔花鸟画家，张大千誉之为“月眉画仿南田，盖毗陵正宗也”。《中国美术年鉴》称其“所作花鸟，上追宋元，下匹南楼老人，秀逸清雅，兼而有之”。谢月眉与陈小翠、冯文凤、顾飞合称为“民国海上四大女画家”。而谢玉岑其子谢伯子，自幼失聪，但其自强不息志直如矢、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继承家学，赓续风雅，亦成书画大家。当年《中国美术年鉴》称誉年仅25岁的谢伯子为“生有异秉，虽病暗而胸次寥廓，挥毫落纸，有解衣槃礴之概。家学渊源，得力于石涛甚深。写山水气魄雄伟，作人物则神韵隽逸。”《中国美术年鉴》出版于1948年，是民国期间唯一一部美术专业年鉴，由当年国内一批著名书画家历时两年组织编写出版，说是年鉴，其实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美术发展的集大观者。而谢家从谢玉岑到谢月眉、谢稚柳、再到谢伯子，一家四人均被收入其中，并被称为“一门隽才，蜚声艺苑”，“造诣虽不同，然一门风雅，各有其独立性”，这不能不说堪为奇迹。

二、钱名山提携谢家继其家学振其家声

前文提到名门之间相互通婚以壮家门第提振家声，戊戌进士费铁臣也是常州世家，费家与钱家便通婚联姻，其女费沂（1877-1927）嫁给了癸卯进士钱名山。钱名山费沂共生育6个子女，分别为钱素蕖（1900-1932）、钱云蕖（1903-1970）、钱小山（1906-1991）、钱仲易（1909-2005）、钱叔平（1911-1960）、钱逢吉（1912-2007）、钱悦诗（1916生，现健在）。1909年钱名山辞官归乡后，在故家寄园创办学



民国四大女画家

左起：常州谢月眉、广东冯文凤、上海顾飞、杭州陈小翠



20世纪三十年代，谢伯子（左一）和钱谢两家小字辈在常州“寄园”合影

院，收徒课学。学生中既有自家子弟，更多常州其他世家子弟，均为一时俊彦。其中谢玉岑既为钱名山弟子，也是钱名山的晚辈姻亲，谢玉岑的祖母便是钱名山的姑妈。谢玉岑命运多舛，7岁时祖父去世。12岁时伯父（也是嗣父）、父亲百日之内相继去世，同年谢玉岑祖母的长兄，也即钱名山的父亲钱鹤岑去世。14岁时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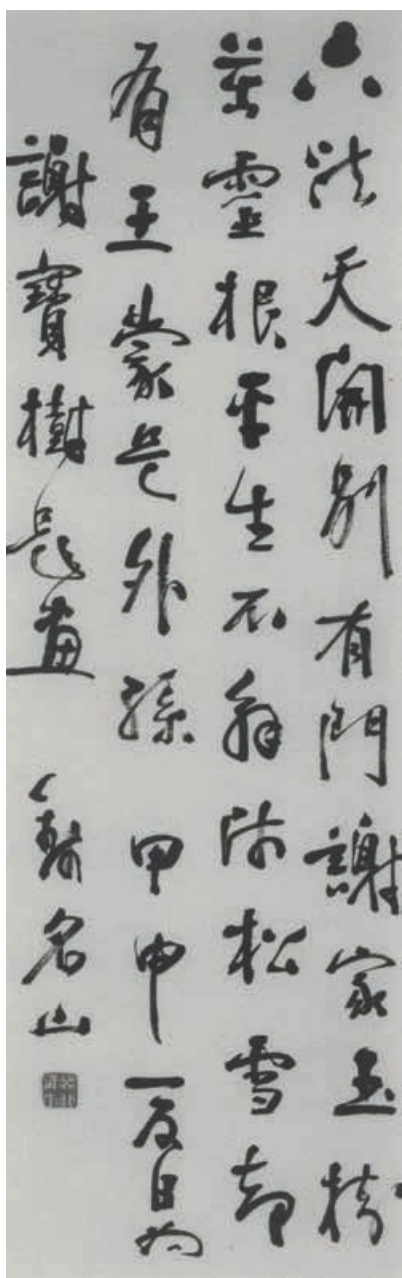


钱名山画作

玉岑所居住天皇堂弄深宅大院因一场大火而焚烧殆尽，累世家藏书籍、金石、文房、字画荡然无存。谢家经此历年家变，家道中落，家境大坏，不要说家学传承，就是日常生活都岌岌可危。钱名山古道心肠，铁肩道义，发誓要振兴谢家。其时谢家6个子女，最大谢玉岑也不过14岁，而最小谢稚柳才2岁。钱名山认为谢玉岑作为谢家长子，是全家的支柱，所以一定要他把书读好。钱名山在寄园对谢玉岑给予了特别多的教导与关爱，谢玉岑也表现出惊人的禀赋与超人的勤奋。谢玉岑16岁那年，钱名山不顾当地一位和尚关于谢玉岑命恶的说法，将自己的长女钱素蕖许配给他（其长女温柔敦厚、才貌双全，她敬佩谢玉岑才华，曾表示非谢不嫁，故钱名山绝无包办婚姻之嫌）。20岁时谢玉岑与钱素蕖正式成婚，谢家没有住房，钱名山便让他们一直住在自己家里，谢玉岑五个子女也都出生在钱家。

此外钱名山还先后让自己的侄儿钱炜卿（弟弟钱梦鲲之子）娶了谢家长女谢汝眉，自己的长子钱小山娶了谢家最小的女儿谢介眉。如果放在现在，我们可能会说这是近亲结婚不文明不科学。但在当年，这种大家族之间相互联姻很是正常，钱名山是用这种方式使得钱谢两家亲上加亲、亲如一家，以此来全面提振谢家。谢家六个子女，承蒙钱名山的恩惠，在民国初年兵荒马乱之中仍得以炊烟不断、书声不绝，乃至生活体面、衣食无忧，并相继成家立业、成名成家。

当然，钱名山对谢家的恩泽远不止于此。1932年长女钱素蕖因为难产得病不幸去世，年仅32岁。谢玉岑与钱素蕖恩爱无比，谢玉岑不顾体弱家困，发誓“报吾师（即钱名山）惟有读书，报吾妻惟有不娶”，改号“孤鸾”，独自勉力抚



钱名山为外孙谢伯子（宝树）题



钱伯子《荷》1992年

养5个稚子弱女。1935年谢玉岑终因多年肺病积劳成疾，加之思妻悼亡情深不能自拔而英年早逝。这时5个子女最大也就15岁，最小仅仅4岁。此时作为外公的钱名山毅然承担起全力抚养谢家后人的重担。

谢伯子先天失聪。钱名山在谢伯子因为聋哑而普通小学断不接受的情况下，决然在家长年坚持亲自教导他认字、识词、画画、写字。

后来谢伯子渐次长大，钱名山始终厚望有加并尽力提携。现存钱名山给谢伯子的题画诗便有近10首之多：“外孙年十九，下笔工山水……老夫每观一副画，为汝爷娘三日喜”；“平生不解师松雪，却有王蒙是外孙”；“生才不穷有如此，我幸天公长不死”……舐犊情深，溢于言表。谢伯子先生今年已经91岁高龄，他“心雄万夫，手写千秋”，不仅国画成就很高，而且还

在耳不能听、口不能言的情况下，精通音律词韵能够写诗作词。当年钱名山是如何教会一个聋哑孩子学字学诗学画学音韵的，现在还是一个谜。所以谢伯子自己说：他“永怀钱老（指钱名山），不忘张髯（指张大千，谢伯子为张大千入室弟子）”。

钱名山在寄园的著名弟子中，计有程沧波、王春渠、蒋石渠、郑曼青、谢稚柳、马万里、唐玉虬、邓春澍、陆仲卿、朱凤池、虞逸夫等。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弟子，他们都很好地继承了钱名山的道德文章、诗书才华。钱名山爱生如子视为己出，故乐得作伐，尽结姻缘，弟子成子弟：程沧波娶了钱名山二女钱云蕖，王春渠娶了钱名山侄女钱珍卿，唐玉虬娶了钱名山侄女钱珊若，朱凤池姐姐朱慧珍嫁给了钱名山二子钱仲易。而程沧波的父亲是程景波，举人出身，程沧波后任《中央日报》首任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王春渠，著名书画鉴赏家，所编《近代名人书林》（1932年出版）是开辟草莱之作。唐玉虬（1894-1988）是唐荆川十四世孙，医学家，诗人，曾任南京中医药学院（即今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其子唐蜀华（1941-），我国著名中医学家，江苏省名中医，教授，博导，曾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

民国时期钱谢两家满门精英，钱名山居功至伟。可以说，没有钱名山，就没有谢家后人的辉煌。同样没有钱名山，寄园子弟也不可能个个成才人人优秀。

三、钱谢世家特征：家学诗书画，家风狂狷仁

常州钱谢的家学是诗、书、画俱佳，家风是狂、狷、仁皆备。下面我们以钱名山为例，

试析钱谢两家世家特征与风格。

钱名山一生以诗人自许。通悉钱名山生平，便可获知他仿佛就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据《钱名山研究资料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介绍，钱名山生有异秉，“目光炯炯，幼时即异常儿，好食橄榄。或曰：‘橄榄不甜，胡食之？’答曰：‘稍迟则甜矣。’”“性顽躁，然其祖父抱之观书绝不动，甚爱之。”“读书颖悟过人，五岁开蒙，一日读四十字，六七岁时已能属对。”“一日，塾中夜坐，忽然手足腾踔，击四壁如雷。塾师怪之。盖先生年虽幼，目睹当时之世道人心，有无限感慨，胸中猝然有所发而为此，不自知也。”钱名山应该算是成名很早，16岁秀才，19岁举人，29岁进士，这在封建科举时代，可谓一个读书人的康庄大道。但他“了无仕宦意”，在刑部几次上书言事留中不用（意见不被采纳）后，“一日忽有所感，觉官不可为，遂拂衣归里，并赋诗曰：可怜一梦十年迟，何处晓风残月酒醒时！”钱名山早年这些言行，可见钱名山确是一个年少气盛、感情炽热的人，甚至是一个狂放倔强、自负固执的人。

钱名山一生对人对事都很谦抑，唯独对诗很自负，他说自己“学诗最早，诗视他文字独可信，然则传我者必在诗矣”。于是钱名山写诗道：“村边纵酒陶元亮，泽畔行吟屈大夫。不要温公入《通鉴》，自家留得几行书。”现存钱名山一生诗作1600多首、词作90多首，诗心诗情伴随他一生：“平生情形原天赋，最喜是古风近体……死后精灵应不化，绕天涯，听唱新诗句，即是我，心开处。”临终前他留诗说：“我以诗事天，不得无诗死。气急言语尽，尚有心在此。”

尽管钱名山是科举正途出身，但他写诗、作文、写字、画画，从不主张何派何别，只强调崇尚性灵。他最反对和韵作诗，他说：“直须



作者（左一）采访谢伯子先生（右一）

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岂有金石音，沿街相唱随！所以《名山集》，从来不和诗。”他主张“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要多写，多写则熟练，而诗要少作，因为诗是天地间的精华，此唱彼和，必无好诗。他自言“鄙人文字既无宗派，又复空疏，不足与百年学者比；窃取之义，惟有‘不平’二字耳。”“我之为学，欲为天下周贫苦，救饥溺，使天下无失所之家，我行我心之所安。”

钱名山诗文如此，书法更是风格独特个性卓绝。他一介书生，不治家产，不求权贵，身无长物，但心忧苍生，何以救民？惟有卖字。他刻了一方图章，上写“癸卯进士”，专门用于卖字，因为他知道有钱人附庸风雅，买字也就是贪图他的名望功名而已。当年常州、武进、无锡、溧阳、金坛一带，以致苏北地区，何时旱灾水涝，何处缺衣少食，何人生老病死，何地天灾人祸，钱名山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有求必应，不求也应，以致受他救助惠泽的四方百姓家家供奉“常州钱先生”牌位，既为自己祈求平安，也为钱名山祈福祈寿。钱名山已经去世70多年，但在当年他救助过的这些地区，他的英名仍世代相传、不绝于耳。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评价钱名山的字

为“笔致遒润浑涵，力量藏而不露，运笔收放有则，结字则纯粹竣密，顺势随手而成……若非书艺修养炉火纯青者，难以达到如此境地。”于右任对钱名山女婿程沧波说：“名山先生书法比我好。”徐悲鸿收藏钱名山书法“但求精品，不嫌其多”，张大千、朱屺瞻、黄宾虹等均言书画受名山先生影响甚大。钱名山寄园弟子虞逸夫说，钱名山字如其人，“有着动人的书卷气，有着诗人的激奋之情”。他“作书重气势，富笔力，于沉着痛快之中，时见韵致。用笔似铁画银钩，有千钧之力，顿挫分明，奋捷快进”。钱名山称自己书法是“快枪击玻璃，洞穿而玻璃不破”。钱名山与长子钱小山、长孙钱璩之三代均以书法名世，他们一脉相承，时人称他们的笔法为“钱字法”：执笔掌腕着纸，不悬不驻，腕随笔驶，书写时击桌蹲足，使其全身之力贯注于毫端，自谓“钱家法”。

家学与师承是中国文化赖以传承的重要途径。常州钱谢两家自钱名山而下，几乎所有子弟都把家学和师承融合于钱名山课徒的寄园之上，尽管他们身处晚清、民国之乱世，历经易代之变、国难之苦、抗战之乱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变故，但他们总体上能够家风不坠、家声不绝、弦歌不辍、家范常在，并保持着极高的成材率，几乎无一人泯然众人矣。他们在职业取向上大都选择文化艺术教育书画，济世智民；在个人成就方面，大都诗、书、画俱佳；在为人处世方面，大都也是外在“慎独低调、优雅、济世”，内在“倔强如初、沉吟至今”，可谓“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仁者博爱众生”。

马建强 男，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编审，教授。

回望西溪

III 戎东贵

中国人从来都是讲究根基的，一个地方、一个人，要大家伙儿认可你，推重你，撇开什么都不谈，先要问你是个什么根基。这根基说实实得很，譬如这方土地曾经出过什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等；说虚就有点镜花水月，似有若无，诸如传说、民谣等等，虽时隔久远却仍口口相传，这就让人不得不信其有了。虚虚实实之间，一个地方的所谓根基也就变得尤其重要了。

在盐城境内，西溪这个地方无疑是很有些根基的，这从现今的东台人谈到西溪时的那一份肃然和自豪就可以感觉到。然而当我们走近西溪，却又几乎无迹可寻，除了那座修葺一新的护国禅寺，尚存留着一些古老的宁静和肃穆外，四周只有竹篱掩映、田畴旷野、鸡鸣犬吠、炊烟袅袅，不过是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上随处可见的农家村落而已。西溪昔日的辉煌究竟在哪里呢？西溪遥远深厚的文化根基又该向何处寻觅呢？

也许随意走近西溪的农家，听那些饱经世

事沧桑的老人饮酒闲聊，我们就可以领略到这块土地神奇的魅力。知道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吗？黄梅戏《天仙配》大概可以说得上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悠扬曲调早已唱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那大名鼎鼎的董永就是我们西溪人。按照老人们的指点，我们在西溪的附近四下寻觅，那些再平常不过的凡尘风物，转瞬间居然仙风流转，七仙女与她的姐妹们曾经洗过澡的凤凰池、七仙女和董永仙凡相会的老槐树、七仙女用金钗点化出来的缫丝井等等，无不让人联想翩翩；在十八里河口，西溪人祭祀卖身葬父的千古孝子董永的“董贤祠”至今犹在，这大概是董永故事源于西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了。不过，熟悉中国古代神话的人都知道，董永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那上边说董永是“千乘人”，千乘是古齐地，属于今天的山东。董永是怎样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落户西溪的，关于董永的神话传说又是怎样从山东传到西溪来的，这之中自然有一定的缘由。揣摩这缘由属于学

者们的事，我们可以不必探究，但这古老的神话传说无疑激活了这块土地，使这块土地至今仍然弥散着悠远的文化气息。

翻开《两淮盐法志》和《东台县志》，从确凿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不难想见西溪古镇曾经有过的繁华。苏北沿海市镇的发展，一般与盐业的兴衰和朝廷盐务场署的废置相关。西溪盐业始于汉末，历经灾荒战乱而生生不息，至北宋时达于极盛，朝廷为方便管理，在泰州盐仓监下增设西溪盐官，下辖何垛、丁溪、草埕、白驹、刘庄五场。在朝廷先后派往西溪的盐官行列中，居然就有晏殊、吕夷简、范仲淹这样三位有宋一代难出其右的名臣干吏。西溪固然微不足道，但得益于他们光辉的照耀，在盐城乃至苏北的历史上也就变得不同凡响了。这三位后来官场腾达，先后都曾位居宰相之尊，而他们的学识才具，在屈就西溪盐官之时，却早就有了初步的显露。

晏殊才华横溢、文辞婉丽，在西溪署理盐务之余兴建了晏溪书院，于此读书研磨、赋诗

填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晏殊写于此时的名句，宋词婉约之风后来以晏殊、晏几道父子为滥觞，想来最初便萌发于晏溪书院“小园香径”之上的徘徊吟哦吧？

吕夷简在西溪任上，曾借吟咏牡丹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官场感慨：“异香浓艳压群葩，何事栽培近海涯，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王侯家？”此公乃一小小盐官便自负如斯，身居要位后与欧阳修等人论辩时那样强硬固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范仲淹大器晚成，任西溪盐官时已三十三岁，有人以官小职微力劝他不要赴任，他没有理会，到西溪后写了《至西溪感赋》一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以荒海一隅、区区小官而遥望朝廷，不因眼前境遇而自暴自弃，范仲淹有这样一等胸襟、眼光和志向，难怪此后能够成就千秋伟业，作为封建官场的道德楷模而风范长存。三位盐官当年在西溪虽然官小职微，但流传至今的逸事趣闻中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品位，这大概才是西溪古老的文化根基之所在吧？



不过曾几何时，西溪这个历史上“人烟稠密，商贾辐辏”的繁华市镇，却渐渐消失在岁月的烟尘之中了。追溯其中的原因，主要与那个小小的盐官范仲淹在西溪任上的所作所为有关。本来，在海边一隅当个盐官还是比较轻松的差事，公务之余，范仲淹完全可以像他的前任那样吟吟诗词、种种牡丹。但范仲淹却是个闲不住的人，盐务办好了，还要察看察看盐民的生活，了解了解地方上需要治理的事情。这样一来，范仲淹在西溪盐官的闲任上坐不住了，一件直接影响盐民安居乐业的大事被他看在眼里，一桩关系到苏北沿海长期发展的大工程落到了他的身上。据《宋史·河渠志》记载：

通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使李承实所建，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其功甚大，历时既久，颓圯不存。至本朝，天圣改元，范仲淹为泰州西溪盐官日，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有请于朝，调四万余夫，修筑三旬，毕工，遂使海濒沮洳，泻卤之地化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赖之。

一道巍峨的挡潮大堤，就是这样得以在苏北沿海矗立了起来。此后的苏北盐民得益于这道海堤的护庇，很少受到狂浪暴潮的侵害了。人们安居乐业之余，自然会深深地怀念那位为民谋利、率众筑堤的西溪盐官，便把这道海堤取名为“范公堤”；从东台到阜宁，一座座范公祠香火繁盛，代代不绝，寄托着盐城人民对范仲淹这位好官无尽的怀念；即使战乱频仍中这些祠堂纷纷倒塌了，但范仲淹造福苏北人民的

光辉业绩是永存的，范公堤成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风范的历史见证，成了苏北民众心目中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然而西溪呢，范仲淹在那儿操办盐务、谋划筑堤的西溪古镇又怎么样了呢？随着范公堤的出现，皇家传檄的快马在大堤上日夜奔腾，车马喧嚣、人流不息的通衢大道开始绵延南北；因为交通的便利，繁华的西溪也就逐渐东移，人们倚堤而居，南来北往，新的市镇应运而生并日益发达；这就有了东台的日益繁盛和西溪的日益凋敝，大概是在乾隆中期吧，东台因“地广人稠，为州（泰州）东第一大镇”而被析地置县，从此便成了范公堤下的俨然一方土地，而那古老的西溪，则为交通闭塞所限制，为连年战乱所破坏，为邻近的东台新生的繁华所遮掩，便渐渐地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回望西溪，岁月无情，虽然我们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一点点旧时的繁华景象了，但却不敢漠视这小小村落的存在，因为这僻野的村落连接着大名鼎鼎的范公堤，连接着苏北人民千百年来生命线。“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在盐城人民的心目中，范公堤是永存的，那么，西溪也是永存的。

戎东贵 男，文学评论家，曾任盐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新华日报报业集团。

小时候的池塘

III 张尔客



(冯郁 绘)

之一

想想小时候，在我们的方言里实在没有“池塘”这样文雅的说法，那些同样的低凹之所居然叫做“坑”！没有水的地方这样称谓倒也无所谓，有水的地方也是如此叫法，足可见我等乡人实在没有多少诗意。所以在读朱自清老先生的《荷塘月色》的时候，课堂上老师对我们讲：荷塘就是长着荷叶的池塘，池塘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坑。其实在校园之前后，就有这样的所在。前方的那片最大的水坑，因为近旁有一片杨树林，大家就叫做“杨树坑”，而学校的后面那片池塘，却从来没有名字，或者它的名字就叫“学校后面的那个坑”。杨树坑当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玩耍的地方，夏天里一群同学光着屁股去洗澡（我们可从来不叫什么游泳），就淹死了一

个同伴。他在潜泳时钻进了荷花深处，被荷藤热情地扯住了，好一阵忙乱之后，才将他从荷叶下面捞了出来。然后他爹牵着一头老牛朝前走，他就趴在牛背上，像个调皮的牧童，只是没有醒转过来。学校后面的那个坑，因为生产队里养鱼，便有专人看管着不让人下水，这就使大家有了去偷偷钓鱼的乐趣。那时候当然没有城里随处可见的标准钓具，一群孩子便在大人的指导下自己制造，其制作流程是这样的：从母亲的针线筐里偷一根缝被子的粗针，在煤油灯上烤热了，用布包着捏弯成半圆状，再将缝被子剩余的线穿到针孔里打个结，寻一根撑蚊帐的竹竿拴上去，然后抓住一只大公鸡，从它身上拔几管羽毛，用剪刀剪成几段，做成浮子，一切便告成功。指导老师是一个叫做成蛮子的上海老知青。后来他女人带着两个女儿来

探亲，我们就觉得南方的女人就是好看，水灵灵的，走路还摇着屁股。他还是我们下象棋的启蒙教练，几个孩子在蚊虫乱舞的灯光下对弈，谁输了自己打自己的脸，有时候大家都肿着脸去上学，一派无怨无悔嬉皮笑脸的样子。再以后突然找不到他了，大人们说他的小女儿在家乡淹死了，他匆匆回去后就没有回来。最喜欢我们的和我们最喜欢的蛮子叔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失望之余会想，南方的坑也会淹死人呀！再想起他的小女儿与在杨树坑淹死的伙伴刚见了面就亲近得很，又有些惊奇和怵惴。

我家老屋不远的地方也有两个“坑”。一个坑因为鸭子们成天结队于此游耍下蛋，所以叫“鸭蛋坑”，好像里面满满地堆满了鸭蛋似的。记得有一次我到公共老虎灶为家里打开水，两只手各拎一个空水瓶，走在坑边便听到一只鸭子兴高采烈的叫声，本来它有种奔走相告的匆忙，见到我，就放慢了脚步悠悠地踱过来。猜想它是想引领我到它下蛋的地方，果然如此，我跟着它在水与岸相接的一个洞穴里找到了那只热乎乎的鸭蛋，手捧着朝岸上走。那鸭子并不要什么酬劳的，它潇洒地离开了。走到放置热水瓶的地方，我看到一只瓶倒了，而且碎了，镀银的玻璃像散落于地的星星。另一只瓶则像一个沉默无语的人，站立着，摇摆不已。这时候我才知道风是很大了，坑里的水皱着眉头和脸颊，一副行将颠覆的末代王朝的无奈。我在兴奋与沮丧之间首先思考一只鸭蛋与一个水瓶的比价关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于经济学的关注。更为不幸的是，等我赶到老虎灶的时候又发现用于兑付开水的竹筹丢失了。一个人有了贪心，着意于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其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哭丧着脸回到家，被母亲教训了一通，那只鸭蛋竟然被她老人家夺去摔碎

了。另一个坑是我最初学习游泳的地方，现在我膝盖上的一个伤疤就是它的赏赐。这伤疤内容丰富，有黑的炉渣、黄的泥土和斑斓的童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已经渐渐淡化成了漂不动的一团青烟，像变幻莫测的命运。其实事情很简单，父亲为了促使孩子们学习游泳，就将我们像赶鸭子一样地赶到水里去，对于像我这种见了水就眩晕的人，他就顺手抱着朝水坑里一丢，然后看着我在其中喝水，呼喊，求救，一概不理。如果我好不容易爬到了岸边，他又会一脚把我踢回到水里。哎，我只好重新在水里求生，我想将胳膊作为翅膀飞到天上去，不然的话就像鱼儿那样成为划水的鳍，都不能够，我就朝铺满炉渣的对岸跑，手脚并用，连滚带爬。父亲高声叫骂着奔过来了，我一下子滑倒在地，然后哭叫着母亲朝家里跑。母亲从屋子里急急出来，看着父亲紧迫着我的动态场景，高声笑了起来，而我在母亲的笑声中再次倒下，伤口于是又渗入了泥土。到了家，父亲和母亲一起训斥我是个胆小鬼，我低头称是，不敢回嘴，更不敢讲受伤的膝盖，于是这伤口因为干燥泥土的呵护恢复得很快，结了疤，复合起来，其中便有了复杂的色彩——就这样我学会了游泳。后来我一个人在城市跌宕的生活历程也是如此复杂而简单。

之二

其实最让人感觉到池塘或者坑的魅力的季节是冬天。其时，大凡与外界相连的河都干涸了，而那些散布于村落之中的坑，还存续着水，虽然浅了些，瘦了些，仿佛自家屋后的菜圃，随时可以去探顾一番。如果说那些河流是奔驰的骏马，一到冬季，就不见了踪影，那么这些池

塘则是拴在院子里的驴子。结冰之后的池塘成了喧嚣的体育场，孩子们于其上奔跑，一收足，就打着哧溜朝前方冲去，有种驭风而行的快感。当然还有让人担心却又必然发生的结果：一是跌倒在冰面上，丢失一两只牙齿；二是不足以承受重量的冰面突然坍塌，人就掉进了冰冷的水里。无论那种结局，只是当事人承受，大家却如同看一出喜剧。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在袖着手跺着脚晒太阳的时候，沿着学校后面的那个坑一路奔走，脚后面的冰紧随着碎裂，一时间弄得地动天摇。在大家的欢呼中他终是安然无恙地到了对岸，于是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想想当下网络上的诸多名人，往往也都是用了类若这种吸引人眼球的办法。冬天的时节，也是收获莲藕和鱼的时候。大人们将坑里的水用泵抽走，然后穿着胶鞋踏着泥泞去捉鱼，装在筐子里，扛着大秤称着重量卖给贩子们，留下一些小的或者死了的鱼分配给每个家庭。之后，用铁钯将藕挖出来，也是将完整的拿去换钱，断了的或者小些的进行分配。每个家庭都因此有了喜洋洋的气氛，这是春节的前奏，甚至比春节更迷人，老人、孩子和狗是最兴奋的群体。再以后，我们还会到这坑底里去，看着那些再次结了冰的水汪，以及断了身肢的藕藤，畅想一番它在水中丰腴的往昔。这时的池塘就像生育了儿女的产妇，一副破败庭院的落寞模样，却有种牺牲和贡献者的高贵神情。至今我却想不起来，那些莲花或者莲蓬在记忆中的位置。长大了知道，天下最美的女人是那些摇着小船采莲的姑娘，而我的故乡却是很少见到过船，更未曾见过戴着斗笠立于船艄将纤纤细手伸向莲花的女人。大人们认为水上的莲蓬与水下的莲藕一气相连，摘掉了莲蓬，也就弄断了莲藕的命脉，它就会在地里萎缩，慢慢地在淤

泥里烂掉了。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在池塘的边上偷偷采摘些莲蓬，品尝一下它的滋味：苦涩之后有种淡淡而清雅的甜蜜。那莲花却毫无用途，任由它盛开败落，并无人懂得留连欣赏，如同听说邻村有一曼妙的女子，却并不专程探访一样。后来读了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知道它原是花之君子，“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它本就是孤芳自赏的精灵。那时节我们对于鱼肉之类的欲望，远远大于对花花草草的关注。

这坑当然也是夏天乘凉最好的去处。坑边多栽有垂柳和老槐，正午时分便有不少人趺拉着拖鞋拎着席子到树下的阴影里，互相招招手，就放倒了身躯，看一会重叠的树枝间的天空，用晒得黝黑的胳膊捂着眼睡觉，将坑里的水当作熟悉的邻居，并没有多少关切。晚间的池塘更像轻风和凉意的发源地，村人们除了安排一人在家里看守，扶老携幼而来，几乎每一片席子所铺陈的地面，都是一个小小的部落。也有喜欢热闹的人窜来逛去，插科打诨，一阵阵嘻闹过后就是寂然的安适，除了一系列大自然真实或者神秘的声响，人类已经被黑夜淹没了。

张尔客 男，原名张剑，作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总裁。

河阳山歌： 农耕社会的主题咏唱

III 曹乾石



河阳山歌中的劳动歌是广泛流传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河阳地区农人当中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现象，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它主要集中在河阳山周边地区的乡村民间。这些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就是先民的聚居地，在 6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在劳动中追随节奏感欢乐高唱，释放心中的喜怒哀乐，喷发体内的七情六欲，吟唱身边的一景一物，讴歌周围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在劳动中创作，在劳动中歌唱，生动逼真，通俗易懂。他们的歌声飞越了时代岁月的沧桑，一代又一代传承，从早年最古老的《斫竹歌》，到近代的新山歌，在日积月累中汇成了河阳山歌的海洋，见证了从乡村小调到励志民歌的一种升华。人们在劳动的山歌声中体验到抑扬顿挫的韵味和甜美如诗的境界。

劳动歌起源于乡土，产生于农耕社会，演唱者和歌词内容都吐露着泥土的芳香，从《蒔秧歌》、《摇船歌》、《车水歌》、《垒田歌》、《捉鱼歌》、《排碌歌》到《摇纱经》、《耖稻歌》、《打米》等歌谣，唱词均是农民在劳动中即兴抒怀，随

感而发，都有着浓郁的乡土特色。它最早流传的一首歌，是在劳动中与劳动号子相结合的《斫竹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嗯唷斫竹，嗨哟嗨！

嗯唷削竹，嗨哟嗨！

嗯唷弹石，飞土，嗨哟嗨！

嗯唷逐肉，嗨哟嗨！

这首歌是完全用吴方言演唱的，每一节都体现出很强烈的劳动节奏感，歌词豪犷奔放，落地有声。这首山歌就是古代夷族中一支名叫干族的部落的原创山歌，直至 20 世纪末期，它还存在于河阳山地区，传唱于搬移重物，挑抬农具的劳动人民中。而且有劳动号子的衬词，有简洁明快的音乐节奏，能唱又能演绎劳动场景。这首《斫竹歌》与传世的古歌谣《弹歌》极其相似，是先民们原始狩猎及群体劳动中的歌唱，由于它与劳动密切结合在一起，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在河阳山地区，民间流传的劳动歌有上百首之多，其中收录进《河阳山歌》集中的就有 70 多首。“千条塘泾百条河，山歌不断河阳路。”无论是春夏秋冬，村间地头，哪

里有人劳动，哪里就能听到“嗯唷，嗨哟嗨！”的劳动山歌声。

劳动歌在《河阳山歌》中占据重要部分，它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农耕社会的方方面面。综观劳动歌的唱词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描述劳动场景，反映农民辛勤耕作的画面

在刀耕火种的农耕年代，江南农民的体力劳动是十分繁重的，春播夏收，秋种冬管，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到晚从鸟叫做到鬼叫，没有一刻闲工夫，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农民用歌声来调剂精神，减轻劳累。像《蒣秧歌》中唱的：“蒣秧要唱蒣秧歌，两腿弯弯泥里拖。背朝日头面朝水。手捏鲜草蒣六颗。日落西山黄里黄，蒣秧唱歌赶几行。一行到头唱一曲，腰酸背痛忘记光。”《种田辛苦米饭香》中唱的：“大暑里耖稻热难当，乌黑胧胧出工忙。汗滴耖杆衣擦干，种田辛苦米饭香。”这些山歌，一方面描述了田间劳动的场景，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劳动辛苦，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一边从事劳作，一边唱出辛勤耕作的歌调，使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山歌轻快节律的伴奏下，变得轻松愉快，使人忘记劳累。

二是吐露对爱情的渴望，憧憬美好的生活

劳动歌中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在繁重的劳动中，渴望爱情，追求美好幸福的新生活，用爱情的表白来振奋精神，唱出藏在内心深处的心声，提高活力，消除劳动中的寂寞和疲劳感。摇船，是江南水乡的一件辛苦活，社会上曾流传：

“世间三样苦，摇船打铁磨豆腐。”水乡的青壮年摇船跑运输是常事，有时装运货物从甲码头摇到乙码头，要摇几天几夜。为了消除摇船的疲劳，减轻路途中的寂寞和劳累，人们一边摇船，一边唱起自编的《摇船歌》：“摇一橹来吊一绷，隔河两岸稻花香。好花落在船舱里，野蔷薇花落后船棚。摇一橹来吊一绷，水栈汰衣个好细娘。唱只山歌回对只吾，有缘有意娶回乡。”这是摇船郎内心深处的独白，这是对美好新生活的呐喊，一句句多情的歌词，一声声求爱的呼唤，从摇船郎胸中喷吐而出，使摇船的年轻汉子沉浸在将来美满婚姻的幻想中，忘却了摇船的劳累和行船的寂寞，浑身增添了无限力量，越摇越有劲，歌声伴着行船飞。

三是记述农事播种，反映农村四季农事

在远古年代，农民以种田为生，什么季节播种什么谷物，做啥农活，常年累月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做法。但许多农民都不识字，不会读写，记述四季农事只好用自编的口头歌谣来替代笔记，用山歌调唱出一年四季无闲月，春夏秋冬农事忙的景象。山歌朗朗上口，好背好记，老少皆宜，这样一代一代传唱，用通俗易懂的劳动山歌来记述什么季节应种什么谷物，什么节令应做什么农事。如劳动歌中的《头时黄秧》歌中唱：“头时黄秧，二时豆，三时拔脱黄秧，种赤豆。”又如《一粒谷偈文歌》中唱道：“一粒黄谷芒又长，交只立夏就下秧。四月之中成仙草，五月端午总蒣秧。六月之中拔草忙，一交七月渐渐长。八月中秋稻做肚，九月重阳穗出娘。交只十月斫稻忙，担绳捆扎挑上场。脱粒甩稻来轧下，黄谷落地晒太阳。石臼缸臼忙打米，打出白米喜洋洋。烧只粥饭喷喷香，敬

天敬地敬爷娘。”这些通俗易懂好记的山歌词调，唱出了一粒稻谷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提醒人们不忘当节农事，切勿错过播种季节。

四是反映农业获得好收成，农民享受丰收成果的喜悦

劳动歌中既有唱种田的艰辛，也有唱丰收后的喜悦。当农民辛劳一季，一滴滴汗珠换成一粒粒谷麦，享受自己辛勤劳动成果时，心中充满了喜悦，一首首山歌喷涌而出。如《小麦偈文歌》中唱：“一粒小麦黄又黄，淘淘晒晒下磨坊。磨子牵磨牛来赶，磨出面粉白如霜。面杖下，来回擀，擀出长面银丝样。滚汤锅里来撩起，酱油麻油合鲜汤。金丝爪篱荷花碗，双手端出下佛堂。大众吃只长寿面，年年月月保安康。”从这首淳朴的劳动歌中，我们看到了农业丰收后农民喜悦的笑脸，日子温饱的满足和快乐。不是吗？那山歌中唱的雪白如霜的面粉，银丝样的面条，酱油麻油合成的鲜汤，荷花碗里的长寿面。在那个“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特殊年代，能吃到这样银丝般的东西，农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又如渔民们在打鱼时唱的《打渔》歌：“月上树梢天三更，打鱼起身赶头趟。船板敲得咚咚响，大鱼小虾一网张。”这首歌既体现了打鱼人的辛苦，三更天就要起身捕鱼，船板敲得咚咚响，但又唱出了打鱼人大鱼小虾一网张的喜悦。

五是期盼老天风调雨顺，田里年年有好收成

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农耕时代，农民种田靠天吃饭，所以农民企盼老天能风调雨顺，年年收成好，吃上白米饭。如《阵头雨》中唱道：“垒

好田，等乌云，一夜阵头雨重重。稻田变成白洋湖，开船蒔秧一轻松。”《南风吹》中唱道：“春二三月南风吹，养蚕采桑半夜起。种田勤力肯吃苦，白米满仓最稀奇。”《靠天时》唱：“种田日脚辛劳地，东家养蚕又蒔秧。高头车水低头没，年成收势靠天时。”这一首首发自农民内心肺腑的劳动歌，唱出了农民的企盼与希冀。因为那时的农民，劳动都靠手工操作，技术落后，耕作粗糙，一遇灾难，农田颗粒无收，农民束手无策，只好听天由命。真像《垒田》中唱的：“秋雨绵绵日升东，早起垒田晚歇工。种只二亩干煞田，年年辛劳一世穷。”

六是倾吐遭受自然灾害后农民的困苦生活。

《荒年山歌》是河阳山歌中独具一格的劳动纪实性山歌，有424句。它记录了清咸丰六年江南大旱，农民们起早摸黑战天斗地，艰苦抗旱、抗蝗灾保苗的真实状况，是整个农耕社会遭受自然灾害后农民艰难生活的写照。山歌声声悲哀、句句凄苦，催人泪下，感动人心。有车水、抢水救苗、全家老小齐上阵的雄壮场面，也有在大旱的威逼下饥民挨饿受冻、卖儿卖女、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凄凉情景，这首歌是研究农耕社会农村民俗风貌与农耕生产的宝贵资料，也是农民在农耕社会中的主题咏唱，是劳动人民心中的歌。

曹乾石 男，曾当过生产队会计、村团支部书记、民办教师。1969年发表处女作，同年进入镇机关工作，一直从事文秘及宣传报道工作。出版有《紫红的桑葚儿》散文集。

山歌绕着花边飞

III 顾丽红

每次有记者来访，我总会陪他们去河阳山歌馆，听一听这片土地上最原始最淳朴的歌谣，感受河阳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而在山歌馆回荡着的山歌声中，我总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天窗中，漏下一柱浅浅的阳光，母亲在这柱浅浅的阳光里捧着雪白的花边，而我，坐在母亲身旁的小椅上，牵着花边的一角……这幅“农家扎花图”，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小时候，父母一年所挣的工分仅能糊口，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在农闲时做起了花边。花边做工精细，母亲用一针一线，在床单般大小的白布上绣上梅花、桃花等五彩图案，为了能抓紧时间多赚些钱，母亲让我学做钩花。

童年的心总是雀跃的。我的眼光，总要越过窗户，去追随那些春天里飞舞的蝴蝶，那些初夏时唱歌的青蛙。母亲为了能让我专注于花边，便让我猜谜语，当然，她的谜面，是用山歌唱出来的：“大哥山上坐，二哥河里掘田螺，三哥买鸡不带秤，四哥余米勿带箩。”“啥个鸟飞来节节高？啥个鸟飞来象双刀？啥个鸟飞来头戴三寸三分花红孝？啥个鸟飞来着红袍？”我一边钩花，一边猜啊猜，把家门外跑的、天

上飞的、河里游的都——道来，母亲呵呵地笑，故意把山歌唱了又唱。虽然我最终没有猜出谜底，但时间就这样在唱和猜中轻轻地流过了。

钩花边的生活是单调的、寂寞的，但有了山歌，这种生活就有了情趣，童心也能在这种生计的忙碌中沉静下来。我会在“杭铃杭铃马来哉，隔壁大姐转来哉。吃点啥？茭白炒大虾”的山歌里遐想难吃到的美味；我会在“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三钱买块桥板糕”的山歌里感受温暖的亲情；我还会与母亲一起对歌：“碰！碰！啥人？张小弟。里厢坐！依做啥？捉只花花小狗。小狗勿开眼。”

开始学钩花时，不是钩得太小，就是钩得太大。我担心我的花边缴不掉，没了信心，很想弃之不干。母亲用山歌鼓励我：“拉根线，做花边，做只花边啥人要，福山对江崇明人。”母亲告诉我，不管花边做得如何，那个叫做崇明的地方都会收的。我于是喜笑颜开，拾起花边，有模有样地重新开始“打拼”。直到长大，我才知道，原来这首山歌是专门为着这些初学花边的小朋友们编的。聪明的母亲们用这样一个善意的谎言，安抚着孩子们的心，让孩子们在花边路上坚持下去。

山歌绕着花边飞。山歌唱了一日又一日，花边做了一只又一只。把花边缴进花边行，所得的钱，母亲用来买油、盐、酱、醋，添置日常用品，为我和弟弟交学费。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花边，这种贫困的生活该如何继续下去？而如果没有山歌，我也无法专注于钩花，无法为母亲分忧解愁。河阳山歌，这朵在几千年岁月中永开不败的乡野奇葩，滋润了我的童年，也芳芬了一代又一代河阳民众的生活。

顾丽红 张家港市凤凰镇宣传传统战科干部。

知觉就好

——任彦申政论散文三部曲读后感

III 丁捷

几年前，即将从江苏省领导位置上退休的任彦申先生，萌发了写一本书作为自赠退休礼物的念头。作为一个在大学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学者型官员，写一本书的情感动机，是记述那些日见其远的、在清华北大和江苏生活时光里的工作心得和人生感悟，不是为了所谓退而不休的话语权，更不是为了要出什么学术成果。先生带着这种淡定从容的心态开始写作，一写就是五六年，一写就是三部，这些著作后来闻名全国，发行已经突破20万册、雄踞社科畅销书排行榜的《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后知后觉》以及最近上市的《如何是好》，一应是内容博大却不繁琐，思想深邃而语态平实，文法睿智但不炫弄。三部著作成为凤凰出版集团优秀精品和读者最欢迎图书，出版社因此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的双重收获。曾多年分管过出版工作的任先生，退休后竟然以一部书，再次无意地为这家老文化单位，做了一把贡献。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资本。几本书的成功，带给任先生的心情慰藉，也许比其他

东西多得多。先生从一个平民书生，成长为一名哲学教授，并凭自己的学识和人品，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主政多年。劳碌几十年，换得的是好的口碑和坏的身体。可先生想的是，我还能给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对那些疾走中的也许还懵懂的年轻人说一点什么？先生受邀到北京、江苏和广东等地演讲，手术后的虚弱常使他感到一种深度的身体疲惫，但充实的精神没有使他停止工作。白天在讲堂间奔波，夜晚在稿纸上耕耘，几十万字凝练的书稿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多人受益于这几本书，但同时真切地关心他的身体。先生很感谢读者们赋予其作品的成功和价值，及其带给他的喜悦。他说比起给予，他得到的更多，所以他真诚感谢出版人，广大读者，以及生养他的燕赵大地——这几年，他频繁回到他的老家河北，与乡亲们谈天说地，到村头和自己读书的那些学校走走。说起自己当年从那里考上清华，乡亲们带着荣耀送他入京的情景，先生的眼睛里会闪烁感激的泪光。他把著作的部分稿费，捐给了家乡，用于公益



事业。著作与故土，同样凝聚了深厚的关爱，承载了浓稠的心血，结成了必然的情感纽带。

三部书四十万字，不过是先生博大的心海里浓浓的一勺。我们能看到精华的融解与挥发。《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主要围绕教育经历与感悟，书出版后在教育界掀起了热浪。陈述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阅历，然后又以教育眼去观照教育人。把清华与北大作为彼此的参照，把清华北大人的性格与精神和传统大学精神进行比较，最后向读者呈现立体的清华北大，以及时代在大学精神投下的光辉与掺杂。随后出版的《后知后觉》，则是以文化眼来看江苏。从北大到江苏十多年，先生这位北方汉子，在生活上、文化上深度融入江南的迁折过程，使他对两种文化情境的切身感受得到理性升华。同时在那一段人生里，先生通过文化视觉成功地找到了人文精神与施政效率的结合点。江苏的文化体制改革走在中国的最前头，云集知识分子的四大文化集团在本世纪初率先组建，向传统的政府养文化的时代告别。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如

迅雷般急速，又如巨舰般平稳。一位如今担任了国家领导的重要民主人士说，没有厚积薄发的大学精神，没有任先生的人文素养和北方性格里的果敢力量，没有后任者的紧随推进，这样大规模超前的敏感地带改革，很难说能取得如此成功。这种成功更大意义，还在于给后来整个中国的文化改革，以模式和信心。任先生的确应该好好书写这一段篇章。《后知后觉》在这样的呼声中脱稿。其时，我正好援疆回来，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先生的构思。先生的心情有时也会沉郁，但是每次见面，只要谈及第二部书稿内容有关的话题，马上就变得十分开朗。他几乎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出自己一字一句写出的这些文章，等到我们帮着校对这部书的时候，发现其中的内容，我们也都十分熟悉了。我们默读那些精彩的句子时，心里响起的都是先生的语音。别人读到的先生的书，是美观的印刷品。我们读到的，是先生密密麻麻的手稿，是先生热情的体温和激昂的声音。我们对《后知后觉》的认识，当然更亲切，更充满了感性。

在抚摸先生的新书时，我的内心从这部其实很理性的著作感受到的，恰恰是超越理性的情感。无论是对江苏的解读，对传媒的观察，对文化价值和大学精神，人们读到的也许是精辟的理论，我读到的，却是一部精彩的文学。

然而，先生在《后知后觉》中，依然没有满足许多好心人的期望——作为一名曾经的政要，人们不能满足他教育的、文化的视野，希望他动用他敏锐的政治眼。可是他不想让别人联想他的经历，不言所为，只言所情、所思。说所谓政绩，从来不可以属于哪个人。只能说，某些工作里，有那个人的良心，思想，甚至就是一些心血和方法，一些成功的点子而已。所以，作为个人著述，写点这样的思想，就足够了！每次面对先生的文章，尽管我们对他过于凝练、过于省俭笔墨感到惋惜，但细想先生上面的这些话，慢慢想通了，自己的心胸仿佛也随着先生的心胸，豁达了好多。但是，先生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读者需求。更多的知识分子读者需要他的政治眼，更多的官员需要一个智慧前辈坦诚的政治课。越南共产党中央甚至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这两本书的版权，在越共的代表大会上，给全体代表发放。越南最高出版官员称赞任先生的书，给正在改革发展中的越南意识形态一定的促动，并希望能看到任先生更多的文章。出版社开始催促先生写第三本书，而且希望是一本富有政治营养的读物。先生本想封笔了，被读者和编辑催来催去，不知如何是好。人生里常常有许多“如何是好”的慨叹，许多人许多人生阶段“如何是好”啊？纠结中，先生一挥而就了他的第三部著作，干脆就叫《如何是好》好了。

《如何是好》更加袒露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开篇的几个文章就直陈为官的心得，大量篇目

是从政经历中积累的处世之道。写作者的身份变得更加明朗，从政治眼发出的视线，也比前两部清晰了许多。它更像是一本做人做官的心灵和方法指南。通篇以解答问题的手法来组织文章，不绕圈子，不做文采渲染，追求直白。它像一场谈话，而且不是那种面对众人面对陌生的谈话，而是与你面对面的谈话，倾听者的目光与他是平视的，是热诚而专注的，这些文字在平等与坦诚的交汇中传递进对方的内心，非常受用。这本书不用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才华，而是本着一种务实精神，对前两部书的读者和年轻的从政、从文、从业者，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的困惑，进行解疑。有的干脆明说是非，定断曲直。在先生看来，人生中的许多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复杂的是人心和态度。如果你超脱一些，善意一些，坦荡一些，明快一些，许多问题原来就是简单的。许多事情绕的不是智慧，不是才学，而是心胸，是境界，是良心。一本书的写作态度和表述风格，同样反映了作者的品格。《如何是好》就这样站立到了读者跟前。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完这三部书，真诚地体会一下先生写作的良苦用心，再想想先生为他钟爱的教育、文化事业而奋斗的那些沧桑岁月，想想他高大人格里如此谦逊的自我，“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后知后觉”、“如何是好”，看似平静的，其实是沧桑的；看似一段轨迹，其实是一生的心迹；看似疑惑的，纠结的，其实是明白的，坚定的，温厚而坦荡的，是写实一种风浪聚合汪洋、惊雷归于无声的平静和超越。

丁捷男，作家，现任职江苏省属某文化集团。著有长篇小说《依偎》、《亢奋》等。

鲁迅集外文四种

三 顾 农



鲁迅的作品集大抵是他本人自己编成的，而未入文集的文章还有不少，搜罗这些集外文章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先后出过多种。从现在的情况看去，这样的书主要有四种，这就是杨霁云编的《集外集》、许广平编的《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和刘运峰编的《鲁迅全集补遗》。此外尚有遗文，但为数甚少，或仍在疑似之间，关系不算很大了。

首先注意到鲁迅的集外文并且动手来搜集并编成专书的是杨霁云先生（1910—1996）。

杨先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业余向《涛声》、《新语林》等刊物投稿。稍后因《涛声》主编曹聚仁的介绍结识了鲁迅，不久他就开始搜集整理鲁迅的集外佚文，与鲁迅通过很多封

信，得到鲁迅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很快编成《集外集》一书，于1935年5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

《集外集》共收鲁迅1903年至1933年间的文章30篇，1912年至1933年间的诗歌13题，另有《〈奔流〉编校后记》多篇。鲁迅为此书亲自写了序言，自称对于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杨霁云写了《编者引言》。

后来杨编《集外集》收入了20卷本、10卷本、16卷本、18卷本诸版《鲁迅全集》，略有修订。主要是删去其中个别不能算集外佚文的文章和译文，增补了一则《〈奔流〉编校后记》和若干旧体诗，并对诗的系年作出了必要的调整。

《集外集》书稿在送审时被删去《编者引言》和正文九篇：《来信〈致孙伏园〉》、《启事》、《老调子已经唱完》、《上海所感》、《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英译本短篇小说〉自序》、《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对国民政府审查官的大砍大杀非常愤慨，1935年2月4日致信杨霁云说：“文字请此辈去检查，本是犯不上的事情，但书店为营业起见，也不能深责，只好一面听其检查，不如意，则自行重印耳。”他又在写给曹聚仁的信（1935年1月19日）中说：“《集外集》之被捣乱，原是意中事。那十篇原非妙文，可有可无，但一经被删，却大有偏要发表之意了。我当于今年印出来给他们看。”此事后来未能实现。到后来许广平先生（1898—1968）编《集外集拾遗》时，才把《来信〈致孙伏园〉》等九篇鲁迅的文章补到这里来。

《集外集》出版后，施蛰存先生讽刺说，鲁迅“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杂文的

文艺价值》，《文饭小品》第5期，1935年6月）。对此鲁迅在稍后的文章中有微妙的反击。这大约可算是“《庄子》与《文选》”问题之争的一点余波。像鲁迅这样量级的大人物不是轻易可以得罪的，施蛰存的意见虽然不妥，但其胆量颇不可多见。

时至今日，仔细搜集现代作家的集外佚文已经成了现代文学史工作者非常重视的事情，《集外集》在鲁迅身前出版的意义自应得到充分的估价。鲁迅敢将自己早年的文章重新公之于世是难得的，有多少现代作家自己肯这么做？人们看到的是不少作家讳言旧作，或者大为后悔，说要把它们一把火烧掉。

二

《集外集》编成之后，鲁迅想到自己还有些旧文未尝编入文集，于是打算再编一本《集外集拾遗》，后定名为《集外集拾遗》，见于他手定的著作目录。但此本未及编完，他就病了。后来到1938年出版20卷本《鲁迅全集》之时，才由许广平编定收入。

许广平在《集外集拾遗》的《编后说明》中写道：当年鲁迅“因为《集外集》所载的尚觉有未备之处，似乎还可以补足一下”，“所以特地托老友宋紫佩先生，把平寓所存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莽原周刊》等寄来，之后，费了不少心血，自己亲自抄录，随时给写下‘补记’，如《编完写起》等是。有在本文之后添列别人文件作备考的，如《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田园思想》等是……很不幸的，先生编辑未完而病作了”。鲁迅做这件事大约起意于1935年初，其时《集外集》已编定送审而尚未出版。《鲁迅日记》1935年1月25日载：“得

紫佩所寄期刊及日报副镌共十二包。”2月10日致信杨霁云称：“先生所作《集外集》引言，如有稿，乞录寄，因印《集外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时拟补入也。”他为《编完写起》新作的补记，作于1935年2月15日。

由许广平编定的《集外集拾遗》内容非常丰富，但仍然不能无遗珠之憾。许广平说：“所深自疚歉的，就是先生文章浩瀚，普散四方，历时且久。以个人微力，匆促编就，烽火遍地，文化陵夷之际，如《河南》杂志中的《破恶声论》等篇，虽承杨霁云先生示知，而无从搜到，或更有遗漏，在所不免，所冀爱好先生著作者，有以助之，俾将来更臻完备，幸甚。”

许编本《集外集拾遗》包括小说、杂文52篇，1903年至1935年间旧体诗23题，并附录1926年至1936年间广告6则。这个本子编入了1938年版20卷本《鲁迅全集》，后来又收入1981年版16卷本《鲁迅全集》，内容和顺序略有调整，显得更加合理、规范。

三

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颇为匆促，时事艰难，工作条件很差，所收大抵只是鲁迅成本的译著，拾遗补缺仅限于许广平编辑的《集外集拾遗》和《译丛补》。许广平曾一再表示更完备的辑佚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此后许多学者都为继续挖掘鲁迅集外佚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中动手最早贡献也最大的是唐弢先生（1913—1992）。他先后编印《鲁迅全集补遗》（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辑录了大量的鲁迅集外文章和译文，为此后更

完备的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唐编本《鲁迅全集补遗》，许广平写过一篇很感人的文章（1946年10月），其中有这样一段：

希望有像唐弢先生一样的热心文化事业者和我们合作，使鲁迅著作更得一全豹之窥。然而这也谈何容易，世变益亟，大家谋生救死不暇，文化的被搁置自然是更属应当的。要像唐先生的搜辑工作也不是易事。据我所知，就在日本投降之前，恐怖之极的时候，文化人陆续被捕受苦的真是家常便饭，毫不为奇。而柯灵先生等，谁都知道和唐先生在文化事业上有多少合作的了，柯灵先生一再被捕，坐老虎凳，备受酷刑，难道唐先生就不应作漏网想？于是弃家出走，丢下老母稚子而躲藏别处，就在这生死之际，仍不忘文化事业的存在，日夕向图书馆奔走，查抄，以有今日的十数万字的辑佚。这是用辛劳忘我的舍身精神博取来的收获……（《读唐弢先生〈全集补遗〉后》，《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这样的精神至今令人感奋不已。

唐弢先生的两部辑佚之作以及其他学者这方面的贡献，使得重编《集外集》之外集更加有了必要和可能。这里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就许编本《集外集拾遗》加以增补，一是在该本之外另编一集。

这两个办法后来都实行过。当人民文学出

版社在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 10 卷本《鲁迅全集》及有关单行本时，对《集外集拾遗》采取了扩大重编的方针，其出版说明云：“本书收作者 1903 年至 1936 年的杂文 126 篇，都是没有编入各本杂文集集中的作品，并附录别人的有关文章。此外，附录二种：一为作者早年的诗文，共 17 篇，是 1898 年至 1902 年的作品；一为作者在 1919 年至 1936 年间所拟的启事、广告、说明等短文，共 23 篇。”内容大大超出许编本《集外集拾遗》。

由于此后鲁迅集外佚文越挖掘越多，继续就《集外集拾遗》扩大重编已经很难容纳。再考虑到许编本《集外集拾遗》的原貌最好能基本维持不变，于是从事新编鲁迅全集的学者群体将先前的扩编本《集外集拾遗》中新加入的部分以及新近发现的鲁迅集外佚文重新整理编辑为《鲁迅佚文集》一书（《鲁迅大辞典》编纂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则再度精编成《集外集拾遗补编》，列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 8 卷。该集近年来又收入 2005 年新版 18 卷本《鲁迅全集》，篇目和编排进一步有所调整。

今本《集外集拾遗补编》包括 1901 年至 1936 年间的作品 124 篇，附录一收入 1907 年至 1936 年间的启事、广告、正误等 39 则，附录二收入 1898 年至 1902 年间旧体诗 10 题。这里颇有一些新发现的重要佚文，例如 1919 年的散文诗《自言自语》（首先重新发表于《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3 日第 5 版）、1927 年的杂文《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首先重新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75 年第 3 期）、1930 年赠冯蕙熹医师的《无题》诗（首先发表于《文物——革命文物特辑》总 5 号）等等。

四

继杨霁云、唐弢两位先生之后，在辑录鲁迅集外佚文这一课题上继续前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是当代学者刘运峰先生。他花十多年时间独力完成了《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 2001 年版），将 1981 年版《鲁迅全集》集外佚文几乎一网打尽，尽管其体例可能尚不够谨严，也还做不到不漏不滥，但汇集资料之功极可称道，贡献非常之大。此书为 2005 年版 18 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提供了重大支持，该版全集从此书取材甚多。

《鲁迅佚文全集》中未被 18 卷本《鲁迅全集》采纳的部分，刘先生另编为《鲁迅全集补遗》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全书凡四十万字，印订精良，深受读者欢迎。即如篇幅比较大的《中国矿产志》、《人生象数》和《小说史大略》三种，虽然都是研究者早就了解的文本，但汇印在一起，仍然有意义，颇便使用。此外又有许多的集外文，尽管零零碎碎居多，也都足供进一步研讨。（参见刘运峰《走近鲁迅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11 月 2 日《后海》副刊）

有一套 18 卷本《鲁迅全集》，加上这部《鲁迅全集补遗》，再加上 8 卷本的《鲁迅译文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鲁迅的译著就齐全了。让我们认真反复地来细读这几部书吧。

顾农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画临摹仿拟摭谈

III 朱寿桐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绘画遗产中，仿拟的作品不可胜数，而且许多仿拟的作品都成为极其珍贵的精品，或为皇家把玩，或为贵胄珍藏，或为镇馆之宝，或为卖场极品。无论是北京故宫还是台北故宫，抑或是国内外著名的博物馆，中国古代绘画的珍藏品中，仿拟之作不在少数。如董其昌的《仿米家山水图》，八大山人的《仿董北苑山水图》，王鉴的《仿梅道人山水图》、张翥《仿古山水册》等等，都是国宝级的极品。前些年，八大山人的《仿倪云林山水》拍出了8000万的高价，成为艺术品拍卖行中的一时佳话。这类作品也常常为美术史家和美术家们所研讨，事实上也是一个极好的学术话题。之所以说是一个极好的话题，是因为围绕着仿拟之作还是临摹之写，怎样才叫“仿”与“拟”，如何才是“临”或“摹”，其中包含的创作理论和鉴赏美学方面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

北宋时期著名书论家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有《论临摹二法》章，称“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

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这样对于“临”“摹”的定义未必精准，语言拖沓迟滞，表述也过于拘谨，但突出的印象应很清楚：“临”、“摹”是离不开原帖原作的复制，其作品的评价标准应在与原帖原作的相像程度。至于“仿”就不同了，虽然含有临摹之原意，如临帖有时候也叫写仿，不过更多时候“仿”指构思上的效法以及笔法上的仿效，可以离开原帖原作，以心得之以意达之，这时候，超出原帖原作而不失其精神，往往是仿作的至高境界。与“仿”相似的还有“拟”，是一种更加超脱的摹仿，一般指按照原帖原作的精神、理念抑或笔法所重新展开的创作。由此看来，临摹、仿拟在艺术作品的生成方面，体现着不同的艺术取法，不同的传承理念，其艺术衡量的标准也不相同。

最近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山水清晖：王鉴、王翬及虞山派绘画”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两岸四地以及海外的美术家和美术史家围绕着王鉴、王翬等杰出画家的艺术贡献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但我发现在研讨的时候，常常将古人的仿拟与临摹混为一谈，这就非常不利



王鉴《拂水崖图》



王鉴 仿李营丘《溪山雪霁》



王翠 仿山樵《高山草堂》图



王翠《晚梧秋影图》



王蒙《秋壑山居图》

于探讨的深入。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个很容易忽略、事实上也是久已被忽略但实际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不过来自台湾的主持人，前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尚无相应的学术敏感，认为这仅仅是个用词习惯的问题。其实不然，例如在讨论中，就有画家围绕着王氏“摹本”某处为何没有了原本中的一座桥展开了研讨，其实将这“摹本”还原为“仿本”，问题就迎刃而解：“仿本”原不必尽像原本。

看来，将临摹仿拟混在一起，视为一途，是部分美术史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这样的混淆使得他们在对传统美术作品进行概括和表述时呈现出明显的粗糙痕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王蒙的《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而在许多藏馆则一般标为《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者显然是准确的，因为王蒙一生数次仿作《富春山居图》，其实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看到了此图正本即“无用师本”，一般可以断定的是他参看了此图的粉本或别的摹本。非常明显的一点，王蒙每次仿《富春山居图》都不是传言中的“临”或者“摹”。恽寿平《南田画跋》有言：石谷子

为半园唐氏摹《富春图》时，还“尤为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可后来再写《富春》，“遂为弹丸脱手之势”，“其运笔时精神与古人相洽”，但“信笔所之，不滞于思，不戾于法，适合自然，直可与之并传”。可见，无论是王蒙的画旨，还是恽寿平的期待与评价，这些仿拟之作都不在于直传与仿真的临摹。

王蒙自己在表述仿拟《富春山居图》时，用语极其准确。辽宁省博物馆藏其55岁时仿作《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卷中自题云：“曩从毗陵半园唐氏借摹粉本，后凡再四临仿，始略有所得。丙寅秋在玉峰池馆重摹。”首先，他确实得见《富春山居图》粉本而“借摹”过，但他的画作是在“略有所得”之后的仿作而不是摹本，只不过是朝着粉本所进行的“仿”作，故称“临仿”。仿是一种包含着自己心得的再创作，与一般的摹本不可同日而语。以此类推，台北故宫所藏王蒙《仿王蒙夏日山居图》，由于作者明确在题款中指明：“夏日山居。剪灯仿黄鹤山人笔”，才在现标题中命名为“仿”，与此相参照的是北京故宫所藏《夏日山居图》，这是前作12年前

的作品，王翬题曰：“夏日山居。壬子闰七月，仿元人笔意。虞山石谷子王翬。”北京故宫径直题为《夏日山居图》，实在是非常高明的标注，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仿作，更不是摹本，而是拟本，凡“仿□□笔意”者，都不是临摹之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仿作，而是借助前人的某种意念甚至笔法，进行重新构思，通过借拟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创作品。

也许，古人不太习惯于用“拟”来标明款识。王原祁作《仿赵松雪山水》（扇面），显然是拟赵雪松山水之作，但他仍标之为“仿”：“乙酉清和武林扈从归，仿赵松雪笔法于松陵舟次。”古人标示作“仿”，仍是一种谦逊，今人再作标识，应概言为“拟”，跟着用“仿”，乃是借学古人欺古人的傻事。

一名画题为：《明蓝瑛仿张僧繇山水图》，题名同样值得斟酌：张僧繇是六朝时著名画家，其对初唐画坛影响甚巨，形成了所谓“没骨画法”的艺术流脉。至明一代，董其昌尝试复活此一画风，但史料表明，董其昌并未见过张僧繇的真迹，只是根据推敲和想象构拟出张僧繇的画法。蓝瑛又是师法董其昌，他所构拟的没骨山水古法更是虚拟了张僧繇的画风，因而无论如何不应标示为“仿张僧繇山水”。

临摹、仿拟之间的关系如此泾渭分明，据此可以判断，王翬仿《富春山居图》一般都不应该标示为“临”或者“摹”；从严格的学术而言，临摹和仿拟完全不容混淆，将这样的混淆算作词语运用上的习惯问题，显然是对故人艺术创作的缺乏尊重，也是对艺术创作层次的粗疏误解。

在这方面，或许是台北故宫书画文物主持人素来有这种混淆的习惯或认识，该博物院常常会将古代画家的仿拟之作标为临摹之本。该

院收有《清王翬临唐宋各家山水》册页，显然是外加的命名，其中所收录的名画则多为仿作而不是摹本，如其中所有的《仿梅道人溪山无尽》，北京故宫藏画题款为“梅道人溪山无尽”，又如《仿关仝太行山色》，其实原画只题为“关仝太行山色”，这些都不应该题为“临”本或“摹”本，是典型的仿本。不知道明明这为何不参照清人的编例，将此册页命名为“仿唐宋各家山水”；时人王时敏作跋的《石谷仿唐宋元诸家山水册》，就是一本现成的经典之书，命名之准确，后人望尘莫及。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文人多为谦谦君子，对于前人，尤其是艺术上景仰的古人，总是胸怀虔敬，不苟言摹，不敢称临，标署仿拟，较为审慎，包含着不敢贸然以一己之拙笔传达前人之真义真气的意思。后人不解此文人心里的隐曲，动辄用“临”、“摹”概题古人的仿拟之作，实在是唐突不已，粗浅不堪。

问题是这种混淆临摹仿拟的标示法现今仍然大行其道，很容易造成艺术界的混乱。媒体载，台湾美术史学家徐小虎在北京作学术交流时，展示了一幅今人用凡高的笔法临摹北宋郭熙的名画《早春图》，并说此画明显带有明代山水的风格和气氛。既然是用外国画家的笔法，对中国古代名画的处理只能是仿拟，临摹是要以传真性为标的的。这样的报道或者学术讲述，离美术史和传统美术学的常识太远，很容易贻笑于读者。

朱寿桐 文学博士，教授，现任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曾长期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俗与雅

III 周延年



《红楼梦》插图 海棠诗社（清 孙温 绘）

俗雅与阶级

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里小白人深为自己俗而自豪：对，我知道，能被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就是高级的、艺术的。譬如相声、武侠小说、伤感电影、流行歌曲、时装表演诸如此类。这就是我，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一个俗人的标准——我为此骄傲。这篇小说，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毛泽东时代以劳动阶级为荣的遗风还在，劳动阶级的趣味就是俗的，知识分子的趣味就是雅的，由此可见，在大多数人眼里雅和俗是和阶级有关的一个概念。不过这里所指的阶级，与其说和财富有关，莫若说与知识和修养的关系更大。试举一例：曾经的贵族公子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可是他说：“并不妨我襟怀。”他的好友张宜泉在《题芹溪居士》一诗中这样描绘曹雪芹吟诗作画的文雅生活：

爱将笔墨逞风流，
节录西山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
堂前花鸟入吟讴。

而缺乏知识和修养，缺乏文艺的训练。即使富贵如皇商子弟薛蟠，仍然雅不起来，《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薛蟠和宝玉、冯紫英等人在酒宴上行酒令时，抓耳挠腮，只憋出个“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这样粗俗不堪的“诗句”出来。

雅与真

其实薛蟠并不讨厌，这家伙还算坦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装”，一开始就坦诚：“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按照赫兹里特（Hazlitt）的观点，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是俗的，粗鲁不是俗，愚陋不是俗，呆

板也不会是俗，只有粗鲁而装细腻，愚陋而装聪明，呆板而装伶俐才是俗气。所以俗人就是装模作样的人。由此看来，薛蟠不过是粗鲁或者愚陋而已，还未必算俗呢。

《围城》里有诗人曹元朗，作诗道：“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这守活寡的逃妇几时新有了个老公？……”作出半通不通的诗来还沾沾自喜，要论对自己鉴赏力的了解，他还不如薛蟠呢！不过，曹诗人并不算至俗之人，他只是没有自知之明罢了，最会装的是苏文纨小姐，对这样的诗她居然夸赞：“这题目就够巧妙了。一结尤其好……”一旦开始装，就和雅相距远矣，方鸿渐看不起苏文纨的为人，他喜欢的是天真烂漫的唐晓芙。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红楼梦》中才气最高的两名少女，林恃才任性，薛更通人情，也就是说，薛有一点点“装”。难怪在第三十八回，林黛玉能够凭着一首《咏菊》魁夺菊花诗，全诗如下：

无赖诗魔昏晓侵，
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
片言谁解素秋心。
一从陶令平章后，
千古高风说到今。

宝钗的才气不在黛玉之下，但总归少了一分天真，多了一分世故。在第七十回，宝钗所填咏风筝的《柳絮词》中末两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就透着一股俗气。可见真正的雅，仅仅有鉴赏力（和知识与修养有关）是不够的，还需要一颗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就是对自己的绝对真实，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不拘泥于外在的目的。《世说新语》里记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是书圣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有其子必有其父，《世说新语》里也有王羲之的小故事，“雅量”第十九篇记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佳，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郗公曰：“此正好！”访之，乃逸少，因嫁女与焉。文中的逸少就是王羲之，这一段很奇特，人家来相亲挑女婿，出于基本的礼貌也应该穿戴齐整一些，王羲之倒好，躺在床上，露着肚皮给人家看，真所谓君子坦荡荡，郗太傅的眼光不一般，还真把女儿嫁给了他。《世说新语》还有一段，也是有关王羲之，说是听人家讲解庄子，听到高兴处“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拥有一颗多么率真的心灵，才能用如此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态度来对待世界！难怪他的《兰亭序》从章法、结构到笔法都尽善尽美，达到了雅的极致！

风雅的古

字典中“雅”的原意是美好的，高尚的，和粗俗相对应。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除了生存所需，追求美好和高尚的事物也是人们的根本需求。马斯洛（Maslow）认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

小桌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子恺画



丰子恺《小桌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求。而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他认为这二者应居于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不仅激起我们探寻的好奇心，同时也是我们审美的对象。人们对风雅的爱好的，就是对美的追求。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中间，流行着雅致的社交文化，他们聚在一起饮酒赋诗，宴集中的酒令往往风雅而别致。譬如说流传最久的“流觞曲水”，就是选择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参与者按次坐于流水回转之处，一人将盛满酒的杯子，即所谓“羽觞”，放于上流使其浮水顺流曲转而下，酒杯停于某人面前，某人需取之一饮而尽，然后或啸吟或挥墨，当场作诗，作不出者各罚酒三觥。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惠风和畅的春夜，在桃花丛中摆开宴席，在月光下饮美酒，谈人生，作诗文，这样的社交活动是何等的飘逸雅致！

我们现代人看来，古人动不动就饮酒作诗，并且是张口就来，好像很厉害，其实对当时的文人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娱乐，因为天天练习，当然熟能生巧。沈复所著的《浮生六记》让我们看到，清朝时江南一带知书识字的普通人家，平日并非不为生计发愁，竟也流行这种“兰亭”雅聚，饮酒作诗的习俗。林语堂在《浮生六记》英译版的序言中感慨：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

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朋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红楼梦》大观园中那些贵族少男少女更是吟诗作赋的好手，第三十七回中，探春为发起海棠诗社而给宝玉的邀请函，其文采之典雅，品味之高致，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十四岁少女之手，邀请函全文如下：二兄文几：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未忍就卧，漏已三转，犹徘徊桐槛之下，竟为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昨亲劳抚嘱，已复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抑何惠爱之深耶？今因伏几处默，忽思历来古人处名攻利夺之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妹虽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间，兼慕薛林雅调。风庭月榭，惜未燕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雄才莲社，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余脂粉耶？若蒙造雪而来，敢请扫花以俟。谨启。这封信里全是优美的修辞，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种对美的向往，对风雅的爱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底蕴。

现在的我们雅得起来吗？

1978年萧瑟料峭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知青正返回城市，在上海一些单位的大厅里，在一些人家的客厅里，重新响起了圆舞曲的声音。女作家唐颖（当时正在家乡上海读大学一年级）和妈妈每周参加舞会。在城市里，如何穿衣并装饰的话题也悄悄流行起来。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在娱乐方面的选择，无外乎去听去看去唱那数量有限的革命文艺作品，雅致

的文化被视为剥削阶级的爱好遭到摒弃，粗俗因为被错误地看成是劳动人民的特征，有些人竟以此为荣。很难说唐颖和妈妈在追求风雅，也许她们只是想弥补曾经错过的一个又一个春天，但一个新的时代毕竟开始了，中国社会革命的色彩渐渐退去，世俗社会重新回来，人们除了基本吃穿以外，逐渐有了新的追求。

但问题是，是否“两千年文脉已断”（陈丹青语）？有人说，其实从“五四”，文化的激进主义就已经开始了。激进主义伤害的是文化中传统的那部分。七十年代末，北京有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用搪瓷缸喝廉价的白酒，当众朗诵自己的诗作，这和古代文人们的风雅聚会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们不再写古体诗，而是用白话文写现代诗，这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历史的潮流。对文化更致命的伤害也许来自随后而至的商品经济大潮。现代人生活在焦虑之中，在一个比较体系之下，挣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子，开更豪华的车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赏赏清风，看看明月，吟吟诗歌。需要放松的时候，人们去喝喝酒、洗洗澡、按按摩，觉得活下去就是胜利，哪里还有闲情去风雅？

其实，我们所谈到的那些风雅的古人也并非生活在真空。三百年前，史家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罢了，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各级官吏“豺踞而鸱视，蔓引而蝇孽”，在这样一个庸俗浑浊的社会里，郑板桥曾这样描绘过他的院落：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

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画，构此境，何难敛之则退藏于密，亦复放之可弥六合也。对于向往美的人来说，在俗世之中，拥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就够了，它是宇宙的一角，风声、雨声、日影、月影……对于一颗能够洗净俗尘的心灵来说，世上总有一个角落可以寄托风雅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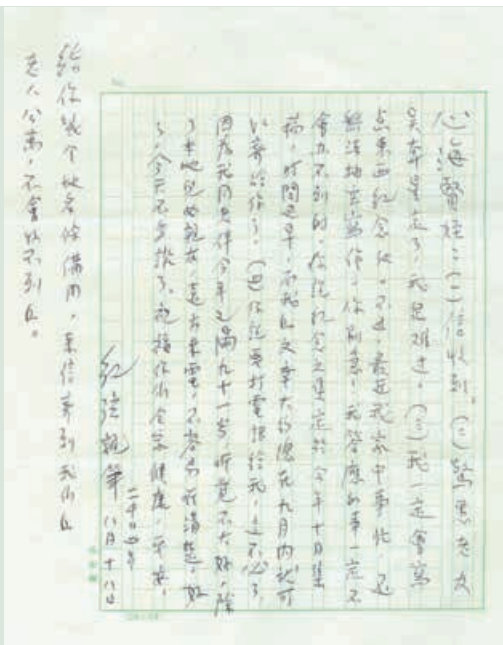
作家王小波革命年代在云南插队，在有月光的夜晚爬起来用钢笔在镜子上写诗，擦去后再写，手被染蓝，然后他悄悄地哭了。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他屈服，就永远沉沦了。

我们会在这个时代沉沦吗？尘世嚣嚣，我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小天井吗？我们无从乐观，我们也不必悲观。在现代社会，个人越来越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想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有向往美，向往高尚的心灵存在，在这个世界里总还有风雅的一席之地。

周延年 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干部。

从书信中感知诗人纪弦

III 吴心海



纪弦 2004 年 8 月 18 日致作者信函



这幅纪弦赠送给吴奔星的照片，摄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半岛老宅后院。诗人在信中说：“大约总在 1983 戒烟以前，81、82 年左右。我身穿睡袍，手拿烟斗，坐在摇椅上想诗。”

7 月 23 日看到诗人于奎潮发布的百岁诗人纪弦（本名路易士）在美国仙逝的微博后，立即给诗人住在南京的胞妹路珠打去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不觉怅然。晚上回到家后，翻读老诗人的手泽，看到他说“你说要打电话给我，这不必了，因为我同老伴已满 91 岁，听觉不太好，除了本地儿女亲友，远方来电，不容易听清楚”、“来信就可以了”，悲痛莫名。因为听了老人的吩咐，我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未能通过电波聆听警欸，留下永久的遗憾！

诗人纪弦是先父吴奔星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老朋友。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就从家中的相册和父亲主编的《小雅》诗刊上“认识”了纪弦，但当时只晓得他叫“路易士”。直到 1987 年后，台海关系逐渐解冻，父亲才从台湾诗友处得知当年的老友路易士改笔名为“纪弦”，在台湾引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诗浪潮。

先父去世前，我和纪弦伯伯没有直接的联



诗人路易士（中）与吴奔星（右）、李章伯 1936 年 7 月摄于北平

系，但我很喜欢看他写给先父的信，信里的他风趣、幽默，活脱脱一个老顽童！这类信很多，且举几个例子：

“写诗可以长寿”，你这句话说得很有趣。但历史上短命的诗人太多了。像你我这样“老而不死”的，实在很少。一笑。（1989 年 4 月 13 日）

关于饮酒与写诗，我想这是毫无关系的。因我只是为写诗而写诗，为饮酒而饮酒。我总在早起头脑清醒时专心写作，一旦喝醉了，那就半个字也写不出来了。（2001 年 12 月 12 日）

除了幽默、洒脱，诗情、亲情、友情、乡情也洋溢在纪弦的信中。父亲在睽违 50 年后和纪弦重新取得联系后，曾写下一首七绝：“云水深藏梦幻情，五十年问雁一声。休问故家归也未，海涛起伏令人惊。”纪弦回信说：“你的七绝一首，读来令人十分感动。真的，奔星，像我们这种

纯粹的友谊，多么可贵！可是我一时无法‘和你一绝。将来如有诗赠你，一定用航空寄去。”果然，纪弦于 1990 年 10 月 11 日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一首《风景》，并在当年 11 月 28 日通过航空信把诗作复印件寄来，诗句如下：

吴奔星看我，/ 我看徐迟，/ 徐迟看大江东去。// 都是些看风景的人，/ 而也都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了。// 至于邵燕祥呢，/ 他在看什么啊？/ 看武汉，看南京，/ 也看旧金山半岛。// 半岛的风景他最喜欢，/ 我不是不知道。

诗的后记说：“诗人吴奔星是我的老友之一，他写了一首《忆纪弦》，发表于 3 月 29 日‘联副’，看了很是令人感动。他现住南京。”纪弦在信中则表示：“请你在看完了《风景》及其后记之后，笑他一个大笑。你的笑声，我是会听见的。”

纪弦 1948 年离开大陆赴台湾，上个世纪 70 年代移居美国，却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尤其

思念他称为“第一故乡”的扬州。他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一部中写道：“我是扬州人。虽非土生土长，但我以扬州为我心目中之故乡，谁还能否定呢？啊扬州，我多么的怀念！”他的著名诗作《一片槐树叶》，其中的句子“蝉翼般轻轻滑落的槐树叶，/细看时，还沾着些故国的泥土啊。/故园哟，啊，啊，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让我回到你的怀抱里”，思乡之情，感人肺腑！

纪弦信曾谈及诗作《茫茫之歌》：“1980年，我站在太平洋滨，极目西望，不见台湾，也看不见上海，十分的怀念故国与家乡，因而写了此诗。——这才叫做怀乡病的患者哩。”

在信中，他也曾多次提到回国和见面的想法。遗憾的是，老诗人最终未圆回到故园怀抱的梦想！个中原因，他也多次提起：

想念你和章伯，想念其他大陆上的和台湾的亲戚朋友。但我和老伴一时离不开，因我女儿的家和小孩，需要二老照应。有二老在，女儿女婿出去工作，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在美国，华人社会里，流行着一句话：“一老一个宝。”意思就是说，家中有一老人，等于是一件宝贝，而我女儿女婿有了“二老二个宝”，当然他们在事业上就更有所发展。（1989年4月13日）

内人于7月里跌伤，我日夜照料，寸步不离，而又要兼管家事，忙得要命。（1989年10月6日）

去年9月9日桂林之会，我因内人健康之故，未能前往，否则会毕，我就可以和你一同回南京看看我的妹妹了。（2001年1月17日）

昨日收到珠妹来信，说你想要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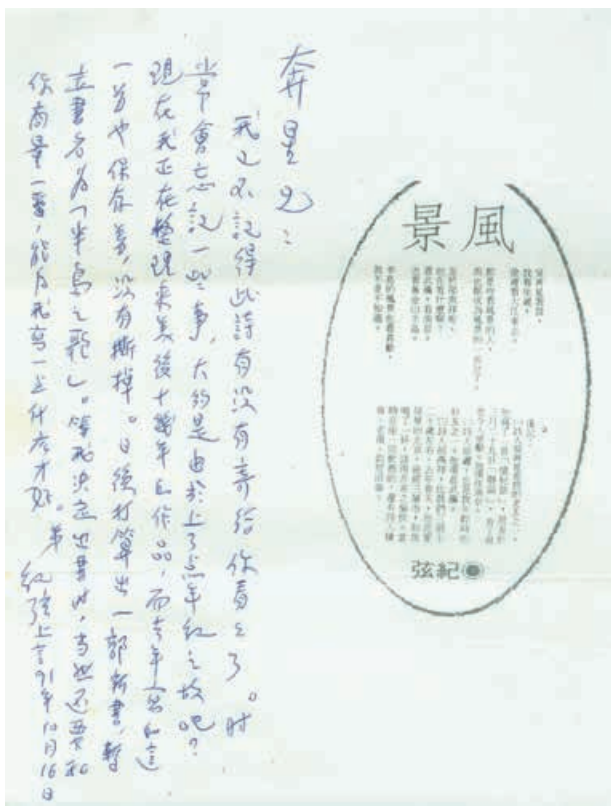


纪弦画作《扬州之巷》及题记

一笔旅费来，要我回去开会，就可以见面了；又说我们弟兄二人皆已近90了，真希望能够见一次面，这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唉唉！老友们都走了，望舒、徐迟、章伯，还有其他几位，皆已作古！当然，我也和你一样，真希望把你紧紧地抱一下，畅谈三个日夜。可是，不可能了！为什么？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医生不许我离开老伴，必须经常在她身边，以防万一。她有头晕的老毛病，一不小心，跌倒下来，就糟了。（2001年6月14日）

回看这些片断，不免令人唏嘘。诗人先是照应子女，然后照应老伴，故乡也只能在梦中、在诗里了！

1988年，《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由江苏



纪弦诗作《风景》及题记



纪弦诗作《致诗人吴奔星》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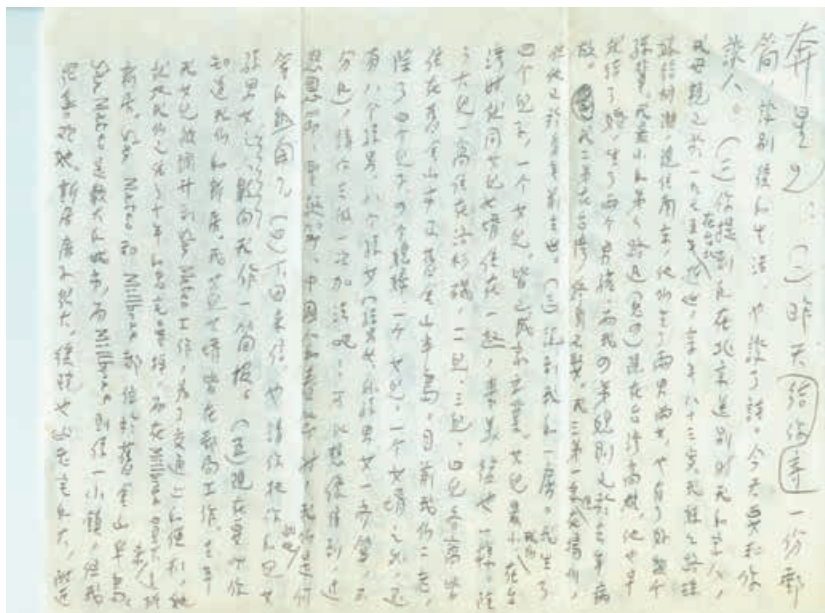
链接 1：

纪弦（1913—2013），现代诗人，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旗手。原籍陕西周至，生于河北清苑，成长于江苏扬州。原名路逾，笔名路易士、纪弦、青空律。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1929 年开始写诗，1933 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4 年创办《火山》诗刊，1936 年在苏州创办诗刊《菜花》（出版 1 期后改名《诗志》），与戴望舒在上海主编的《新诗》及吴奔星在北平编辑的《小雅》相互呼应，互登广告，成为当时南北鼎足而三的有影响的现代派诗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转于汉口、长沙、昆明、香港、上海等地，曾任国际通讯社日文翻译，主编《诗领土》。抗战胜利后始用纪弦笔名写稿。1948 年由上海赴台湾，曾编辑《和平日报》副刊《热风》。1953 年创办《现代诗》季刊，引领台湾现代诗运动。1974 年自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退休，1976 年赴美定居。

链接 2：

吴奔星（1913—2004），诗人、学者、教育家。湖南安化县人，1920 年代末就读湖南长沙修业学校，开始文学创作。1937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抗战爆发后，赴广西、贵州、四川从事救亡活动及教育工作。历任桂林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武汉大学、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36 年 6 月，与诗人李章伯创办北平小雅诗社并出版《小雅》诗刊，鼓吹新诗现代化，为 1930 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主要成员。1949 年后，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人之一。





纪弦 1989 年 1 月 7 日致吴奔星信函

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撰写了纪弦名作《你的名字》的赏析文字。书籍出版后，有读者来信说，该诗最后一句“于是，轻轻轻轻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有误，应该有 7 个“轻”字才对。于是，先父就此给纪弦写信，他的回信说：“《你的名字》最后一行是六个‘轻’字。”（1990 年 2 月 2 日）这应该是我和纪弦的第一次非直接交往。现在坊间不少诗歌选本中纪弦的此诗最后一句，错误地多加了一个“轻”字，不能不特别提上一笔。

先父吴奔星 2004 年去世后，我把讣闻寄给纪弦伯伯并附了一信，内容是什么，已经不复记忆。他前后给我 3 次回复，片断如下：

心海贤侄：（一）信收到。（二）惊悉老友吴奔星走了，我很难过。（三）我一定会写点东西来纪念他。（2004 年 8 月 18 日）

今天我已写好了一首《致诗人吴奔星》，觉得还算不坏，他看了会高兴。但是，还要加上一个后记，说明

三十年代我们一同办诗刊的往事才好。

（2004 年 10 月 26 日）

2004 年 10 月 31 日，纪弦伯伯把写好后记的诗歌寄给我。后来这首诗歌发表在同年 12 月 7 日台湾《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诗云：

你就前往宇宙深处，去赴诗神之
邀宴，/……/ 在那四度空间至极华美 /
不可思议的旋转厅中，/ 李白、杜甫、
朱淑贞、李清照、/ 徐迟、戴望舒、杨
唤、覃子豪、/……/ 他们大家都在举
杯欢迎，/ 说来吧吴奔星。

我想，现在，“在那四度空间至极华美 / 不可思议的旋转厅中”，我父亲一定和众诗神一起举杯欢迎，说：来吧，纪弦！

吴心海 中国江苏网多语种频道负责人，业余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及相关写作，编著有《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文坛遗踪寻访录》等。

谒唐招提寺

III 杨 贇



2013年5月底的一个周末，曾与友人初游唐招提寺——

那天天气晴热，行程很紧，手里攥着奈良一日周游券，想充分利用它可以无限乘坐交通工具的优惠，尽可能游遍奈良城。我们紧张地在西大寺旁喝完咖啡，匆忙眺望了平城宫迹，快步至猿泽池边小憩；片刻便转至春日大社，嬉戏了路边草地上的小鹿们，在那些“国宝”“遗产”前均立此存照；此后狼吞虎咽了几个柿叶寿司充个半饱，靠在奈良那不紧不慢的公交车窗上打了几个小盹后，疲惫且浮躁地来到了唐招提寺，时间已近傍晚。

唐招提寺坐落在奈良南部，与奈良市区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周围仍然是一片农田，遍插着秧，由于刚过日本的端午，四处还招展着鲤鱼旗。

游历过京都的人，因领略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气势，对寺庙的感觉可想而知；对不了解唐招提寺的背景，不知道金堂维修，更无所谓鉴真东渡故事的人来说，拖着疲惫的身躯在烈日当头的日子来到这里显

然是不甚满意的。也许对于心情浮躁的我来说，大热天给个闭门羹也是最好的教训。因为我之前没有做好功课，不知道原来鉴真像只在一年中有限的几天才开放瞻仰，友人也终于失去了耐心，着急地三番抱怨，五次催促，我只得草草结束了这次行程，直回京都了事。

然而却记下了鉴真干漆坐像的特别开放日期——6月5日至9日。

对鉴真和尚的印象，始于一方邮票——

小时候集邮，记得在那本集邮册中有一枚邮票，印的是一个僧人的坐像，由于栩栩如生又面目斑驳，对小孩子来说有些骇人，问父亲他是谁，答曰鉴真，也依稀记下了那个励志的东渡故事。鉴真是唐代高僧，也是著名的医学家，他曾六次东渡日本，历经磨难，虽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终于成功。他的东渡对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历史上中日交流的代表人物。1980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唐招提寺鉴真干漆坐像曾被运回鉴真大师的故乡扬州大明寺供人瞻仰。其时海内轰动，瞻仰坐像的人们从大明寺山门前绵延至山脚下，因此也就有了这枚

纪念邮票。

6月的一天上午，与友人再赴奈良，专程拜谒唐招提寺。

辗转近两个小时，再次来到唐招提寺前，当天寺庙周围人明显多了许多，显然都是为一睹鉴真坐像而来。为疏散拜观人流，寺庙进出都设有详细的指示并有多名警察在周围引导。

我缓步踏入大门，悬于山门正中的朱红匾匾是日本孝谦天皇仿照王羲之字体题写的“唐招提寺”寺名，古朴庄严。门内左手有一块大石，上书“世界文化遗产——唐招提寺”，一条宽阔的大道尽头便是著名的金堂所在。中央电视台曾有一部名为《鉴真千年之缘》的纪录片，在这部记录唐招提寺金堂维修的片子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学者、工程师和工匠们在历时十年的时间里是如何精心细致无微不至地修缮眼前这座金堂的。这是一座典型的日式佛堂，气势雄伟，面积广阔。屋脊两边上飞的两个优美的鸱尾最为著名，传说日本人称鉴真为“天平の菟”也正源于此。因其曲线十分复杂且体积特别巨大，烧造极为困难。金堂中供奉有卢舍那大佛、药师佛和千手观音，均为日本国宝，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当年为修缮金堂，需要移动，千手观音像上的所有954只手臂均被一一编号保存，完后再移入佛堂一一复原，分毫不差，

颇费周折。

虽然唐招提寺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多半与这座历史悠久的金堂有关，但今天大多数拜观的人们并不流连于此，我们便也紧随着人流绕过金堂来到鉴真干漆坐像的供奉处——御影堂。穿过秀丽精致的日式庭园，便来到一处精巧的木质建筑前，所有人都脱下鞋子，踏着吱吱呀呀作响的地板往正堂前行。些许，曲径旁映入眼帘的是一处侧室，内有两幅书法，悬于堂上正中的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鼓螺蜀冈，羹墙南岳；风月长屋，花雨奈良”的真迹，左手墙上，悬挂有先生为鉴真像回国巡展题写的一阕《调寄金缕曲》，“像在如人在。喜豪情，归来万里，浮天过海。千载一时之盛举，更是一时千载。添不尽恩情代代。还复大明明月旧，共招提两岸腾光彩。兄与弟，倍相爱。番番往事回思再。历艰难，舍身为法，初心不改。民族脊梁非夸语，鲁迅由衷感慨。试瞻望，是何意态。坚定安详仁且勇，信千回百折能无碍。仰遗德，迎风拜”。

转入坐像供奉的正堂，令人震惊和激动的一幕出现了，所有拜观的人都在引导员的指引下，双膝跪地，分成由近至远的四列由参拜的边门跪行进入，经过鉴真像正前方后，再退出正堂。许多人在坐像前双手合十，久久跪坐祈祷，需要引导员上前劝离。我为能近距离目睹



唐招提寺金堂

鉴真大师的坐像，有意排在最靠近坐像的那一列，而这一列往往是最虔诚的信徒所排列，因此行进极为缓慢。由于坐像奉于特制的佛龕中，非近前不能目睹真像，本人又不善在地板上长跪，因此其实非常痛苦，长伸脖颈，胫骨生疼，双腿酸麻，半跪半爬着前行，许久终于经过坐像前，我方能够认真仔细地瞻仰坐像——一位僧人端坐在佛龕里，双目闭合，面带慈祥，略含笑意。虽然由于年代的久远，木像的颜色有些发黑，加上一些古老斑驳的痕迹，不能说栩栩如生，但由于刻画极为细致，皮肤的纹理颜色袈裟的皱褶都仍似真实的一般，加上灯光的效果，可以用逼真来形容。我跪立片刻，由于确实不善长跪，又有引导前来催促，方退出佛堂。

出得正堂，立于廊下又远望坐像，许久才离开。

正堂的右边开始是几处侧室，四周的日式拉门上都绘有被日本人尊称为“画伯”的东山魁夷所做的画作，这些画作共5组经过精心安排，分别是正对鉴真坐像的代表鉴真故里景色的《扬州熏风》、右侧侧室代表中国早晨景色的《黄山晓云》、左侧侧室中国晚间景色的《桂林月宵》以及正堂坐像旁代表日本景色的《涛声》和《山云》。每幅画作我均仔细近前欣赏，由衷赞叹东山画作的美妙，他似西洋油画又似山水泼墨的技法成就的画作，现实中透露抽象，写实中融汇写意，引起心中一种似真非真似假非假、如水中花镜中月般的错觉和幻想，《黄山晓云》的那几颗出云的深松，《桂林月宵》似动非动的江水都显示出超凡的功底和脱俗的意境，印象尤其深刻。

退出御影堂，顺着小路行至开山堂前，这里供奉着今人按原样复制的干漆坐像，这尊坐像是今年刚刚复制成功，颜色新鲜且更为真实，

便真可以用栩栩如生来形容，袈裟上点缀的小花和大师皮肤肌肉的纹理和颜色都非常逼真，从观赏角度来说比原作更好，但从欣赏价值来说显然原作的意义要高远许多。

有趣的是，由于御影堂和开山堂内均不能拍照，因此没有人能够留下鉴真坐像的真容，然而开山堂坐像正对的一个门外，山丘的下方没有限制，游人可以在此远望到那尊复制的坐像，也就有许多人用单反相机的长镜头对着复制像摄影，想留下纪念，我也当然加入，可拍过之后才发现，由于坐像的前面立有一块特制的玻璃，因此只能依稀辨得坐像的真容。

在寺院的深处还建有鉴真大师的墓地，穿过爬满青苔的松柏和一小片荷塘包围的甬道之后，鉴真大师的墓地矗立在一小座山丘之上，墓前的几株植物葱翠，旁边立有解说的文字告诉人们这是移自大师故乡扬州的市花——“琼花”。

结束了拜谒唐招提寺的行程，我不禁感慨——日本对待鉴真大师和他创建的唐招提寺已然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层面：一方面是对他毅然东渡，排除艰难险阻，矢志不渝，坚守承诺的那段历史的肯定和感动；另一方面更是对他对日本历史的贡献，特别是以盛唐文明在日本宗教、立法、医药等等诸方面所产生深远影响的尊崇和景仰。我不由想起鉴真大师在东渡之时许下的诺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在这同天风月之下已化作异域山川的鉴真从历史走过，唐招提寺正是他所成就并沉淀下的这样深厚的缘分的根本。她不仅见证着历史、见证着现实，更将见证未来！

杨 赞 女，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干部。

文化的传承

——关于《雅集》之七

III 周和平

读完本期稿件，忽然想起一个词：文化传承。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为往圣继绝学”也是个大题目。在中国文化几次濒临危难、遭受断裂之际，正是赖于一代代有识之士竭力挽救，才使其能薪火相传，不断承续，继而重光发扬，再现辉煌。

继本刊上期我们介绍了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周勋初先生以后，本期我们又不吝篇幅，再次重点介绍。意在通过介绍、展示周先生以及其他文化大家接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不朽之功，也展示中华文化之生生不息的魅力。

周先生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二学的百年兴衰沉浮，折射出时代之嬗变，让我们在感叹深思之余，更为其晚年“交上好运”而欣慰。

周先生等一批老一辈的学者，一生皓首穷经，埋头学术，不求闻达，不改其志，始终坚

守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周先生一生以“勤杂工”喻之，实可见其“苦干实干的精神”，也正应了钱钟书先生所论：“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在本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陈美林教授的《跋涉“儒林”四十载》，文章写得周详缜密，可见陈先生为此“拼搏大半生”的艰辛和成就。

叶兆言先生为我们写来的“民国出版二杰——张元济、陆费逵”，则是民国时期不能忽略更不能忘记的两位人物。在写张元济先生的文中，作者写到，在淞沪抗战中，侵华日军司令曾公开表示，轰炸几条街区没什么意义，消灭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文化重镇，以及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因此，商务印书馆遭受了毁灭性的轰炸，一大批珍贵的古籍善本和孤本被烧了。从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中，我们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正是想通过这种



7月,省档案馆和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签订《雅集·名人档案》专栏合作协议。
(吉强 摄)



11月,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研究基地揭牌。(潘庆磊 摄)

断我文脉的手段来达到使中华民族“亡种灭国”的野心。这当然只是妄想。

马建强先生撰写的介绍常州钱谢两家六代传家的文章,很值得一读。文章不仅厘清了钱谢两家的世代姻缘,还给我们展示了家学师承这一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同时还揭示了中国文化中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家族群体成才”。这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关注并研究的。文章重点介绍的钱名山(振铎)先生,作为一名江南硕儒,近年受到广泛的关注。文中提及的其长子钱小山先生,生前曾任民盟常州市委主委。我在八十年代初曾见过他,印象中的他是恂恂长者,温文尔雅。至今已匆匆30年了。

日前建强先生赠我一册由他任编审的《谢伯子先生谈艺录》,谢伯子先生正是谢家后人,也正好见证了钱谢两家六代风雅而今犹然的赓续之缘。

介绍书画艺术和书画名家亦是本刊的特色

之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画艺术以其历史悠久、文化信息量大且又具收藏、观赏、交流诸功能而受到关注。本期介绍的范扬、刘灿铭两位,恰巧前不久在泰州共同举办过展览。范扬先生出身于文化世家,他现在画有大名,对“文化建树”亦是悬之于心。常看到他在北京、南京间奔波的身影,知道他为家乡文化振兴的辛劳。刘灿铭先生也是大忙人,不知疲倦地在传播文化。

张昌华先生曾任职出版社,同一大批文化学者名人交往颇深,他的文化随笔很见功夫,且具趣味,通过《雅集》我们得以识见,大有一见如故之慨。他这篇《陈小滢和她的纪念册》,因小见大,让一个个民国学界闻人跃然纸上,足可见昌华先生对这些人物的熟稔与喜爱。薛冰先生的《故纸的温暖》,也是因小见大的另一个范例,片纸残叶,见证世事人情,不是有心人,就不会有如许温暖留存。认识薛先生十余



7月20日至24日,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与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共同举办“光影寻情大地行历史名城考察——南京之旅”第一期活动。(吉强 摄)



7月8日至14日,参加“博爱博学·同心同行”两岸四地中学生走进南京交流活动的孩子们在江苏中华文化学院欢聚一堂。(吉强 摄)

年,总为他对南京文化的热爱所感动,今年夏天,由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与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光影寻情大地行历史名城考察——南京之旅”第一期活动在我院举行,曾请他为到访的香港教师们上了一堂南京文化课,深获好评。

本刊曾介绍过常熟的白茆山歌,本期我们推介张家港的河阳山歌。山歌作为民歌的一种,而民歌是文学的“活化石”。我们在《诗经》《楚辞》中,都能看到民歌。山歌由于是口口相传,即兴创作且与劳动生活紧密联系,往往带着泥土芳香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河阳山歌中的《斫竹歌》,其内容竟与古文献中记载的古歌谣《弹歌》几乎相同,而且相较于《弹歌》的“断竹,续肉,飞土,逐肉”,《斫竹歌》的“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似乎更具动作的连续性。介绍河阳山歌的曹乾石先生,从他的简历里可

以看到,他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坚持写作40余年,如他这样,坚守基层并为弘扬传承地方文化不遗余力的有识之士,理应值得我们敬重。

文化传承,当中肯定会有新生,有衰减消亡,但愿新生的能不断茁壮,衰亡的亦不是根本,让丁帆先生在《秦淮书肆》中的感叹——为再难寻到古书屋——少一些。

周和平 男,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本刊总编。